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8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190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0册

书号11310·17 定价1.1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文 献

- 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
会上的讲话..... (1)
- 杨尚昆同志答复中央党史资料征集
委员会的信
——关于遵义会议前夕是否开过
中央会议问题..... (11)
- 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给
杨尚昆同志的信..... (12)

回 忆 录

-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
..... 李维汉 (13)
- 附录：动机与立场 罗 迈 (51)
-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二)..... 李志民 (55)
- 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钟期光 (182)

回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一段斗争

——在河北省委召开的冀中人民

斗争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成武 (211)

庚申忆逝 (之二)..... 张稼夫 (239)

收复张家口之战 段苏权 (293)

大事记

延安整风运动大事记 贺晋清 (313)

考证

有关平江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

..... 吴定邦 晓 玉 (359)

邓小平同志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去年提出的整风号召，在全国，尤其在陕甘宁边区，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大家知道，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自然，我们的整风运动要从每个同志自己着手。党是由许多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把思想作风整好了，就可以使他担负的工作得到改进，因而党的力量也就增强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把歪风去掉，那我们党不

* 这篇讲话刊登在北方局直属机关学委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出版的《整风周报》第二期上。

知要增加多大的力量！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参加整风运动。

但是，这种意义是否真为所有同志所了解呢？我以为直到现在，大家的了解还是非常不深刻的，不但一般同志，就是领导同志了解也很不够。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整风还没有整起来。因此，当着本期党校开学和太行区全体机关部队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再来说一说整风的重要性，不是没有意义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

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党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整整九年的时间。我们党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

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痛感整风的重要的。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但这是不是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没有的。有了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要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而这些歪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恰恰在我们干部中和各级党的组织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曾给了我们工作以不小的损害。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风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是一针见血的指示。我们大家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几年来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识，就会懂得这一点。拿太行、太岳、冀南这几个区域来说吧，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我们同志，特别是我们这些负责的同志还有不少的歪风，给予工作的损害也是令人痛心的。比如我们在大发展时期，拉夫式地发展党的组织，直到现在还损害着党的巩固和战斗力的增强；我们同志中的宗派主义，把大批的乡村知识分

子排斥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在三三制政权中始终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不善于扩大巩固统一战线；长期的“左”的财经政策，“左”右摇摆（基本是“左”）的锄奸政策，形式主义的生产领导，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等，无时无地不发现许多的歪风。这些歪风给了我们很多损害，有些坏影响现在还未肃清，有的将来还要自食其恶果。凡是反省了一下自己工作的人，一定会懂得我们不整风是不行的。

至于说到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过去我们同志对自己往往是估计过高的，党的组织对干部的了解也是不深刻的。整风经验证明：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所以必须在集体的整风中，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各地整风的材料证明：有些同志虽然为革命奋斗了多少年，最近经过了深刻的反省和别人帮助之后，才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没有最后地确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或者是组织上

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一只脚踏进了党门，还有一只脚是站在门外的。这样的同志，经不经得起大风浪呢？假如不改造，当然是很困难的。可惜这样的同志是很不少的，甚至有不少作了地委委员的干部，思想上的毛病还是很大的。老实说，现在不是自己有无毛病的问题，而是毛病多少，严重程度如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等歪风在今天不占统治地位，这是对全党来说的，我们自己就不应原谅自己，以为自己只有残余的歪风，值不得那样严重地重视与警惕；事实上对许多同志说来，就不只是残余，有的还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占了自己思想的统治地位。这些歪风在各个区域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区域少一点，有的多一些，有的还是歪风占了统治地位，致使那个区域遭到失败（如山东的湖西地区）。总之，不管那个区域，那个同志，毛病都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我们应细心来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

彭德怀同志说：没有自身参加整风的人，是不会认识整风的重要的。的确，上期党校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许多同志对于整风的认识，都是随着整风的逐步深入而逐步深刻起来的，直到他获得了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效果时，才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整风力量

的伟大。

以上是说的整风的重要性。

整风既然这样重要，为什么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还没有整起来呢？我以为主要的是在领导上对整风的认识还很不够，所以抓得不紧，办法想得不多。客观上有无困难呢？当然有的，如战争环境、工作繁忙等等，但绝不是主要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整风的重要，就会想一切办法去克服困难。

在这次党校开学的同时，全太行区开始整风运动。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毛病，认真地贯彻下去，完成整风运动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致象过去一样半途而废，首先是领导问题。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这次还采取了一些具体办法，如每个部门、每个机关，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大多数干部集中整风，这种办法比过去半日整风半日工作的办法要好，容易行的通，大家精神也能贯注些。照现状看来，只要不半途松弛，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领导上对整风是更注意了，但更重要的是每个同志要具有正确的整风态度。因此，根据上期党校的经验，向参加本期整风的同志提出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

整好。首先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过去有些同志到党校，目的只是想听听报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者只是企图“秘密”地改正错误，不肯露出“尾巴”的人，是绝对整不好的。上期党校有些同志就吃了这个亏，于党于个人都是无益有害的。

第二，每个同志还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这是我们对党，对同志应有的态度。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要反对那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上期党校的整风经验证明：冀南区有些同志毛病不少，但是由于他们有坦率的自我批评和批评的精神，所以收到很好的成绩；太行区有些同志就因为缺乏这种精神，收效不如冀南同志大。当然，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作为自己反省的参考，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点感想，也是可贵的。

第三，整风要与检查工作联系，这是理论与实践

联系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检查工作，不是专门的总结工作，那是要在整风完成之后才能做的。现在整风中联系检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打通自己的思想。上期有些同志在开始时，专力于泛泛地检查工作，结果变成了躲风的幌子，这种毛病也是要预防的。

第四，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当着—一个同志把真理与个人利害对立起来的时候，没有胸怀坦白“脱裤子”精神的时候，特别在别人的帮助与批评之下，自己总是畏首畏尾的时候，一定会苦闷的。这时，我们就要好好地帮助他，使他认识整风不是对人而是对事，在真理面前屈服是可贵的精神，绝不是耻辱。要鼓励他把心中的一切讲出来，以便大家帮助。就是对于那种“两条心”的失足分子，也应好好地鼓励他向党坦白，使他懂得对党说了，党是一定对他宽大的。过去的整风经验证明：当着—一个同志经过一番内心的斗争和别人帮助，最后讲出了一切之后，他的精神会马上愉快起来，自己整风更会积极，帮助别人也更会努力。对于这种同志，我们应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欢迎。

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在整风期间，如果对北方局、对分局、对区党委有什么意见，都应该

坦率提出。虽然在工作岗位上有着上下级之分，但不应顾忌这种区别，无论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都要坦白直率，互相帮助。我们整风的小组长、学委负责人，都要从整风的积极分子中去选择，而不应拘泥于平时工作岗位的高低。

同志们！在党校本期开学的时候，我只提供这几点简单的意见作为大家的参考。同志们离开工作岗位，专门进行整风，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虽很紧，只要我们有改造自己、改造工作的决心，就一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几个月之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工作的态度，都会面目一新，党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杨尚昆同志 答复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信

——关于遵义会议前夕是否开过
中央会议问题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六月二十七日来信收悉。

事隔多年，已不能准确记忆。现只就能想起的，
简复如下：

遵义会议时，彭德怀同志和我得到通知参加会议。当时我可能向博古同志提出过，先开中央会议再开扩大会的建议。但此建议并未被采纳，博古是如何答复我的，已记不起来了。事实上也没有先开中央会议，而是召开了扩大会议。

谨复。

杨 尚 昆

七月十三日

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给杨尚昆同志的信

尚昆同志：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载，您在发言中提到您曾“提议在遵义会议前先开中央会议，再开扩大会。”

据现有资料，军委纵队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进入遵义的，政治局扩大会是在一月十五日开始的。目前尚未找到在扩大会议前，先开中央会议的记载。

所以，请您回忆一下当时情况，是否在扩大会议前，曾开过中央会议。

盼望您在百忙中给以答复。

此致

敬礼！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

李 维 汉

编者按：李维汉同志嘱我们转告读者对本文“敬请提出批评建议”。

一、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也就是马克思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这是我们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院长由洛甫兼任；副院长王学文。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张启龙、邓力群、朱光、章夷白、柯柏年、汪涛江等。教学组织是班，最多时设六个班和相应的一些研究室，共三、四百人。一般学员入学都要经过考试。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经抗大、陕公、党校等学校的初步训练，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条件。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

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教员多兼职，主要有王学文、陈昌浩、艾思奇、吴亮平、杨松等。洛甫等中央负责人也兼课。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作过报告。刘少奇同志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讲过党的建设。他们作报告，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思想修养起了很大启蒙作用。

那时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一九四一年七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同志曾经亲临指导，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毛泽东同志向马列研究院提出的任务，也是向全党提出的任务。同年八月一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

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仍由洛甫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徐健生（秘书长）、李言（院党委书记）、李清（研究指导处秘书、党委宣传委员）、毛平（党委组织委员）、杜雷（总务处长）等同志。

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一）概况。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原则。全院共设九个研究室，室主任多由各该学科的党内专家担任，他们直接指导研究工作。比如，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兼）；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研究室

主任师哲。我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经部决定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

各个研究室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室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参加指导，也参加研究。

（二）例一：历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建立这一研究室的目的是，是培养能掌握科学方法的中国历史学者。分三个组进行工作：1.近代史组；2.农民土地组；3.民族组。主要任务是编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通史》，编出了第一、第二两编，整风期间中断。全国解放以后出版的由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在此基础上修订并继续编写而成的。

（三）例二：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建立这一研究室的目的是，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革命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工作重点是研究“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思想、各种哲学流派和国民党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版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就是在毛泽东同志

整顿三风的号召下，由文化思想研究室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艾思奇、温济泽等参加了这一编辑工作。这本书在整风中是学习参考书，以后被规定为十二本“干部必读”书之一。

（四）例三：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建立这一研究室的目的是，是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分三个小组进行工作：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小组，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研究小组，敌伪教育研究小组。规定的研究内容为：第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第二，学习和研究一般社会历史知识，特别是中国社会历史知识；第三，学习外国文与经常注意研究时事动向及策略；第四，补习心理学的一般知识；第五，研究批评各种教育理论和流派，包括教育史，我、友、敌的教育现状，现代教育思潮等。规定研究期限三年。在研究室成立以后，订了一个半年计划。计划规定：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三个地区（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和敌占区）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法和实践等问题。我在中央宣传部同李心清同志^①合

作编辑过宣传教育方面的敌友我三本资料书，是供各级宣传教育工作者参考的，同时也作为教育研究室的研究资料，毛泽东同志称赞了这本资料书。调查则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以期在半年内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小学教育的建设能够提出初步的具体的建议，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前夕取得了初步成绩。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看了一些有关教育流派的材料，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等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等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等，并作了笔记。其中主要研究了两个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即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室讨论结果，对前者是肯定的，对后者是否定的。董纯才、张健、华子扬等曾经写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教育研究室召开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我作了总结发言，讲了四个问题：

（一）从教育看政治，陶行知在政治上经历过的路程；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三）关于生活教育理论和方法中若干问题的商榷；（四）我们怎样研究和学习陶行知。当时，我认为陶行知在政治上经历了

① 李心清同志，河南人，随王震同志南下时牺牲。

两个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教育家；

“五四”以后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在教育上是沿着杜威主义——生活教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道路发展的。他的生活教育有三个基本思想，一是主张生活教育，反对与生活脱离的洋化教育和封建传统教育；二是主张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反对教育和文化为少数人独占；三是主张教、学、做合一，反对为读书而读书。这些思想基本上是进步的。我的上述观点，在三月五日新教育学会纪念生活教育十五周年大会上，也作过论述。

同年三月十九日教育研究室召开乡村建设派问题讨论会，我对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对梁漱溟的思想）也提出了几点意见。当时，我认为：（一）梁漱溟的言论、著作和乡村建设实践证明，他是没落地主阶级、即是半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二）他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对立，而只有职业分工，中国社会关系是伦理关系，及“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等思想，同蒋介石、陈立夫有共同点；（三）但他企图用“软”的办法即乡学、村学的教育办法来维护陷于死亡的半封建制度，驯服农民，因之又同蒋、陈有区别；（四）他是唯心论者，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已经破产。农民并不拥

护他们。他现在参加民主同盟，要求民主，说明地主阶级中的抗日派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是不满的；（五）乡村建设派在教育上的某些实际办法，还应参考与研究；（六）要把乡村建设派中的青年和梁漱溟区别开来。许多青年已经从梁漱溟思想中解放出来，有的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教育研究室工作的材料，是从我当时的笔记中摘引出来的。我简要摘引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不是想继续宣传上述具体的观点，而是想举例说明：第一，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虽然时间短，成果不多，但其基本方向和方法是符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的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的。第二，当时包括院长、副院长和室主任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亲自参加研究工作的。

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

（一）伟大创造。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一九四二年

延安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求最终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影响。我们党清算王明的错误用了很长时间，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和瓦窑堡会议解决政治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鉴于改造世界观的迫切需要，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经典性哲学著作，还写了许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政治、军事著作，同样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际都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的。这种批判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最后，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用全党整风这样一个方法，即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给长期以来的党内思想教育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宣告彻底破产。

由此可见，整风的对象，主要是老干部（当时是中年干部）。但整风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出来刮了一阵小资产阶级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但过后不久，毛泽东同志还是把

整风矛头拨回到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方面，组织大家学习和清算“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路线斗争史，终于在“七大”前夕，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地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在思想上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这样就为胜利召开“七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王明称病未参加会议，写了一封信承认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但无自我批评。

当时，有同志提议要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予批判，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谁是谁非还不能作结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思想是和陈独秀投降主义相类似的思想。讨论报告时，王明和我在一个小组，他讲了不少的话，根本不接触报告中的批评。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八届两次代表大会上仍提名选他当中央委员。

我参加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季，毛泽东同志邀集陈云、博古、何凯丰、康生和

我以及其他等人谈话，毛泽东同志说：老干部也要整风，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本书，联系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主要靠自学；成立一个小组，也开小组会，互相交换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和风细雨，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大家都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又说：我们整风的方法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向前奋斗。小组会约一个月开一次或二次，大家都讲了话。恩来讲过党的历次路线变迁，其他同志插了些话。前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

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主要是从两方面学习，即同群众一道学习和同中央同志一道学习得来的。

所以延安整风，是教育了两代人：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年一代（老干部）。那时延安除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等五老外，一般老干部还是中年人，没有老年一代，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

（二）整风前夕。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延

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的基本情况是这样：从未做过任何工作的占百分之六十八，来延安后受过短期学校培训的占百分之八十四，抗战以后入党的占百分之七十四，二十至三十岁的占百分之七十九，知识分子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二。可以说，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新党员，他们有救亡爱国的精神，一般信仰马列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是自觉自愿地不远千里、不怕艰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和学习热情，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带来了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缺乏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在学习上很容易接受教条主义影响。

整风开始前，延安已经存在一种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在青委一些年轻人办的文化沟《轻骑队》壁报上存在这种思潮（《轻骑队》编委会于四月二十三日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坦白承认过去的编辑方针是有错误的。”）。院内以王实味（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些人也存在这种思潮。尤其王实味，他在二月十七日、二十六日和三月七日，连续公开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文章，说延安“歌舞升平”，对干部“缺乏同志之

爱”，“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攻击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号召青年向党发“牢骚”，就是说，向党开火。这种错误观点，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以，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我向徐健生及李清两同志说，中央研究院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作风问题，还是怎样接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精神而把党性具体运用到研究、学习、工作中去的问题。整顿三风，对中央研究院来说，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三）开始阶段。一九四二年一月，洛甫率农村调查团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一些农村、市镇作历时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走时对我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我曾三次要求凯丰自己管，未成。因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很快开展了整风运动，我参加领导了这个运动的主要阶段。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三·一八”动员大会后至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是开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普遍发生偏向，全面展开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思

想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斗争。

1. “三·一八”动员大会上的斗争。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作。范文澜同志首先讲了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一些同志发言后，我也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讨论整顿三风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二）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三）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原来多数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四）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五）院长、秘书长及各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是院务会议决定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并正好考验他们；（六）关于出墙报和匿名问题，我赞成有墙报，但须有组织地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那天我感冒头痛，发言后即退席。以后得悉，我的发言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也就是整风领导权问题，王实味反对院务会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于壁报文章的署名问题，王实味主张壁报文章可以匿名。

关于整风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民选者占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二十一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二同志外，全部当选（在四月一日第二次检委会上，我再次提出未当选的王思华、张如心同志，仍应参加检委，共同工作。多数无异议，以后也参加了检委工作）。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几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

2. 检委会上的斗争。动员大会后的第一天，三月十九日，检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又展开了检委会领导关系问题的争论。柯柏年同志曾经在动员会上提过，检委会应在行政领导人领导之下工作，这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这次检委会上，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检委会由动员大会产生，应向动员大会负责。我发言支持柯柏年同志的意见，首先说明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应该由行政负责人领导的理由，至于检委对谁负责，我主张对中央负责，又对全校负责。多数同志无异议，结束争论。四月一日，检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又在四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其中一个思想检查要不要注重方法的问题。不少同志主张“彻底民主”，不必注重方法。我发表意见，说：“批评应

该是彻底的，无保留的，不讲情面的，但同时应该注意实事求是，讲究方法，遵循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检委多数是群众，领导干部只占少数。此后几乎有会必争，很难工作。为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我和张如心、艾思奇、徐健生等人（还有其他负责同志记不清楚了）临时组成一个小组，方针是：我们几个人在检委会内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要多作群众工作；但对多数人做出的决议，又必须服从，不搞分裂，同时声明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们正是依靠这个小组，贯彻这一方针，终于团结了多数群众，引导大家走上了正确轨道。范文澜未参加此小组，但此小组的每次会议情况和决定，都是由徐健生负责向他报告的。一直到按照“四三”决定精神成立高级学习组，由它行使整风检委会常委会的职责后，我们这个小组才随之停止活动。

3. 《矢与的》墙报上的论战。三月二十三日，为配合整风检查，墙报取名《矢与的》，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等等。这个发刊词强调发扬民主是正确的，把民主绝对化，根本不提集中，是片面的。少数人就利用这个弱点，在《矢与的》上再次挑起了动员大会上的争论。王实味在最初三期内

就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题名《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又一篇题名《零感两则》，说：“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要求“在这个斗争中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再一篇题名《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威胁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说：“用流言中伤人是最卑污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底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可以看出，王实味确实是在煽动人进行攻击了，他的矛头不仅限于院内，主要是我，也不限于我一个人，而且到了院外，影射向上。除王实味的文章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漫画，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拖着一条长“尾巴”，后面有四、五个人抬着保护这条尾巴。拖“尾巴”的人是指我，抬“尾巴”的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这些文章和漫画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对民主与纪律的关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也有认识比较正确的同志，如李宇超、王

志匀、何定华、翟定一等，但属少数比较“孤立”。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王震同志看了墙报的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晚上也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一部分人因此得意忘形，说是“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毛泽东同志看后，召集了高干会议。我在会上声明自己要转到运动中去，同群众结合在一起。后来的实践证明，同群众一道，并帮助群众前进，成了我的世界观获得根本转变的主要途径。

4. 三种情况。以上事实说明了三种情况：第一，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在动员大会、在检委会、在《矢与的》墙报上的斗争，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第二，这种反映和表现，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如何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的态度是不

错的，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在动员大会上听了几个同志的发言有不妥之处，就急着讲话，时机早了点。二是讲话内容和方式过于简单，这和当时生病身体发烧有关。第三，王实味等，尤其王实味，把《矢与的》这张墙报当作攻击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攻击我的工具。

鉴于当时大多数学员的思想和倾向情况，不适于负责干部特别是我自己出面在墙报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所以一直到五月十日，《矢与的》出版七期后，我才正式向检委会常委提出改进墙报工作的建议。

我在向检委会提建议时说，中央研究院墙报《矢与的》已出至第七期，过去做到了鼓励大家在墙报上进行批评、辩论，说错了不加抑制，这是好的，但是领导上多少采取了放任主义的态度。各期文章有许多是带有相当严重的偏向的，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得到结论，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得到表扬，没有一种偏向得到纠正，一任其自流发展，检委会的领导应当负责。在检委会里，大多数同志在中宣部决定公布以前是偏重民主而看轻领导，决定公布后又害怕纠正。我没有能采取更多的办法。我自己从动员大会后，由于客观的困难，只能正面地、适可而止地提出意见，艾思奇与柯柏年亦是如此。在第二期墙报上，我对墙报的希

望只提出了“墙报是批评、辩论和建议的机关，……说错了也不要紧……但须力求有的放矢，射得准确”。中宣部决定宣布后，在中研院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但领导上由于自我批评精神的不足，害怕正视过去的缺点和偏向，未能完全根据中宣部决定精神处理问题，对墙报的方针没有积极的改进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我有责任把见到的问题从原则上加以说清。因此，提出六点建议，其要点是：第一，要贯彻中宣部指示，“善于把错误引导到正确方面”。第二，鼓励投稿，号召稿子内容力求正确。第三，编委有责任帮助投稿人改正错误观点。第四，组织正确稿件，负责同志也要写稿。第五，对争论问题要作结论。第六，墙报应配合学习，起领导作用。检委会常委接受了这些建议。时间虽然晚了一些，仍有亡羊补牢意义。

五月二十日，我在《矢与的》上发表了《动机与立场》的文章（附在本文之后）。

5. 三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整风是有偏向的，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整风方针问题。不懂整风目的，把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看成了只是整几个领导人的活动。第二，检委会组成问题。不懂组织原则，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有否认和摆脱党的领导倾向，在下表现为极端的自由主义，在上

表现为放任主义。第三，思想方法问题。“大胆”第一，“揭露”就是一切，不讲实事求是，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其思想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充分暴露了教条主义教育的根本弱点。

在开始阶段，在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我确有不小的困难。第一，我在历史上犯过路线性质的错误，王实味等得以利用这一点来挑动自由主义和绝对民主。第二，中央研究院主要负责人洛甫去作农村调查了。第三，副院长范文澜同志是一个学者，老实正派人，但对党的民主集中的原则不大熟悉。他主张整风需要采取民主方法也是对的，但他在墙报上写文章也说要“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面碰出血来”的话。现在看来，我在开始阶段采取慎重的态度，是适当的。

（四）深入阶段。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四月三日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

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个决定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健康发展的开始，也回答了中央研究院初期整风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四月六日，毛泽东同志又召开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偏向有两个：不懂组织原则，不懂思想方法，这要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并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即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四月七日，中宣部又专门约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人仍然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事，即宗派之争，而不是原则之事，不同意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有偏向。凯丰同志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指出应该明确地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这样，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和“四七”座谈会，就终于把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引上了正确的轨道，开始了整风的深入阶段。

1. 自我学习。我既然参加了整风领导，除了坚

持原则立场外，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从我开始，带头学好文件，掌握精神，改造自己。为此，我自己首先做了两件事：第一，精读文件。在四、五月个人学习文件期间，我同大家一起也学习了有关文件，并联系中央研究院的实际作了学习笔记，现在有本可查的，如《读中宣部四三决定》、《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和毛泽东论绝对平均主义》、《学习杂记之一：“矢与的”的方针》、《学习杂记之二：动机与立场》，以及《谈学习态度》等。其中《谈学习态度》是学习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笔记，记下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如这次学习的重要性，全部粗读和重点精读的关系，搞通文件、总结经验和反省自己问题上的两个极端偏向，贯彻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必要性，个人学习和集体研究的结合，写学习笔记、记录学习心得的重要性，以及学习中领导干部的态度，等等。当时，我是比较注意写学习笔记的，我认为“写学习笔记不但对自己的学习是不断的将军，又同样能对自己的思考起着启发和明辨的作用。但是，笔记只是学习心得的记录，而心得深浅，归根结蒂决定于学习态度。所以，我们必须不疲倦地致力于学习态度的改造”。“领导干部在学习中有双重任务：自我学习，又帮助别人学习。因之领导干部的学习态度关系特别重大，他常常自然而然

地成了别人的榜样。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能够以身作则地影响别人，积极帮助别人，又能从别人那里学习许多东西，真正收到教学相长之效”。坚持地克服教条主义态度，为培植马列主义态度而斗争，这就是我在整风中的学习态度。第二，检查自己。三月二日我参加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的会议，毛泽东同志谈了党的产生至六大大会以来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我们做启蒙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观点，使我很受启发和教育。三月四日，又读了《六大以来》第二集刘少奇同志检讨“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文章及其给中央的信，也使我对总结白区工作和检讨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在此基础上，四月二日，我利用中央研究院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开会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九一八”到遵义会议时期党领导上的错误，检查了我在这些错误中的地位和责任。重点是批评自己，分析自己错误产生

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检查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对今后如何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有极大帮助。有同志告诉我，他们听了我的检查，也很为感动，很受教育。说明一个领导人要帮助别人整风，首先要督促自己整风。以身作则，从我开始，这也是领导。

2. 纠偏。整风开始阶段暴露了问题，发生了偏向。对多数群众说，这种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属自发性质，和王实味的蓄意煽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煽动对偏向确实又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两者本质不同，形式相似。这样就使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带着相当的复杂性，势必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循序前进。首先需要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然后才能解决王实味问题。

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的方法，一是个人学习整顿党风文件，二是集体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

在延安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四月十八日联合举行学习动员大会，四月二十日起开始学习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他们学习整风文件一般是按总论、学风、党风、文风的次序进行的。中央研究院针对运动初期发生的偏向，改变了这一次序，五月上旬开始，首先学习“四三”决定和有关整顿党风的文件。学习“四三”决定使大家初步懂得了整风运动

的方针、立场、方法和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使大家初步端正了学习的态度；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使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使大家初步清算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所有这些文件的学习，都是结合各人的思想实际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经验进行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个人领会精神，自觉检查，相互启发诱导，和风细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普遍获得提高。

在此基础上，从五月十七日起至五月三十日，又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群众性的讨论和争论。主要检查了整风初期产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对此，有的说有，有的说无。有的说是偏向，有的说不是。发言踊跃，争论极大。范文澜同志对自己在开始阶段“放任自流的领导”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大于优点。因为我那时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就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

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这是我不能不认为衷心抱愧、难以忘怀的一次痛苦经验”。他的自我批评受到群众欢迎。五月三十日，我也作了题为《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的几个争论问题》的发言，对三个方面的问题的争论，提出了我自己的意见。一、关于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应“强调民主还是应强调集中”；“民主扩大是否集中也扩大了”；“集中是领导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被领导者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集中是把已经启发起来的积极性加以正确的使用”，等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如下的话：“我们的集中，必须是民主的集中即必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它与专制和独裁根本不同；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集中主义的民主，即必须是正确集中的民主，它与绝对民主根本不同。”决不能因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我们要正确地了解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需要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和方法，辩证地考察它，以免流于机械；尤其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考察它，以免流于抽象的名词的游戏。”二、关于民主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什么是党内民主的实质；能否“把党的民主分成组织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三个领域”；能

否实行“彻底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极端民主化（当时我们用过这个概念，意指极端自由化或自由主义）的来源”；民主精神和作风；中央研究院如何运用民主，等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如下的话：我们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斯大林所说的“行动的民主主义”，就是在党的组织内，党员有权参加解决党的和一般实际的问题，制定决议，并督促自己的组织实行这些决议，就是议决权和执行决议的统一，这是党的民主的特点。党的民主永远同集中制联结在一起。同集中制分离，就会产生绝对民主，绝对民主就是绝对自由，而绝对自由是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违反社会生活秩序的。三、关于纪律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为什么服从纪律是自觉的；执行纪律有无条件；灵活执行决议在什么限度内才不致违反纪律，等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下面的话：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只有自觉执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无条件执行，才能获得保证。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但决不能违反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我现在复述这些争论问题和我的意见，是表明当时青年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他们的某些绝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表现，都是自发的；同时也表明我当时对争论问题的发言还有局限性，还不够完整、明确。例如还没有认

识人民民主，没有充分认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等。至此，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讨论基本结束，带有群众性自发性的偏向基本纠正。

3. 批判和斗争王实味。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第一，当时我们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经历着抗战中的空前困难，又面对着新的反共高潮，特别需要全党团结一致，战胜困难。此时此地，王实味却借党内整风机会，诬蔑党和咒骂党，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不给予坚决回击，就不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第二，王实味惯于使用“左”的词句掩盖反动实质，利用和迎合青年中未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封为青年的“代表”，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加以曲解，夸大，造谣中伤，耍两面派，钻空子，被揭露后又抵赖顽抗，等等，对他这一切，不给予彻底批判，就不能肃清影响，教育青年。经过前一段的讨论，大家也发觉了王实味的思想不对头。所以，在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告一段落后，紧接着就展开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这是一场有着重大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不可避免的斗争。

早在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就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矢与的》

墙报上的言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胡乔木同志又写信给王实味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并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是绝对不容许的。

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发言的人很多，主要的有（按发言次序）李言、李又常、潘芳、雪苇、艾思奇、柯柏年、李伯钊、张如心、丁玲、艾青、范文澜等同志。首先是研究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开始讨论过这样一些问题，如《野百合花》的错误是方式的错误，还是立场的错误；如果立场错了，是否他的动机也错了，等等。很快又有同志揭发王实味在历史上和托派有联系。此事他在一九四〇年向中央组织部交代过。在批判过程中，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并且还说，至今对某些托派分子仍然念念不忘，认为他们的“人性”是好的。很多同

志又揭发了他的种种反党行为。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群情愤激，要求开除其党籍。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受检委常委会的委托，对座谈会作了总结发言，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发表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上），回顾了中央研究院从三月十八日动员大会以来八十天的整风学习和论战过程，总结了几个星期以来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的收获，分析了自发性偏向和王实味问题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批判、斗争王实味的意义和必要性，具体谈了五个问题：一，肯定座谈会的巨大收获：对偏向作了一般的清算，对王实味作了彻底的揭发；大家在政治上、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自己的思想改造上，一般都提高了一步。二，王实味是什么人？支配着王实味的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为反革命所赞扬和欢迎。大家抱着“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挽救他，实际上他拒绝了大家的帮助。“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三，斗争王实味的必要性和意义。为什么要斗争王实味？第一，因为

王实味有反党言行。他坚持和传播托派思想；利用抗战困难在党内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制造谣言，破坏团结；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和夸大，公开诬蔑党和咒骂党，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故意曲解整风运动为派别斗争，造谣诬蔑党的领导，进行挑拨离间，等等。“对王实味这类反党的反动的行为能够不允许我们激起高度的义愤和进行严正的斗争吗？”第二，因为王实味进行反党活动“有他的一套阴险的狠毒的手法”，比如：使用一些“左”的名词掩盖反动实质，吓唬缺乏政治经验的人；利用青年弱点，装作青年的代言人，进行诱骗；挑拨离间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和党的关系；两面派和钻空子；耍流氓，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不对王实味的言论行动，实行具体的揭发，进行严正的论战，能够暴露他的实质，肃清他的影响，提高党内的政治警惕性吗？”说明这场斗争和论战“是完全必要的”，是“有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四，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经验。第一，这是一个思想论战过程或阶段。一般地说，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特殊地说，又是同王实味反党思想及其影响的斗争。曾经发生过的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同王实味的反党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反党煽动

对偏向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又使一般的偏向同王实味的思想有了某种关系，使思想论战带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关键是要搞清一般偏向的性质和王实味思想的实质。第二，经过党风文件的学习和反省，我们终于克服和清算了自己在整风初期犯过的偏向，揭发了王实味的反动思想和活动。因此，我们比以前更了解了党的文件的力量和学习的重要性。第三，从反王实味的斗争中应该得出一个严重的结论，就是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反对自由主义。第四，应使学习和思想论战进入一个新的更具体更深入的阶段。“希望把我们这次座谈会的精神，反映到各个研究室去，反映到各个同志的内心里去。我们整个研究院和每一个同志应该从已经达到的阵地出发，继续努力，实现中央和毛主席整风运动的方针。”

4. 党风学习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顿党风的学习，到七月下旬告一段落，总结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批判王实味，关于思想意识的检讨，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这次总结有三个特点，一是坚持学习。整风文件的学习贯彻了整风的全过程，也贯彻了总结工作的全过程。学习笔记一般不是写了一、二篇，而是写了一、二本，真正做到了学文件，写心得，照镜子，理论和实际挂上了钩。二是要求作全面、历史的检讨。

入党以后要检讨。入党以前也要检讨。尤其要全面检讨整风以来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影响、性质、危害、根源、克服办法和今后努力方向。三是贯彻民主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互相批评和帮助，主要依靠个人觉悟，自觉自愿地解剖自己，对照文件精神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个人进行全面的、历史的检讨的基础上，写出思想自传。这种自觉的思想革命，创造了团结互助、携手前进的热烈气氛，没有任何强制和压力，同志们心情普遍是舒畅的。正是在这种民主基础上，每个人都严肃地解剖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从而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加强了团结，确实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个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是有规律性地前进的，收获是很大的。普遍反映，整风教育了每一个人，端正了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方向，使他们在今后漫长的征途中有可能少犯错误，多作贡献。事实正是如此，他们后来奔赴各条战线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气节。其中如胡南、刘亚生、黄子文、张炳南等同志，就在特务屠刀面前或在自卫战场上，顽强不屈，壮烈牺牲。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更多同志经受住了林彪、

江青、康生等反革命的迫害，今天虽已年老体弱，仍然奋战不息，保持了延安整风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

(五) 主要收获。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

1. 教育了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央研究院根据自己的特点，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改造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实事求是地对待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扶正祛邪，帮助改造。他们的优点是有强烈的革命性，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和领导，要热情帮助他们发扬这一优点。他们的弱点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摇摆性和软弱性，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要热情帮助他们克服这一弱点。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的主要成绩，就在这里。具体说，第一，他们的思想要害是世界观基本未改造，整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了无产阶级立场。第二，他们的思想方法习惯于纸上谈兵，理论脱离实际，搞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整风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初步端正了学风，在理论联系实际迈出了一大步。第三，他们的组织观念薄弱，纪律性差，容易搞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整风用党性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教育他们，加强了他们的组

织观念，纪律修养和党性锻炼。现在有些同志把延安的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说整风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实力量大，效果好。这是由衷之言，是完全正确的。

2. 延安整风，整个说来，教育了青年一代，更教育了中年一代（即现在的老年一代）。中年一代是各条战线上的负责干部。当时中央研究院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把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党员的世界观当作首要任务，而直接帮助青年整风的都是中年干部。他们都在同青年一道的学习中受到整顿三风的教育，但是从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则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学习《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本书，即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受到了更深刻的教育。这是对负责干部一项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实现了六届六中全会的号召。延安如此，全党也如此。

（六）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所写的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中，把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作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子，说它们“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

历史条件不同了，但整风和生产，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仍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子，因之，我们今天重温中央研究院整风的成绩和经验，有现实意义。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获得成绩的原因何在呢？有些什么带根本性的经验呢？

1. 首先，有一条完全正确的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一条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错误方针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们执行了这一条方针，使党的生活和党内教育走上了完全崭新的道路。

2. 其次，坚决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我们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偏向，我们仍然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用民主方法，即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启发自觉，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思想统一。

3. 领导干部和群众紧密结合，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一方面，领导接受群众教育，另一方面，领导并引导群众前进。就是说，领导确实既做了学生，也做了先生。这种领导和群众亲如手足的关系，是十分

值得发扬光大的。

4. 高度发扬自我批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一点，整风中是自始至终自觉执行的，没有人认为做了自我批评，就是丢了人。也没有人听了别人的批评，就脸红。这是多好的同志关系！现在，一般说，自我批评的武器举得不高，仍然有些干部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也不作自我批评。给批评者打击报复，穿小鞋的事，也时有所闻。这是既不正派，又十分危险的坏现象，应该大力纠正。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离开中宣部和中央研究院，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中央研究院的下一段学风、文风学习和全部总结，未曾亲身经历，就无从回忆了。

（宋金寿协助整理）

附录：

动机与立场

罗 迈

(1942年5月24日)

在整顿三风的运动中，我们欢迎高度的热情，欢迎纯洁的动机与愿望，我们反对消极冷淡，反对任何的恶意和邪念，不这样，整风运动搞不起来，也搞不好。

我们同志间，在自己说错了话或做错了事的时候，常常郑重地声明说：“我主观上不是这样”，或“我的动机不是这样。”对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动机和主观愿望，应该是纯洁的，是好的，而对一个革命同志，如果他有错误的话，也是应该把他的愿望和动机同他的错误区别开来看的。

但也要知道，好的动机和愿望，只是主观的出发点，常常不等于客观的现实的真理。例如革命冒险主义者的主观愿望，一般地是为要革命，但他依然是冒险主义者，他的冒险主义的错误损害了党和革命，以

至严重地损害了党和革命。所以我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动机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或错误，尤其不可拿“纯洁的动机”和“革命的愿望”来宽恕与辩护自己的错误，以致妨碍自己对错误的觉悟与改正。

同样，好的动机和愿望，也不等于正确的立场。

共产党员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换句话说，就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是立足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党的原则之上。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事变的面前，首先要求自己站稳立场，立场不对，就是根本不对，立场错了，就是根本错了。

自然，一个共产党员的言论和行动，归根是有立场的，但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或完全符合于无产阶级的立场。不一定符合党的原则，可能立场不稳（指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可能失去立场（同上）。例如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革命冒险主义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也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它们都是反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共产党员有了上面所指出的这种或那种倾向时，便是立场不稳，便是立场上有了偏向。

无产阶级的立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上表现出来。例如“改造思想作风，改造工作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

是我们整顿三风的目的，又是立场，是我们研究文件的立场，又是检查工作的立场；在精读文件时，在讨论会上，在批评和建议时，在墙报上写文章时，都应该遵守这个立场。“在讨论中发展争论，在规定检查期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但我们每个党员应有的立场，却是力求自己说得正确，做得正确，事事合乎党的原则。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其立场是错误的，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平均主义，其立场也是错误的，一句话，都是反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整风运动中，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又要克服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平均主义的倾向。我们的武器是二十二个文件，我们的立场和方法是二十二个文件，轻视二十二个文件，离开它们去找法宝，或自作聪明，或单凭主观愿望，单凭热情与信仰，是不行的。须知动机不等于立场，目的更非方法，而单只好意也可以产生恶果的。

一个小资产阶级层中生长出来的人，他的立场和习惯，一般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由于对共产主义有高度信仰，对革命有高度的热情，对党有充分的信任，他加入了党；但同时他或多或少地带来了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一时转变不过来。虽然不能说，他在某些

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就等于他的全部立场，更不能说，一有了错误的立场就不能转变到正确的立场，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了他在那些具体问题立场上究竟有错误，而由错误的立场转变到正确的立场也不是一件易事，必须有主观的决心和努力，而且还要从长期的实际行动来检验自己。一般的说，由小资产阶级立场到无产阶级立场的彻底转变，要经过革命理论的熏陶，尤要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长期的革命斗争，才能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锻炼得像钢铁一样。

整风运动，是理论的学习，又是实际的锻炼，应该坚守即知即行的原则，精研文件，是为了运用文件，运用文件才能精通文件和发挥文件的作用，才是“有的放矢”的学习态度，我们大家应这样地努力才对。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二）

李志民

抗大之花开遍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强调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号召冲破日、伪、顽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到敌后办学，培养大量干部去发动和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据此，抗大从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战胜利的七年间，先后在敌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和五所陆军中学、一所附设中学，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使抗大之花开遍各抗日根据地。这个情况，在上面介绍抗大总校发展的历史时曾带笔作过

简介，现再分述于下：

抗大第一分校

抗大第一分校于一九三八年冬创办，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七年，是十二所分校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培养的干部最多，转战华北、华中，斗争艰苦卓绝，成绩显著的一所分校。

一九三八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的新阶段。为了适应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大组织两个分校深入敌后根据地，执行培养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军政干部的任务。

抗大一分校由原驻甘肃省庆阳的抗大第五大队^①、原驻陕西省洛川的抗大第六大队^②的全部，与原驻延安的抗大第三、四大队各一部和原驻陕西省柘邑县看花宫一带的陕北公学柘邑分校大部分以及原驻陕西省三原县安吴堡的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一部分合并组成，校长何长工同志，副校长周纯全同志，政治部主任黄欧东同志，训练部长韦国清同志。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各单位分别从原驻地先后抵达陕西省延长县汇合后，十二月二十日，以“何

纵队”为代号，由何长工等同志率领从延水关东渡黄河。渡河这一天，天空冬云低垂、朔风凛冽；河上冰凌冲击，银花飞溅；加上日机在岸边轰炸威胁，确使初征的战士们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周纯全副校长和学员们一样，身上背个大背包，阔步走到队伍前面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大家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奋勇渡河。校首长的模范行动激励着大家，一时士气大振，同志们唱起“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的战歌，有组织有秩序地登船，在支前船工大力支援下，大家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克服寒冷、晕船等困难，胜利地渡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省的永和、石楼等县，跨过吕梁山脉，于灵石县附近采用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住敌人，使敌人的主力困守据点，不敢乱动；而我们的队伍则乘夜徒涉冰冻的汾河，通过同蒲铁路敌人的封锁线，第二天，又避开四架敌机的轰炸袭扰，攀越白雪皑皑、险峻陡峭的绵山，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到达战云密布的晋东南太行山区——长治、潞城、屯留之间的古城、冈上一带。此地离八路军总部驻地的中村仅十余里。到达目的地后，稍事休整，就举行抗大第五期（也是一分校第一期）的开学典礼，正式成立抗大第一分校；对外也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

第一期开学时，编为七个营，二十三个队，另设有军事教员训练班，政治教员训练班，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区队长训练班和女生队，学员总数达三千二百三十七人。不久，为适应敌后随时准备战斗的需要，分校又进行改编，组成三个支队，九个营，其中第一至第六营都是外来的知识青年；第七营为特科营，下设工兵、炮兵、机枪、防化学四个队；第八营包括原来直属的各个训练班和女生队；第九营系到晋东南后新吸收的外来知识青年和职工。

这一期的学员大部分都是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冲破重重阻力、闯过道道封锁线投奔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他们刚到延安编入抗大总校第五期或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又奉命东进，再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途中经受了許多艰难困苦的考验，得到很大的锻炼，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所以，一到敌后，大家都渴望很好地学习，以便“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根据这个特点，教学计划以“军政并重”为原则，政治课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本书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进行社会发展史、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等教育；军事课程有步兵战术、游击战术、射击、爆破、兵器、地形、筑城和军队卫生等内容。由于学校靠近

总部及北方局，总部首长和北方局的领导同志对一分校十分关心，朱德总司令经常来学校给学员讲“步兵战斗条令”课或作报告，五月一日全校开展“红五月竞赛”（包括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和文化体育活动各方面的革命竞赛）活动时，朱德总司令还亲临大会进行动员。此外，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杨尚昆、左权、傅钟、陆定一、朱瑞等同志也常来作报告或指示工作。这不仅对全校教职学员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而且对推动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也起了很大作用。

太行山区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一二九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而且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太行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得日寇坐卧不安，所以，日寇把太行山区看作心腹之患，一九三九年七月，出动了五万多兵力对我太行、太岳地区进行疯狂“扫荡”。为了保存干部，一分校奉总部命令，转移到太行山南段的山岳地带，在晋豫边界的平顺、陵川、林县一带活动，坚持教学。这个地区是个新开辟的根据地，且与国民党高树勋、孙殿英等部队杂处，斗争环境十分复杂。为加强根据地建设，一分校奉命兼管太南分区的工作（校部对外称为“太南游击司令部”，何长工同志兼任司令员），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良传统，派出大批学员组成五个工作团，深

入山村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领导太南地区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了太南山区这块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次执行工作团任务，对抗大同学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实际工作锻炼。

当时，由于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给分校的教学和生活带来很大困难。粮食奇缺，为了弄到一点粮食，有时还要从太南地区长途跋涉到上党盆地同敌人展开抢粮斗争。在太行山上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分校的教职学员都为自己能战斗在太行山抗日前线而感到自豪。每当晨曦初照山巅，大地刚刚苏醒的时候，“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这首气壮山河的战歌就响彻抗大各个宿营地。这激越的歌声，象一团炽热的火焰在抗日志士的胸膛燃烧，激励大家勤奋学习，掌握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杀上战场，叫敌人在我们面前灭亡！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期学员毕业，除少数毕业学员因工作需要留校工作外，大多数都积极要求上前线，分配到一二九师等部队工作，加强了部队的骨干力量；特别是特科营的毕业学员到部队后，对加强部队的炮兵、工兵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第二期正式开学，有学员一千多人，编成四个大队，每大队下属四至五个队，大多数是八路军的排、连、营级干部。但开学不几天，一分校即接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因抗大总校将按中央的原计划从晋察冀转进晋东南，决定一分校继续东进，深入山东敌后办学，把这一期的大部分学员组成一个留守大队，由何长工、赖光勋等同志率领，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从太南地区前往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与总校合并，编入总校第六期继续学习。而大部分教职员和少数学员则由周纯全、李培南等同志率领，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太南，再次长途跋涉，向山东敌后挺进。

第二次东进又是一个严冬季节，出发的第二天，攀越太行山脉时就遇到暴风雪，霎时，狂风呼啸，玉龙飞舞，搅得周天寒彻。个别同志被冻坏了，但是同志们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互相鼓舞，顽强地与风雪搏斗，终于胜利地越过这座一千多米高的高山。接着，队伍通过离石公路的敌人封锁线，经山西武乡县和辽县的西井镇，在河北省沙河车站附近穿过平汉铁路，进入冀南平原，利用冀鲁豫边区抗日军民所挖的“抗日沟”^③，通过一道道公路、河流上的敌人封锁线。在一个严寒的冬夜，渡过了山东的东平湖，进入鲁西

抗日根据地。稍事休息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以一夜一百四十华里的强行军插过津浦铁路封锁线，经东石莱等地进入沂蒙山区。沿途排除了国民党顽固派龙峰山、郑小隐等杂牌部队的阻拦，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二日胜利到达山东省沂水县南部的孙祖、张庄一带预定的目的地。

第一分校从一九四〇年一月进入山东之后，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都在山东地区活动。在这五年半期间，由于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学校的流动性很大，组织经常变动，战斗也较频繁，这就是一分校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学校流动性大。

一分校本部刚到山东时，在沂水县孙祖、张庄一带，后来又迁往蒙阴县蒙山地区；一九四二年以后则转战于滨海区莒县的十字路镇、大店镇及临沂、沐水、费城和江苏省干榆县等广大地区。与此同时，分散在胶东的第三校则活动于平度县的大泽山区和栖霞、牟平、福山一带敌后根据地。

二、组织机构经常变动。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分校刚到山东立即进行整编和招生工作。他们接受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的领导和指挥，同原山东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原山东纵队

干校编为第五大队。接着，一分校派出第一大队，由大队长贾若瑜、政治委员廖海光等同志率领，到胶东地区，同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编成“胶东支校”，分散活动于平度县大泽山区。当时，一分校除第一大队（胶东支校）外，直属二、三、五等三个大队。其中第二大队包括三个连、排干部军事队，两个连、排干部政治队，一个女生队共六个队；第三大队包括两个连、排干部军事队，一个机枪队，一个工兵、炮兵队，一个由参谋训练班与营、团上干班组成的参干队共五个队；第五大队包括六个连、排干部队。全校直属三个大队、十七个队，学员二千六百七十人，这是一分校新的第二期。校长周纯全同志，政治部主任李培南同志、副主任刘浩天同志，训练部长袁也烈同志、副部长阎捷三同志。这一期进行了七个月的军政教育，于一九四〇年八、九、十月间陆续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

一九四〇年六月，原在鲁南滕县抱犊崮山区的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奉命归属抗大第一分校兼管，改为一分校的第一校；一九四二年后，第一校又直接划归分校建制，改为一分校的第一大队。与此同时，原在鲁西地区活动的冀鲁豫区教导队，也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奉命归属抗大第一分校兼管，改为一分校第二校，不

久后因第二校在敌人“扫荡”中遭到重大损失，且鲁西地区原领导关系改变，划归一二九师领导，即不再由抗大一分校兼管。而胶东支校，在此期间则改为一分校的第三校。

一九四〇年底至一九四一年初，第三期陆续开学。这一期，第二大队改为建国大队，专门训练地方政权的县、区、乡干部，四个月毕业；第三大队为特科大队，训练工兵、炮兵、机枪、防化学、测绘等专业干部，六个月毕业；第五大队为普通科，训练连、排军事、政治干部，四个月毕业。全校共二十个队，二千五百二十四人。这段时间分校领导干部没有变动，李培南同志升任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一年初，总校派出的山东派遣大队共四十五名干部到达山东，加强一分校的干部力量。山东派遣大队聂凤智大队长即调往胶东第三校，接替调任山东纵队第五旅参谋长贾若瑜同志任校长职务。政委仍为廖海光同志。

一九四二年二月，第四期开学，鲁南第一校改为第一大队，原第五大队改为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建国大队不变，共四个大队。同时，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冀鲁豫军区创办了一所陆军中学，下属四个队，学员六百多人。这一期因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校

部领导机关和学员队又经过几次调整。开始时，取消了训练部，校部直属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总务三个科，取消卫生科，合并为供给卫生科；政治部只设组织、宣传两个科和特派员。此时，李培南同志调离分校，由张雄同志继任政治部主任，阎捷三同志任教育长。不久，校部又取消政治教育科，政治教育工作归政治部宣传科负责；校部仅直属军事教育处和供给卫生处，另成立调查研究室，直属校首长领导。学员队同时进行整编，缩编成第一、二两个大队和一个营、团上干队；女生队停办，建国大队拨归地方政府负责。这时，一分校改由一一五师（后成立山东军区）领导，袁仲贤同志任副校长，张雄同志升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三年三月，第五期开学。这一期分校为更适应战斗环境的需要，进一步精简缩编。分校校本部改称山东军区教导一团，袁仲贤同志任团长，梁必业同志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孙继先同志任副团长（不久即调离），李梓斌同志任副教育长，校政治部改为团政治处，各科均改为股；原第一、二大队改为第一、二营，另有一个营、团上干队。与此同时，胶东的第三校也改为教导二团，由蔡正国同志任团长，刘浩天同志任政治委员，校部机关和所属大队也与分校

一样，进行缩编。这一期历时一年，主要进行整风学习，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毕业。

一九四四年六月开办第六期。此时仍称教导团，但取消营一级建制，由团直属五个队，其中一个上干队，两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并新建一个文化队，以学习文化为主，这一期历时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五月结束。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前夕，第七期在山东省费县县城开学，成立三个大队，其中第一大队包括四个连、排干部队；第二大队包括两个班、排干部和老战士组成的工农干部队，以学文化为主，两个胶东知识青年队，以军事、政治训练为主；第三大队为特科大队，包括迫击炮、重机枪、工兵等三个队。这一期开学不久，抗战胜利，一分校即奉命挺进东北。这批学员于一九四五年底到达通化市归总校建制时先后毕业，分配工作。

三、战斗频繁。

一九四〇年一月，第一分校到达山东时，山东还是一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刚刚建立不久，我们的山东纵队和所属各旅和支队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战斗经验还不丰富，根据地比较狭小，也不很巩固。而且这个地区国民党

反动派的势力比华北抗日根据地大，日、伪军也妄图趁我军的力量还薄弱时将我们消灭，这就使我们处于日、伪、顽势力的包围之中，“扫荡”与反“扫荡”、磨擦与反磨擦的战斗自然更加频繁，学校也就经常处于战斗准备和战斗行动的状态，所以必须在战斗中坚持教学。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一分校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战斗环境，号召全校教职学员“为进一步建设学校和彻底改变作风而斗争”，要求大家培养战斗作风，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为了适应这种游击战争的环境，除了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教学组织，经常转移校址以对付敌人的进攻外，着重研究和总结坚持敌后边战斗边学习的经验。开始各队采取教员随队进行教育，后来进一步实行了行政、教学合一的办法，由教员兼任连队的行政职务，使战斗行动指挥与教学计划的实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教学方式上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平时以连队为单位集中实施教学，遇有战斗情况或执行战斗任务时，则分散教学，以排甚至以班为单位上课。教员（连、排长或指导员）随身带上讲课提纲及必要的参考材料，利用行军中的大休息、宿营后和集合出发前等空隙，进行讲课或组织讨论。有时为了上课，教员要跑几十里路，翻几座大山，派武装掩护去上课；有时则派出

观察哨、游动哨到敌人据点围墙周围监视敌人，掩护学员安全上课。同时，为了巩固根据地，学校还担负发动群众和建立民主政权的任务，为此，学校曾建立过民运大队、独立团等组织，并经常派出部分干部和文工团参加地方政府的工作队，开展民运工作和减租减息的斗争。

由于一分校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边学习边工作边战斗，既完成了训练干部的任务，又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取得多次反“扫荡”反磨擦战斗的胜利。一分校直属队在山东的五年半中，参加较大的战斗就有一九四〇年的钢井战斗，两次垛庄战斗，蒙山反顽战斗，河阳战斗，官庄战斗；一九四二年冬的沂蒙反“扫荡”战斗；一九四三年的滨海北部反顽战斗，解放大店战斗，莒县战斗，和临沂等多次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又锻炼了干部和学员。胶东支校（第三校）也是在与日、伪、顽的战斗中坚持教学的。一九四〇年四月，一分校派出第一大队几十名教职员，在大队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同志率领下，挺进胶东创办支校。当通过胶济铁路封锁线时，日寇发觉，尾随追击，在高阳附近一个村庄被日寇包围。全体教职员与掩护部队胶东第十三团第三营指战员并肩战斗，奋勇抗敌，从上午九时直打到晚上八时，击

退敌人多次进攻，然后乘夜突围，经受了挺进胶东的第一次战斗考验。五月间，胶东支校刚开学不几天，六月一日，日寇就对我大泽山区进行“扫荡”，胶东支校在铁乔寺与敌人遭遇，当时支校的武器很差，有的学员连枪也没有，只有两枚手榴弹，但教职学员临危不惧，由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队阻击敌人，掩护全校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一九四〇年秋，胶东的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元部一个团突然袭击我大泽山区根据地，我胶东支校配合第十三团在平度县大田阻击敌人，经过一场激战，将敌人击溃，支校第一营还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枪，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后，日、伪、顽加紧勾结，妄图把我军挤出胶东，我胶东抗日军民斗争更加艰苦。为了培养更多的游击战争骨干，胶东第三校（原胶东支校）坚持在平（度）莱（阳）招（远）掖（县）边界根据地游击办学，采取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短期轮训当地八路军、游击队和地方政府干部的办法，三、四个月办一期，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战斗中战斗，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干部。一九四二年冬，日酋冈村宁次出动三万多兵力对我胶东根据地发动“拉网扫荡”，当时胶东第三校在校长聂凤智同志指挥下，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以营为单位分散转进，从

敌军的空隙中果断地跳出合击圈，转移到牟平县的陀山地区，再一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一分校在山东敌后根据地不仅边战斗边坚持军政教育，而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底还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学习整风文件，联系实际进行自我反省，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教育工作上，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加强了调查研究，使教育计划更加切合战斗环境和学员需要的实际，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方法上，废除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提倡启发、研究、实习、讨论的方法，使教学工作更加生动活泼，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一九四四年春，一分校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行了审干运动，对全校教职学员普遍进行了一次政治审查，最后，每个人都写了自传，使组织上对干部的政治历史有个比较详细的了解。总的来看，运动的开展还比较健康、顺利。

一九四三年七、八月间，山东军区曾对一分校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肯定了一分校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存在的一些缺点。最后，由山东分局常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代表分局和军区对一分校的工作检查作了总结，认为“抗大一分校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培养了大批干部，在巩固山东新的兵

团与改造新的兵团上起了一定作用；在教育工作上有了—套机构和—套教育制度，汇集和交流了山东各部队的教育经验，学校本身也初步地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除了教育工作外，还担负和完成了不少反‘扫荡’的战斗任务。”这个评价说明了抗大—分校在敌后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抗大—分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十月，奉山东军区的命令，—分校第七期的全体同志，由政治部代主任徐洪才同志率领，从山东费县城驻地出发，经莒县、诸城、莱阳等地，于龙口乘船渡过渤海湾，到了辽宁省庄河县，再经过安东、沈阳、抚顺，先期抵达吉林省通化市。—九四六年二月，抗大总校从绥德到达通化市后，—分校即归还总校建制，编入东北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担负起继续培养干部的新任务。

抗大第二分校

抗大第二分校于—九三八年十二月与第一分校同时成立，至—九四三年二月奉中央军委之命返回陕甘宁边区归还总校建制时结束，历时四年多，是抗大各分校中创办最早的分校之一。它办学时间较长，培养

干部较多，在敌后艰苦环境中，边学习边战斗，对晋察冀和冀中抗日武装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分校是以原驻陕北蟠龙镇的抗大第七大队和原驻瓦窑堡的抗大第一大队第一支队为基础，加上原驻延安的抗大第二、三、四大队的一部分和原驻栒邑县看花宫一带的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原驻三原县安吴堡的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以及原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等各一部分合并组成。第一任校长陈伯钧同志，副校长邵式平同志，政治部主任袁子钦同志，副主任张平凯同志，训练部长徐德操同志，供给部长吴先恩同志。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和原训练部长陈伯钧同志特地从延安骑马赶到瓦窑堡抗大一大队驻地，召开全体教职学员大会，宣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抗大第二分校的决定和分校首长的任职命令，并宣布将第一大队的第一支队改编为抗大第二分校的第一大队，任命原抗大一大队副大队长兼一支队队长詹才芳同志为二分校一大队大队长，原一支队政治协理员李中权同志为二分校一大队政治委员，率领二分校一大队作为先遣队挺进晋察冀边区办校。

罗副校长宣读完命令之后，接着进行了振奋人心的政治动员。他详细地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日寇的战略进攻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敌我的相持阶段很快就会到来。现在，尽管我们还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说，敌人向我们打过来，我们就要向敌人打过去，你们一、二分校的同志们先走一步，不久，总校也要开到前线去。今后，我们还要到敌后办起更多的抗大分校。“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这不是笑话，而是事实。他还鼓励大家说，我们抗大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我们既然是为了这个目的培养干部，就要到实际的战斗中去培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培养。那里有的是好条件，也有的是艰难困苦，我们就是要在同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培养出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才能去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罗副校长对形势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对大家殷切的期望，给予大家，特别是即将深入敌后的一支队同志很大鼓舞，他们都为能奔赴前线高兴万分。

先遣队出发之前，抗大总校第一大队政治委员胡

耀邦同志特地找李中权同志谈了话，了解他们“东进”的准备情况和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最后，亲切地对他说：“中权同志，一支队就要到前方去了，你们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只要搞好了干部团结，特别是搞好了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一支队出发那一天，苏振华大队长、胡耀邦政委和第二、三支队的战友都列队热烈地欢送他们踏上征途。与此同时，挺进敌后的各单位也先后进行了政治动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托付的重任，校首长和战友们的殷切期望，激励着深入敌后办学的同志们，使他们满怀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决心，向敌后挺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先遣队五个学员队出发不几天，二分校第一梯队由陈伯钧校长、袁子钦主任率领随后从延安出发，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到达晋察冀边区的灵寿县陈庄一带。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第二梯队在邵式平副校长率领下，也从关中地区向晋察冀挺进，于二月二十四日到达陈庄。此时，三支队两千多名教职学员在敌后胜利会师。

这次第二分校挺进敌后，正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征途是十分艰苦的。他们分别从瓦窑堡、延安、关中等地出发，经绥德，东渡无定河，再经米脂、葭县，来到黄河西岸。同志们面对这好似“天上

来”的“黄河之水”，想到即将奔赴敌后的抗日战场，心潮随着滔滔巨浪，汹涌澎湃，情不自禁地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用激昂的歌声驱散刺骨的严寒，压倒震耳的浪涛，抖擞精神，去冲破天堑的阻拦。

大家从支前船工们与惊涛骇浪拚搏的精神中，看到人民群众积极热情地支援我军的鱼水深情，并从中领悟到一条真理：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华民族前进的航程！抗日战争一定能够胜利，革命的理想终将彻底实现！

在船工们的积极支援下，抗大二分校的队伍一批又一批地抢渡过黄河天堑，进入山西的兴县，与一二〇师取得了联系，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亲切的关怀与照顾。一二〇师的部队沿途给他们通报敌情，提供补给，武装掩护；根据地群众箪食壶浆，借窑让炕，热情接待，使他们感到象回到了家乡一样。当他们要通过同蒲铁路时，一二〇师又派出部队监视敌人，群众也帮助侦察敌情，充当向导，保证他们乘夜安全通过封锁线。

队伍经过几天艰苦行军，进入晋察冀边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得悉二分校到

来，马上派出部队掩护，亲自掌握情况，使他们顺利到达河北省灵寿县的陈庄一带。这里属于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分区司令员熊伯涛、政委刘道生同志亲率部队出迎，聂司令员还派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舒同等同志代表军区首长来慰问大家，介绍晋察冀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和军区部队政治工作的情况，希望抗大二分校培养出更多能胜任前线作战需要的干部。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第一期开学。这一期编成四个大队，十三个队，学员一千一百零六人，大多是外来的知识青年。因为他们在陕北都经过短时间的学习，挺进敌后又经过实际的锻炼考验，并在行军途中结合实际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加之当时敌后急需干部以加强新发展的部队的骨干力量，因此，经过很短时间学习，于五月及八、九月间就分两批陆续毕业，除留一部分在校工作外，都分配到部队工作。

一九三九年五月，第二期开学，学员主要来自晋察冀军区北岳区四个分区部队的干部和冀中部分地区部队的干部，编成四个大队，十四个队；此外，还有地方干部一个队，共十五个队，学员二千三百二十七人。九月下旬，抗大总校来到晋察冀，二分校即将陈庄一带的校址让给总校，迁往灵寿县的韩信台和唐县、完县边境的神南镇一带继续进行教育训练。为了推动

军事、政治教育，分校提出“安心地学习，艰苦地学习，深入地学习”等口号，开展了“学习突击周”、“战斗学习月”的革命竞赛活动，并经常组织各个大队互相观摩，组织军事、政治、体育考核比赛，掀起学习热潮，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这一期至一九三九年底先后毕业。

第三期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开学，分设高级科、上级科和普通科。高级科主要训练团长、团政委和总支部书记等团、营级干部，编为一个队；上级科主要训练连长、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等连队干部，也编成一个队；普通科主要训练班、排长，编成四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四、五个队。全校共有教职员四百九十六名，学员三千五百二十六名，共计四千零二十二名。这一期学员的质量比较高，原任团级干部一百三十余名，营级干部一百五十余名，党员占学员总数百分之六十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干部占百分之十三，工人出身的占百分之九点六，农民出身的占百分之七十八点七，其他成份仅占百分之十一点七。由于老干部和工农干部占绝大多数，他们政治上纯洁，对敌斗争坚决，吃苦耐劳的精神好，而且他们中间大部分是边区子弟兵。河北籍干部占百分之六十七，与当地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对坚持敌后斗争，开展群众工

作都较有利。但他们普遍文化程度很低，文盲半文盲占百分之七十，所以第三期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增加了文化教育时间，军事训练占百分之五十，政治教育占百分之三十，文化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并在政治教育中加强政治常识与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把他们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思想高度，克服小资产阶级自私、狭窄和眼光短浅等弱点，使他们在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上得到全面提高。这一期于一九四〇年底毕业。

一九四〇年一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迁往晋东南前，曾派出抗大第三团挺进冀中地区驻训干部，一九四〇年六月间，总校奉命召回抗三团准备组织山东派遣大队和第二华中派遣大队，以加强抗大第一、第五分校，并令第二分校派出一个大队接替总校抗三团在冀中的驻训任务。二分校即派出第一大队到行唐县的口头、黎沿庄一带，与总校抗三团留下的少数教职员合编成新的抗大第二分校第三团，由团长陈文彪、政委李中权、政治处主任陈宜贵等同志率领，于八月间在定县十家瞳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进入冀中平原办校，接受冀中军区和第二分校的双重领导。抗三团在冀中平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边战斗边学习，先后为冀中军区培训了三期学员，向战斗部队输送了近四千

名干部，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第四期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开学。这一期高、上科的团、营、连干部学员近三百名；普通科班、排干部学员三千九百多名，全校学员四千二百多名，编为四个大队。不久，因为日寇的“扫荡”和封锁，解放区的生活日益困难，又随时准备战斗，所以，晋察冀军区决定普通科四个大队分散到一、二、三、四分区，改称为分区教导大队，由分区直接领导指挥，分校负责进行教学业务的指导，这就便于各分区就地轮训更多的基层干部，提高干部的水平。这样，分校校部只留下高、上科三个队，近三百人。

一九四一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决定，二分校成立附设中学和陆军中学，自力更生培养干部苗子。这两所中学共十二个队，二千多人。他们入学后，年轻人大大增加，使二分校更富有朝气。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分校奉中央军委之命，由校部机关率高、上科共三百多人到陕北绥德回归总校建制；附属中学也随后出发，于五月抵达甘肃省合水县与第七分校陆军中学合并，编为第七分校第二大队。二分校陆军中学原定同时前往陕北，后因参加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战斗，直到一九四四年春才迁往绥德，编为抗大总校第二大队。第二分

校即宣告结束。

第二分校在晋察冀和冀中地区敌后根据地坚持办学四年多，先后培养了两万多名干部。它在办学中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重视学校的革命化建设。

第二分校组建之初，总的说来，教职学员的情绪是比较高的，但由于组成的单位很多，工作作风、生活习惯各不相同，一时不够融洽。一些原来从前方调来的干部，缺乏学校工作经验，到了晋察冀，地处前线，都想回主力部队，不安心学校工作。第一期的学员，都是外来的知识青年，在延安时可常听领袖、名人演讲、上课，到了敌后，只能偶尔听到军区首长的报告，大多是队长、教员上课，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来到敌后，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生活又不安定，有些学员就不安心学习，甚至个别要求退学。这些问题，引起了上级和二分校领导的重视，认识到不抓好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学校的革命化建设，就无法在敌后开展教育事业。于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召开全校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整顿干部的思想；四月二十八日又召开全校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强调提出“加强党性，加强无产阶级化”的口号，要求巩固学校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学校各项工作的领导，严格党

的组织生活，反对自由主义，提高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并选举产生了分校的党务委员会。会后，在全校开展了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整顿了作风和纪律，建立每天十五分钟生活检讨会的制度，初步扭转了开学初期教职学员中的思想纷乱状态，安定了情绪。

一九三九年九月，总校到达晋察冀边区后不久，听取了二分校工作的汇报，并检查了二分校的工作，指出分校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同时，对分校今后的建设作了明确的指示，对主要领导干部作了调整：袁子钦同志与我对调，我到二分校任政治部主任，袁子钦同志调任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九四〇年八月，陈伯钧同志当选党的“七大”代表，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后因“七大”延期，即留在延安学习，由孙毅同志继任二分校校长。

为了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分校政治部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简称“五八政工会”），总结交流一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会议认为，学校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出军政双全、德才兼优的军政干部。为完成此任务，发挥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要求每一个政工干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共产主义的优秀品德；

(二) 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三) 培养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四) 发扬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同时，强调政工干部要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个教职学员中去。

“五八政工会议”结束不久，分校接到晋察冀军区关于在全区开展“创造模范支部、模范党员、模范干部活动的通知”。分校政治部认识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促进分校革命化建设的关键。于是，要求各单位在贯彻“五八政工会议”精神的同时，应在全校广泛开展“创造模范党支部、模范党员、模范干部的活动”。在很短时间内，各单位普遍整顿了党的支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而且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政治工作。各支部都把模范支部、模范党员、模范干部的条件抄贴在俱乐部，以便对照检查；并坚持每天收抄新华社广播电讯，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指示和讲话，开展经常性的形势任务教育。各级干部也经常深入学员队，了解思想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同时，各学员队都积极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文艺晚会。分校文工团和抗三团的“洪炉剧社”，经常排演一些配合中心任务和宣传教育的丰富多采的文艺节

目，到学员队和驻地群众中巡回演出。群众性的文娱体育活动也日趋活跃，有流动俱乐部、墙报、篮球架。走到那里就带到那里，一有机会就进行墙报展览和篮球比赛，把学校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课余活动更加丰富多采，到处生气勃勃，既推动了教学工作，又活跃了部队情绪，鼓舞了教职学员的斗志。到年底第三期毕业时，全分校评选出七个模范党支部，三百三十九名模范党员和模范干部，发扬了正气，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圆满完成。

二、培养战斗作风，提高学校的战斗力。

第二分校所处的晋察冀边区是一个创建比较久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战斗力强，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但由于它地处敌后，日寇把晋察冀边区看作它心腹之患，几乎每年都要进行几次大“扫荡”。因此，分校就必须时刻戒备，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一九三九年秋、冬，二分校刚到晋察冀不久，就先后参加了两次反“扫荡”战斗。九月二十七日（旧历八月十五日），石家庄的日、伪军一个联队一千五百多人，突然经慈峪向我二分校驻地陈庄一带猛扑，妄图消灭我们二分校和驻在这里的党政机关。当时我主力部队距陈庄还远，为迟滞敌人行动，掩护全校及后方机关转移，等待我主力部队赶来，一大队一支队长张行中、教导员

谢特山同志奉命带领第六、七两个队迅速抢占敌人偷袭陈庄必经的南山头，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赢得了时间，掩护全校同志、地方机关和驻地群众安全转移。这时，我晋察冀第四分区第五团和从冀中途经晋东北的一二〇师主力亚五团、亚六团等部队闻讯赶到，将来犯之敌紧紧包围，在张宗逊旅长和陈伯钧校长的直接指挥下，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了这股敌人，取得了辉煌战果，为抗大总校来到敌后送上一份“见面礼”。解放后，一九五四年当地人民政府为纪念这次战斗的重大胜利，悼念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特在陈庄附近的横山岭上建造了一座“陈庄战斗纪念亭”，亭内石碑上刻有这次战斗胜利的经过和歌颂英雄们英勇善战业绩的碑文，以留芳后世。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日寇乘我主力部队集中于河北涞源与完县之间的黄土岭围歼“扫荡”我根据地的敌人的机会，突然从河北唐县、完县出动，奔袭合击我驻神南地区的后方机关。当时我二分校刚将原灵寿县陈庄一带驻地让给总校，移驻灵寿县韩信台和唐县、完县边境的神南镇一带不久，为了掩护校部和当地后方机关转移，校首长又派出第一大队担负阻击任务。大队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等同志率领一大队

与敌人激战两天一夜，直至胜利完成掩护任务才撤出战斗。

战斗的环境需要培养战斗的作风，因此，分校领导要求全校教职学员以战斗的姿态进行教与学，平时严格军事生活，养成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良好风气。为了提高学员掌握和指挥部队的的能力，分校建立了学员见习和实习制度，每个学员都须轮流担任区队长（排长）。野外演习时轮流担任班、排、连长，使他们在实际演练中得到锻炼提高。孙毅校长特别重视学员的体质锻炼和提高学员的行军机动能力，经常教育大家“胜利在脚”，利用早操、训练时间带领大家爬山、急行军，并积极开展体育活动。一九四〇年十月，全校举行了一次野营大演习，历时一个月，地区广及第三、四两个分区，把即将毕业的学员全部带出去，在敌占区附近活动，武装袭击与扰乱敌人，锻炼和考验学员的实战指挥能力与政治工作活动能力，使教育训练与实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三日，日寇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空前残酷、持久的秋季大“扫荡”。在“扫荡”中，日寇把“消灭抗大”作为它的重点目标之一，用飞机撒放了十余万份《敬告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生诸君书》。传单撒遍滹沱河两岸与阜平、

行唐、灵寿地区，对我二分校教职学员进行威胁、恫吓。敌伪报刊还扬言：“消灭抗大，就等于消灭边区一半。”

面对张牙舞爪、色厉内荏的敌人，我二分校在晋察冀军区首长的指挥下，展开了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反“扫荡”斗争。当时因为分校是教育单位，武器装备很少，全校只装备不足总人数六分之一的旧式武器用以自卫，斗争更加困难。所以，分校领导在组织对敌情进行周密侦察、分析之后，认真讨论并制定了反“扫荡”的计划，决定利用敌人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弱点，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当敌人准备向我冀西地区进行“扫荡”时，由我和抗一团团长唐凯、政治处主任傅崇碧同志率领抗一团挺进冀中地区，与抗三团汇合，继续进行教育训练；由校长孙毅同志带领校直属队和抗二团留在韩信台和神南镇一带山区，边战斗边坚持学习，以此粉碎敌人的“扫荡”阴谋。

从冀西到冀中必须横跨平汉铁路，敌人对平汉铁路封锁甚严。铁路两侧岗楼密布，公路纵横，并挖了三四米宽、两米多深的封锁沟。封锁线周围的树木全被砍光，不许老百姓种高杆庄稼，只能种点红薯之类的农作物。敌人白天、黑夜有岗哨在炮楼上瞭望；

夜晚还派出“铁甲车”在铁路上来回巡逻。车上的探照灯四处照射，对我们威胁很大。因此，要通过封锁线就必须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在武装掩护和当地群众的指引下，才能利用夜间寻隙通过。我们抗一团的队伍曾先后两次准备通过封锁线，但都遇到敌人的铁甲巡逻车，只有先头梯队少数同志通过，直到第三次才寻得空隙乘夜全部跨越封锁线。可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当队伍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冀中平原不久，突然发现前面不远有两股敌人由东向西朝我方逼近，我们当机立断，命令队伍分散到附近村庄隐蔽，避免与敌人遭遇，待敌人过后，我们才继续东进，与冀中的抗三团会合，乘敌人集中兵力“扫荡”冀西，冀中地区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根据冀中平原地区的地形特点，进行“平原游击战术”课目的训练。同时，我还利用这个机会，检查了抗三团的工作。这年夏天二分校在冀中招收的附设中学学生刚刚集中，我们就对这批学生进行初步的入伍教育和训练，准备把他们带回冀西校部。

在此期间，孙毅校长带领校直属队和抗二团坚持了冀西反“扫荡”斗争。由于平时重视战斗作风的培养和体质的锻炼，个个练成了“飞毛腿”、“夜老虎”的过硬本领，所以能更好地利用冀西层峦叠嶂、

沟壑纵横便于游击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翻大山、走小道。严重突围七次，大小转移四十二次，行程一千二百余里，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沟里兜圈子，使敌人到处瞎碰瞎撞，疲于奔命。而我们除政治部、文工团受到一点损失外，整个队伍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利用反“扫荡”的一切机会，开展教育训练。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有五百多名学员毕业，分配回部队工作，加强了部队的骨干力量。

当敌人“扫荡”冀西的计划破了产，掉过头来部署“扫荡”冀中地区时，我和唐凯、傅崇碧同志又率抗一团在敌人行动之前，从冀中带领新招收的附中学生越过平汉路封锁线，返回冀西。抗三团仍留在冀中坚持斗争。这次过封锁线比上次更加艰巨，因为附中的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其中还有些小姑娘。他们年纪小，体质弱，要急行军、越沟坎，的确艰难。有时刚接近封锁线，遇到敌人阻击，一个也过不去；有时刚过一部分，敌人发觉，又扫射，又打炮，后续的梯队只好返回。就这样，先后过了五次才全部通过，而且还付出了血的代价。在一次过路时，敌人发觉了，从炮楼上用机枪、火炮疯狂射击，十几个男女学生遭到伤亡。担任接应任务的十七团一位机枪射手，为了掩护学生，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自己英勇牺牲了。

抗一团团长唐凯同志，勇敢沉着地在铁路线上指挥战士搀扶小同学过封锁沟，也光荣负伤。“老八路”英勇牺牲的精神，感动和教育了“小八路”，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树立起英雄的榜样。他们也顽强地紧跟抗一团老大哥的前进步伐，勇往向前，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我和唐凯、傅崇碧等抗一团的同志，带领附中学生历经艰险、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回到冀西的灵寿县陈庄一带与校直属队和抗二团的同志会师。孙毅校长得悉我们胜利归来，十分高兴，马上带着校直属队和抗二团的同志敲锣打鼓迎出村外。两个团的战友分别虽然只有两个多月，但这两个多月是在战火硝烟中度过的，战友的情谊经过战斗的洗礼显得更加诚挚，更加炽热，犹如亲人久别重逢，格外亲热。在欢庆胜利的晚会上，校直属队和抗二团的同志报告他们反“扫荡”胜利的经验；抗一团和附中的同志报告他们开展训练的成绩和突破敌人封锁线的艰难历程。战友们亲切地促膝交谈，愉快地歌唱，纵情地起舞，直至深夜，整个分校营地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

二分校抗三团长期坚持在冀中平原驻训干部，环境更加险恶，斗争更加复杂。当时日、伪军在我冀中根据地八千个村庄、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竟修

筑了一千六百多个据点，三千多公里公路，一千七百多公里封锁沟；碉堡成群，火力相接，沟路交错，密如蛛网。日寇凭借它装备好、火力强、机动快等军事优势，频繁地进行“扫荡”。抗三团就在这种环境下坚持战斗，坚持学习。为了让敌人摸不清他们的活动规律，避免遭到敌人偷袭，他们经常变换活动地点，一般是二至三天为一个教学总结日，总结完就转移。行军时一般都是黄昏出发，如果当夜十二点以前能够到达宿营地，则第二天不出早操，白天照常上课；如果是黎明前到达，则上午休息，下午上课，就这样争分夺秒地以战斗姿态完成了教学计划。在一九四一年敌人发动秋季大“扫荡”时，抗三团因为平日训练有素，战斗作风好，很快从七分区敌人的合击圈中跳出来，转移到九分区继续进行教学，也没有受到损失。

在多次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中，二分校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许多同志为了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英勇牺牲的烈士，一九四二年夏天，二分校在韩信台校部驻地修建了一座“抗战烈士纪念碑”，孙毅同志亲笔题词：“烈士之血，革命之花”；我也题下了：“抗大之光，民族之光”八个大字，表达了我们的缅怀英雄、敬仰先烈的心情。纪念碑落成之日，聂荣臻司令员还

亲临参加落成典礼，并讲了话。遗憾的是，这座纪念碑在以后日、伪军大“扫荡”时被破坏了，现在仅留下一幅珍贵的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

三、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牢固的群众基础。

抗大第二分校能够坚持在晋察冀和冀中地区办学，依靠根据地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是最重要的条件。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由于连降大雨，山洪暴发，造成晋察冀边区空前的大水灾，陈庄一带灾情十分严重。二分校到达陈庄不久，立即投入救灾运动，全体同志自愿把一天三餐改为两餐，把过去老百姓作为牲口饲料的黑豆当作主食，甚至挖野菜充饥，以减少群众的负担，让群众休养生息，渡过灾荒。同时，分校发起了募捐竞赛，从校首长到勤务员，大家都捐出一两个月的全部津贴费；有的还把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也捐献出来，全校共募集四千余元。此外，全校还动员起来，帮助群众修补房屋，修筑道路，排水耕种，并开展卫生大扫除运动，防止灾后发生瘟疫。日寇对我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残酷实行“三光”政策，铁蹄践踏过的土地，许多民房被烧毁，到处一片瓦砾。战斗结束后，我们马上帮助群众修建住房，救济遭难群众，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一九四〇年，为了粉碎日寇的经济封锁，二分校响应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号召，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种菜一千五百多亩，养猪三百头，羊六百头，还植树一万五千三百九十五棵，改善了生活，减少了人民的负担。同时，还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二万七千八百一十三个工日，为群众修房一百九十二间。学校的医务人员经常为群众看病，有的同志还帮助群众理发。至于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推磨、拉碾，更是常事。这些爱民行动，促使军民关系日益密切。

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使二分校在敌后如鱼得水，在战斗频繁、流动性大的情况下，无论走到那里，都能得到群众的支援。群众为我们侦察、通报敌情，使我们耳聪目明；群众为我们当向导、传消息，使我们活动自如，处处主动；群众给我们腾房让炕、送粮送草，使我们处处有家。抗三团在冀中地区，五个分区跑遍了四个，很多村庄他们常来常往，老乡对他们很熟悉。他们每到一村，大爷、大娘总是象迎接自己的儿女一样，把以前住过他家的同志接回去，久而久之，便形成习惯，一进村庄连住房也不用分，很快都住到老乡家中去了。他们活动时也用不着带粮食，地方政府在各村都储备了公粮，吃完饭，如数填上张单据，盖上公章就行了。正因为分校扎根在群众之中，所以，

才能在斗争艰苦、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教学，培养出大批干部。

抗大第三分校

抗大第三分校是一九三九年七月总校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办学时留下来的一部分教职学员组成的，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奉中央军委之命到绥德与总校合并时结束，历时三年半。因为它留在延安，环境相对比较安定，较好地坚持以教育为中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特种兵干部、参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为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分校第一期都是抗大总校第五期留下来的学员，编成两个大队及政工队、参谋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队等共十五个学员队，二千七百五十八人，其中八路军干部仅二百四十人，外来的知识青年二千五百一十八人，占绝大多数。第一任校长许光达同志，教育长张振凤同志，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同志，副主任张正光同志。因为这一期大多是一九三九年以后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先后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随到随即编队。总校离开延安后，他们又重新合并、改编，所以入学的时间参差不齐。他们重点学习马列主义

基础理论和军事基本知识，改造世界观。学习结束后分为两批毕业，除少数留校工作或派往敌后部队工作外，大部分都分配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工作。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三分校第一期（又称抗大总校第五期）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暨欢送毕业同志上前线大会，党中央领导人王稼祥、陈云等同志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同志应邀出席大会。陈云同志对毕业同学提出：“一、不怕作小事；二、对老干部相处要好；三、在工作中学习”等三点希望，作为临别赠言，鼓励同志们到斗争中继续学习。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举行第二批学员毕业典礼，同时举行在校同学（当时第二期已经开学）与留延安毕业校友联欢大会。朱德总司令、王若飞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谭政副主任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王若飞同志作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朱总司令作了指示，提出了几点希望：“一、学员们上前线不要骄傲，要和一切的干部团结一致；二、要爱护老百姓、帮助老百姓，不要有军阀的气息，不要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三、要尽量团结各党各派各友军队伍一致抗日。”最后，朱总司令要求毕业学员：“要继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使理论和实际打成一片。”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七日，第二期正式开学。由于

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外来知识青年进入延安已很困难，所以，这一期从八路军来的干部占大多数，学习时间比较长，至一九四一年九月陆续毕业，历时一年多。在此期间，许光达同志调离三分校，一九四一年二月，陈奇涵同志继任校长。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第三期开学。这一期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根据当时战斗任务的需要并考虑今后部队的发展和组织反攻的需要，中央军委要求在训练干部的工作上，前后方要有个分工，前方训练步兵干部，后方则主要培养特种兵干部。因此，这一期三分校的主要任务转为培养炮兵、工程兵干部和俄文干部。全校有三个大队，其中两个炮兵队，一个工兵队，一个机械工程队，一个参谋训练队，一个步兵队，两个俄文队，共八个队。为加强炮兵、工兵的教学力量，军委决定，将原来的工兵学校及炮兵团教导营调来与三分校合并。这一期校长为郭化若同志，政治部主任为黄志勇同志。不久，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由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总参谋长兼任副院长，郭化若同志任教育长，黄志勇同志仍为政治部主任。

军事学院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全院分为高干队与特科队两个部分：高干队训练

旅、团级干部，只有一个队；特科队有炮兵两个队，工兵、参谋、俄文各一个队，共五个队。一九四二年三月，高干队调去中共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四月，调来原八路军军政学院^④第四队，编为上干队；五月，俄文队与军委四局合并成立俄文学校；十一月，参谋训练队和炮兵一队毕业，炮兵二队调回炮兵团继续训练，工兵队也同时结业。叶剑英副院长亲自参加了参谋训练队的毕业典礼并讲了话，号召毕业同学到战争中去锻炼，把学到的业务知识运用到战斗实践中去，加强部队的参谋业务建设。军事学院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结束，历时一年，仅训练了一期学员。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同志为军事学院院长，李井泉同志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三月，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从晋东南敌后返回陕北绥德县办学，并令军事学院（原三分校）迁往绥德与总校合并，开始时仍沿用“军事学院”名称，不久，又恢复抗大校名，军事学院即宣告结束。

三分校在延安办学三年半，与敌后办学的环境不同，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环境相对比较安定，坚持以教育为中心，培养了大批人才。

三分校设在延安，比敌后的游击战争环境要安定得多，但在建校初期，未能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抓好教学工作。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央军委对三分校的工作进行检查，发现在教育上存在着“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教育计划只完成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时，根据北方局检查二分校的结果，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中央军委于七月二十五日发出《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⑤。三分校根据军委的指示，决定切实转变工作方针，把学校工作的中心放在教育与党的工作上，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教育，党是完成一切工作的推动机。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把第一期的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提出了每个阶段的中心工作：

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九年七月至八月底。在教学上提出了“埋头读书”的口号，安定学习情绪，并从组织上保证学员读书的条件，紧缩了学校的行政机构，增加了教育干部的配备，提高学习理论的兴趣，造成学习理论的浓厚空气。在政治上则强调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中心，整顿与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使之在各项工作中确实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同时，强调宣传教育工作，少鼓动，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避免形式主义。经过这一段工作，基本上纠正了开学

初期对教育抓得不紧，党的工作不强与形式主义的缺点，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以教育为中心的轨道。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二月。提出了“深入教育”的口号，一方面端正学员的学习态度，提高他们的学习情绪与学习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从组织上保证读书条件，改造了学习小组，减少了学员的勤务，连队干部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参加听课和讨论。同时，要求教员改进教学方法，把理论和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不发生原则性的错误。要求学员把理论学习的效果落实到行动上，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言论和行动。经过这个阶段的工作，确使教育工作深入一步。在争取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变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三月。在教育上提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号，为此，在连队中增设了军事助教和政治助教，减少每周上课的次数，使学员有充分的自习和讨论的时间。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使教育质量提高了一步，较好地完成了第一期的教育任务。

第二期开学后，三分校继续贯彻军委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的工作经验，坚持以教育为中心。由于这一期的学员从八路军来的工农干部占大多数，三分校

又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提出了对八路军来的工农干部的五条教学原则：一、要使他们学会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克服他们中存在的农民意识、私有观念、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二、要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培养成为坚强的干部；三、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四、对他们要加强革命纪律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教育；五、要帮助他们整理经验，把这些经验提高到理论原则上来，使他们把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反对经验主义的倾向，养成读书的习惯。

由于三分校认真贯彻军委的指示，坚持以教育为中心，所以能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出大批人才，特别是特种兵、参谋人员和俄文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对我军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继承和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学习，一面进行生产建设，取得学习、生产建设双丰收。

三分校所处的环境虽比敌后各分校较为安定，但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抗战的中心；是日、伪、顽的眼中钉，所以，它们必然要对我陕甘宁边区进行袭扰和破坏。日寇自一九三八年底就开始对延安进行轰炸，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也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不仅扣发了全国人民给予我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而且于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侵占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个县城，在我边区周围部署了胡宗南等部二三十万兵力（最多时达四五十万兵力），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堡垒的封锁线，对我边区进行政治压迫、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给我们边区制造了许多困难，特别是物质上的严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到抗大三分校讲演时，曾风趣地对大家说，蒋介石不给我们那几块钱有什么要紧？他给我们那几块钱，还不够我们买辣椒吃！我们主要是靠自力更生，劳动生产，克服困难。毛泽东同志爽朗的笑声和诙谐、乐观的话语，激起了一阵笑声与掌声，给大家很大的启示，使大家充满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投入了生产建设的热潮。

三分校当即提出：“没有粮食自己种，没有窑洞自己挖，没有木炭自己烧”的行动口号。因为三分校是抗大总校几个大队合编而成的，开始时驻地比较分散，不便于领导与教学。一九四〇年四月，分校领导决定把校舍集中在一起，但窑洞不够，所以，从四月六日至十五日发动一个生产与建设运动，在十天内就开荒

种地二千亩，新挖窑洞六十个，可容纳四百人，比预定计划多种地二百亩，多挖窑洞十个，超额完成了任务。五月初，分校就全部集中到清凉山一带上课学习了。

为了解决烧饭、烤火的燃料，平时，他们七、八天就要组织人到离延安四十里的劳山去背柴；冬天还要进山里去烧木炭、背木炭，仅一九四〇年冬，他们就自给木炭二十二万九千四百斤。背炭的劳动又累又脏，往返一趟要走几十里山路，而且个个搞得满脸满身乌黑，可是不管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不论男女老少，人人都争先去背，少者背二、三十斤，多者背七、八十斤，大家边走边唱，或边走边讨论问题，兴致勃勃，接受劳动锻炼。

三、三分校在党中央身边，听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报告和参加政治活动比较多，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

三分校驻在延安，经常可以聆听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报告，而且可以经常参加党中央发起的各种政治活动。例如，一九三九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了揭穿蒋介石所谓“实行宪政”的骗局，在延安开展了宪政宣传和成立宪政促进会的活动。十二月二十八日晚，抗大三分校就在中央大礼堂

召开大会，成立了抗大宪政促进会，选出许光达、李逸民等十五位同志为促进会筹备委员，并通过决议，全体参加延安宪政促进会。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三分校又参加了延安各界的“讨汪大会”，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听取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所作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⑥，并以大会的名义发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⑦。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蔡畅等四位同志从苏联返回延安；五月二十六日，朱德、康克清同志从敌后返回延安；文学家茅盾同志和社会科学家张仲实同志由新疆同日到延安参观；五月三十一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从重庆到延安参观。这几次，三分校均与延安各界人士一起组织欢迎，参加欢迎会，听取周恩来、朱德和茅盾、康克清、张仲实等同志的讲演，听取陈嘉庚先生介绍爱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情况的报告。这些活动都使抗大的教职学员打开眼界，扩大视野，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形势的发展，看到全国同胞和国外侨胞对我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热爱和支援，更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七日，三分校听到百团大战取得伟大胜利的捷报，立即致函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

总司令表示祝贺，并于二十二日与军政学院、医科大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供给学校等在延安的院校举行祝捷联欢大会，热烈庆祝。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三分校又与延安各界群众一起集会抗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准备投降的阴谋。这些政治活动既教育了抗大学员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面目，又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学会正确分析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这就使理论学习与当前的斗争实际更紧密地结合，使他们毕业后在各个战线上能正确地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部队和群众去赢得斗争的胜利。

抗大第四分校

抗大第四分校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创办，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五年半，是抗大总校在新四军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吸收华中和江南革命知识青年最多，坚持在豫皖苏边区平原游击战争艰苦条件下办学，成绩显著的一所分校。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徐州、开封相继沦陷之后，广大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党中央

及时指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速陷入敌手，我应准备向豫、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九月初，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区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河南省委据此决定，由彭雪枫同志率新四军游击大队三百余人挺进豫东。十月一日，支队由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出发，抵达西华县杜岗，与新四军第三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扩大为三个大队，共一千零二十人。仍用游击大队番号，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员。十月下旬，游击大队即东渡黄河，经鹿邑，进入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依据豫东、皖北平原地区的地形特点，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打击伪军、土匪，初步打开了豫东的抗战局面。

一九三九年初，游击支队继续东进，开辟商邱、亳县、永城地区，部队积极对敌作战，得到很大的锻炼和发展，经过整编，组建了三个团。同时，为培养基层干部，建立了随营学校，有学员二百人左右，这就是抗大第四分校的前身。

游击支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至一九三九年底，全支队已成为一支拥有九个团、一万余人的游击兵团，番号改称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同时，根据地建

设也初具规模，先后成立了豫皖苏联防办事处及各县区政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刘少奇同志进入华中敌后，途经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第六支队部时，检查了第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的工作，着重指出，第六支队的发展和地区的扩大，证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进军敌后的方针完全正确，证明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完全可能。同时指示六支队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武装群众，建立与改造政权，除创建永（城）夏（邑）肖（县）宿（县）四县根据地和睢（县）杞（县）太（康）、鹿（邑）亳（县）商（邱）小块根据地，以便尔后连成一片外，还应巩固、扩大部队，加强部队建设，准备在一两个月后，向津浦路东发展，放手创建苏北敌后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初，第六支队向津浦路东发展的条件更加成熟，部队已发展到十三个团，一万二千余人。当时中央指出：继续发展华中抗日进步势力，是制止国民党反共投降逆流，争取时局好转的重要一着。中原局应当坚决地、有计划地在豫东、皖北、苏北建立民主政权，与八路军密切协同，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中央赋予第六支队的任务是：确实掌握黄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这个地区建成巩固的

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势力，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并扩大军队至四万人。同时中央还确定调八路军第三四四旅等部南下，以增强华中中的抗战力量。

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第六支队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充实永城、夏邑、肖县、宿县、亳县等五县机构，建立边区联防委员会，一面发展区乡武装和自卫队，成立永城、肖县、宿县三个县独立团，并抽调一批地方武装充实主力部队。同时，又以四个主力团执行向北开辟商邱、亳县、宁陵、夏邑和砀山南游击区的任务，成立了砀南县政权，为八路军南下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随着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武装的发展与扩大，干部需求量大大增加，干部问题就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央决定将第六支队随营学校扩建为抗大第四分校，并命令抗大总校组织一支二百余人的华中派遣大队到六支队，加强第四分校的领导与教学力量，就地培养干部。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八日，抗大四分校第一期在安徽省涡阳县北麻塚集举行开学典礼，学员有五百多人，分校领导干部大多由第六支队首长兼任：彭雪枫同志兼任校长，吴芝圃、张震同志兼任副校长，肖望东同志兼任政治部主任；由方中铎同志任教育长，负责分

校的日常工作。当时，由于抗大总校第一华中派遣大队尚未到达，学校干部太少，特别是有教育经验的干部更少。有好多连队只有一个干部兼任连长、指导员、支部书记三职，教员更感缺乏，全校仅有一名专职教员，大部分都是支队和当地党政机关的干部兼任教员，因他们本身工作忙，难以全面兼顾教学工作。

六月一日，分校开学不久，支队首长为检阅在新兴集一带集中整训的八个团和抗大四分校的训练成绩，在新兴集举行了纪念“五卅”万人大会。不料日寇闻讯出动了一千余人的快速部队，分四路包围新兴集，妄图对我突然袭击。在这紧急关头，彭雪枫司令员果断地指挥部队和抗大学员，顽强地进行反击，歼敌二百余人。当晚即将敌击溃，分校安全转移。这是四分校成立后经受的第一次战斗考验。

抗大总校派出的第一华中大队二百余名教职员，在大队长刘清明、政治委员李干辉等同志率领下，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从晋东南的蟠龙镇出发，通过日、伪军重重封锁的平汉、陇海铁路线，于六月底到达第四分校。这时，上级任命刘清明同志代替方中铎同志为教育长，李干辉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其他干部和教职员都分配到校部和学员队中去，大大加强了四分校的领导和教学力量。

第一华中派遣大队来到四分校后，学员数量增加到一千多人，共编为三个大队，九个队，其中包括一个防化学队和一个女生队。这些学员一部分来自六支队的军事、政治干部，而大部分则来自河南、安徽等沦陷区的革命知识青年。根据知识青年较多的特点，在课程安排上，基本上按抗大总校第四、五期的方案，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等基本理论课和游击战术、步兵战术及兵器常识、射击、投弹等军事技术的基本知识课程。由于学校驻地距离日、伪据点只有二、三十里，常常可以听到炮声，而且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和土匪到处扰乱。为了适应战斗环境，分校提出了“加强军事生活，加强战斗准备”的口号，每个干部、学员都发了枪，全校武装起来，加强战斗训练和演习。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个大队（营）在夜间紧急集合只需八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连炊事员一起从各个村庄跑到预定地点集合完毕。这一年八月一日，全校举行一次战斗演习，成绩很好，深得支队领导的赞扬。

第一期经过六个月学习，于九月十五日毕业，除了中途陆续分配工作返部队以外，坚持到最后毕业的学员共六百余人，其中百分之五十七分配到新四军部队，百分之二十三分配到地方政权机关，百分之十一

到民运工作部门，百分之六为财政税收人员，百分之三分配做妇女工作，初步解决了豫皖苏边区部队与地方机关缺少干部困难。

第二期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在北麻塚集附近的一个村庄正式开学。这时，六支队已改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同志，仍兼任第四分校校长。这一期的学员既有部队和地方干部，又有外来的知识青年，约九百人左右，编为两个大队，七个队，其中三个部队干部队，一个地方干部队，三个知识青年队（其中一个女生队）。

一九四一年初，日寇为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巩固占领区，准备向太平洋扩张，一面积极诱迫蒋介石投降，一面加紧对我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华中，日寇进一步扶植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并趁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机会，调整和部署兵力，扩大伪军，向我军疯狂进攻。日寇华中派遣军所辖第十一、第十三军团，共十四个师团，二十一万八千人，其中用来对我军作战的就有约十一万人；华中伪军总数十五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投敌过来的），也全部对我作战。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为了实现它驱逐华中我军至

黄河以北，以配合日寇聚而歼之的目的，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王仲廉、李品仙、顾祝同等率领三十多万反共大军，向我豫皖苏、皖东、皖中、鄂中、苏南等敌后根据地进攻。豫皖苏边区位于津浦路、陇海路、黄河及淮河之间，是华北、华中我军联系的纽带之一，也是我发展华中抗战、向东挺进苏北敌后、向西连接中原的前进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它不仅是日寇“扫荡”的重点地区，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军进攻矛头的主要目标。当时，蒋介石除了原部署在豫东、皖北的第十二军、骑兵第八师和地方部队外，又从豫西调来国民党嫡系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作为骨干力量，总计九个师，二十万兵力，约为我第四师兵力的七倍，进攻豫皖苏边区。这样，我华中部队特别是第四师就处于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之下。

在豫皖苏边区的抗大第四分校，面临日、伪军“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艰苦环境，根据彭雪枫司令员“一面进行教学、一面准备战斗”的指示，把学校暂时分成三个梯队，每个梯队三百人左右，由分校领导干部带领，在河南省永城县以东和东南地区，采取分散隐蔽活动的办法同敌人周旋。这时候，学校流动性更大，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就得向另一驻地转

移，有时一夜要转移数次；如果预计在一个地方可能住一天以上，时间是很宝贵的，就特别更加抓紧教学。所以，干部、教员、后勤炊事人员和学员都很紧张、艰苦。

一九四一年二、三月间，当日寇的疯狂“扫荡”被我军粉碎后，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部又向我进攻，步步进逼。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新四军第四师奉华中局和军部的命令，撤出安徽省涡河以南地区，转移到津浦路以东巩固皖东北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晚，四分校奉命随十一旅通过宿（县）蒙（城）公路日、伪军据点封锁线，转移到蒙城北面的苗庄待命东进。不料，三日晨突然发现国民党李品仙部两个骑兵团正渡过涡河向我苗庄逼近，形势十分危急。教育长刘清明同志从全局考虑，令第一大队第一队牵制敌人，阻击两个小时，掩护校直属队和女生队向十一旅靠拢。第一队是军事队，一百一十多名学员都是部队选送的营、连干部，其中还有十几名红军干部，战斗力很强。但这一带是平原地区，有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地形对我十分不利；而且战斗刚打响，据守村口的全连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就出了故障，火力大大削弱。面临一场激战，一队同志坚定沉着，发扬抗大“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以屋顶、

树干和墙基为依托，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顽强地抗击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一队伤亡很大，弹药也耗尽了。在这危急时刻，指导员杨致平同志带着以红军干部为主组成的手枪班，甩掉手枪，接过牺牲同志的步枪，带头跳下屋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霎时，全队士气大振，学员们个个犹如猛虎扑食，在麦地里与敌人经过两个多小时殊死搏斗，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校部直属队和女生队安全转移了。此时，因敌众我寡，一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壮烈牺牲，只有指导员杨致平等几个重伤的同志在敌人撤走后，校部派人打扫战场时，才被抢救回来。在二月至五月三个月的反“扫荡”和反顽战斗中，四分校伤亡二、三百人，损失很大，但全校同志经受了一场严峻的战斗考验与锻炼，更加坚强了。一队同志们的英勇牺牲精神广为传颂，永远载入抗大的光荣史册。

五月中旬，第四师师部转移到津浦路东后，与原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张爱萍、韦国清同志率领的第九旅汇合，组成淮北军区，彭雪枫同志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师部驻在江苏省洪泽湖西岸的半城集（今雪枫镇），分校奉命驻淮南地区的永丰镇。这里的环境较津浦路西安定，战斗空隙较多，分校抓紧这个时机积极进行教学，九月间，第二期学员毕业，分配到部队

及地方机关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四分校由永丰镇西渡洪泽湖，移驻距师部驻地半城集仅四、五里地的祖姚庄。十月二十七日，第三期就在祖姚庄开学，学校领导干部基本上没变动；因李干辉同志调部队工作，由张明河同志继任政治部主任。这一期学员有从部队抽调来的干部，有从根据地报名招考的当地知识青年，也有从上海、南京、广州等江南沦陷区投奔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这一期学员数略有减少，为精简机构，取消了大队一级的领导机构，校部直属六个学员队，其中有一个上干队，都是部队团、营级干部；两个连、排级干部队（包括军事、政治各一个队）；一个地方招收的学生队；一个青年队，一个女生队，共约七百人左右。当时，分校靠近师部，有关敌情动态，师部都及时通报他们，这样，学校的流动性就减少一些，可以致力于教学工作。

一九四二年春，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分校党委立即动员全校人员积极参加整风学习，重点放在科以上领导干部。学习一开始，淮北军区邓子恢政委就亲自到校作动员报告，军区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学校帮助工作。全校教职学员，一面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一面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边学边整边改。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大家的马列主义水平，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团结，促进了教学，使全校呈现一派新的气象。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三期学员毕业。

一九四二年七月，因分校驻地北面泗县、灵璧、泗洪等县的日、伪军调动频繁，似有进袭我半城地区的迹象。第四师师部及直属队全部南移到泗洪县的仁和集，分校也随师部转移到泗洪县洪泽湖西岸边的鲍集镇，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不久，由于原驻“淮宝县”（即淮安、宝应两县边界的根据地）的第二师第五旅转移淮南根据地，四分校奉淮北军区之命东渡洪泽湖到“淮宝县”接替第五旅的防务，与“淮宝”独立团互相配合，坚持敌后斗争。

“淮宝”县西靠洪泽湖，东临宝邳湖，南濒淮河，县境之内小河纵横、稻田密布，是个水网地区，不利于日、伪军大兵团的活动；只有北面淮安、淮阴是日、伪军据点的中心，敌人如向南“扫荡”，至高良涧一带约一天路程，是分校防卫的主要方向。这个地区，物产丰富，盛产稻米，系淮北根据地的“粮仓”。四分校接替第五旅防务之后，一方面与“淮宝”县委和县独立团密切协同，组织侦察网和沟通电话联络，互通情报，监视北面日、伪军的动向；一面组织、武装群众，

加强军民联防，使学校扎根于群众之中，以对付敌人的袭扰。为了肩负教学与作战双重任务，分校训练部兼行作战部的职责，一部分干部集中精力抓教学，加强学员的军事训练，一部分干部分管作战与情报工作，随时作好反“扫荡”的准备。

一九四二年九月，第四期在泗洪县鲍集镇开学。这一期除了抽调部队干部入学培训和继续吸收少量江南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外，为了大量吸收根据地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入学，特在根据地内公开招生，到处张贴“招生通告”，很快地招收了二百多名学员，开办了一个普通科。这个普通科带有抗大预科性质，为解决一部分青年怕参军打仗的思想，课程设置与本科稍有区别，着重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并安排部分文化课程，主要是提高这些青年的政治觉悟，激发其抗战热忱，经过一段时间教育后，愿意参军者即转入本科继续学习。事实说明，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两三个月后，绝大部分学员均自愿转入本科，插入军事队或政治队学习。

一九四三年初，淮安、淮阴的日、伪军对我“淮宝县”地区进行“扫荡”，侵占我鲍集镇东北方二十余里的高良涧，上级为保存分校的骨干力量，令“淮宝”与“淮泗”县的独立团利用水网地带与敌周旋，我四

分校当晚全部渡过淮河，返回过去曾驻过的永丰镇。敌人进占高良涧后，大肆烧杀抢掠，但畏惧水网地带我军设伏，不敢贸然冒进。四分校看敌人南下的可能性不大，随即返回淮河北岸沿线，以学员队为单位，分散进行教学，并作好开展游击活动的准备。这一期，四分校就处在这种“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环境中，坚持于洪泽湖畔的水网地带与敌人周旋，边学习边战斗，并利用“淮宝”地区自然条件好的特点，进行生产，种粮种菜，打鱼捞虾，养猪养鸭，不仅改善了学员的生活，还减轻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

一九四三年七月，为适应战斗环境，四分校进行精简，缩小分校编制，原教育长刘清明同志调任第九旅参谋长，由陈锐霆同志任副校长，负责日常工作；政治部缩编为政治处，由邱一涵同志任政治处主任。学校继续在洪泽湖一带坚持办学。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四年初，第四期陆续毕业。

一九四四年春，分校开展整风运动。为了让教职员集中精力学习，在这期间暂停招收学员。干部整风结束后，分校继续招生，第五期开学。这一期的学员大部分是部队干部，主要开展整风运动。这是继一九四二年进行整风学习之后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教育运动。淮北军区和分校领导对整风运动非常重视，军区邓子恢政委亲自到分校作整风报告，全校同志在深入学习整风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开展思想互助，这对于他们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彭雪枫同志于河南省复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全军区同志为之哀恸。为了纪念彭雪枫同志，十月十二日，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作出决定，将抗大第四分校改名为“雪枫军政大学”，但当时为了第四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战斗的需要，彭雪枫同志牺牲的噩耗只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对外严守秘密，所以这个决定暂时没有公布，四分校仍沿用原来的校名。

一九四四年底，苏皖边区形势好转，根据地日益巩固与扩大，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望。为了迎接战略大反攻，急需培养大批干部，为此，四分校奉命扩编了三个大队，吸收学员一千余人，这是四分校的第六期。这一期由新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同志兼校长，邓子恢政委兼政委，张震参谋长兼副校长，并任命冯文华同志为专职副校长。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洪泽湖以西半城集

附近，举行抗大第四分校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正式宣布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的决定，将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军政大学”。张爱萍校长亲临大会，主持更名典礼，号召大家继承彭雪枫同志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为创造千百个雪枫式的干部而努力。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雪枫军政大学”第一期（即四分校第六期）学员于张塘附近举行毕业典礼，分赴各部队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一九四五年五月，“雪枫军政大学”第二期（即四分校第七期）开学，原教育长刘清明同志从第九旅调回任副校长，继续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和从江南来的知识青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抗大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雪枫军政大学”与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苏中公学”合并，成立“华中雪枫大学”，继续为我军培养新的人才。

抗大第四分校（包括“雪枫军政大学”）先后五年半，共办了七期，为新四军和党政机关培养了四、五千名军政干部，它的主要特点除了上述坚持在平原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艰苦办学，培养大批人才外，还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它始终带有随营学校的性质，在新四军第六支队（后为第四师）党委和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为部

队和地方机关培养干部。彭雪枫、邓子恢、张爱萍、吴芝圃、肖望东、张震等同志都十分关心分校的成长，亲自兼任分校的领导职务，每期学校开学、毕业典礼，这些领导同志都亲临大会讲话。在第一期开学典礼上，彭雪枫同志要求学员立志做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以此勉励大家成为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他和邓子恢、张爱萍等领导同志还经常深入分校检查指导工作，亲自给学员作报告，检查、考核学员的学习成绩，指导他们进行军事演习，指挥他们作战，并亲自领导分校开展整风运动，使学员通过斗争实践增长才干。张震同志除具体分管学校的工作外，还曾担任过分校的战术课程，以生动的战例，精辟的分析启发学员，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由于分校有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所以能经得住战斗考验，在日、伪、顽夹击的艰苦斗争条件下，茁壮成长。

二、认真贯彻党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利用它靠近上海、南京等江南大城市的有利条件，从第一期开始就到处张贴抗大的“招生通告”，并在第四师创办的《拂晓报》上经常介绍抗大的战斗、学习与生活，吸引沦陷区和根据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到新四军来，几乎每期都有知识青年队，少者二、三百人，多者六、七百人。分校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减租减息等农村工作，让他们访贫问苦，进行阶级教育；让他们帮助群众办识字班，搞宣传工作，通过这些社会政治活动，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群众建立感情，逐步做到知识分子工农化，成长为共产党员和党的优秀干部。这批干部有的虽然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但现在，大部分仍然战斗在各个战斗岗位上，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抗大第五分校

抗大第五分校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近五年。它是抗大在华中新四军中培养干部的一所重点分校，曾发挥过华中总分校的领导作用。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后，即向华中敌后挺进，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寇反复的疯狂“扫荡”，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一次次磨擦事件，不断发展与扩大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十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三个纵队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联合作战，于苏中黄桥镇歼灭进犯我苏中

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并乘胜东进，解放了盐城，完成了党中央赋予新四军向北发展，建立巩固的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当时，中央鉴于新四军、八路军已经会师苏北的有利形势，决定在盐城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任命叶挺同志为总指挥，陈毅同志为副总指挥，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在叶挺同志未抵苏北之前，由陈毅同志代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并指示中原局：在韩顽主力已经被歼，我之优势已经树立的情况下，应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及士绅，建立“三三制”政权，注意吸收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合理地筹饷扩军，一切要从长期战争出发，爱惜人力物力。同时指出，为巩固既得胜利，扩大抗日力量，必须坚决控制黄河以南的阜宁、盐城、东台一带战略要地，准备对付韩顽再犯。

要完成上述战略任务，培养一大批军政干部就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原局决定在华中总指挥部驻地盐城创办抗大第五分校，并要求抗大总校派出有教育经验的干部和教员支持第五分校的建设。这时，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两个大队六百多名学员，在谢祥军、刘毓标同志率领下，随刘少

奇同志从盱眙县半塔集江北指挥部附近向盐城集中，与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合并，筹备成立第五分校。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初，抗大总校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分校工作的指示，以抗大第三团的教职员为基础，组成两个派遣大队，一个山东派遣大队，四十五人，开赴鲁中加强抗大第一分校；另一个就是第二华中派遣大队，一百多人，调原抗大第四团团长洪学智同志、政治处主任吴胜坤同志率领，于十一月九日从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出发，准备开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创办分校。但是，途中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行程十分困难。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军部遭到严重损失；一月二十八日，新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第二华中派遣大队即奉命改道盐城，前往加强刚成立的第五分校。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间，抗大第五分校在盐城正式开学，陈毅同志兼任第五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同志兼任副校长，冯定同志任副校长；谢祥军同志任教育长，贺敏学同志任副教育长；余立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谢云晖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薛暮桥同志任训练部长。分校下设四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队，第二大队为政治队，大多是新四军和八路军中的团、

营、连、排级干部；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队，第四大队为女生队，都是苏北和南京、上海等地投奔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和工人。每个大队下属三个中队（第四大队仅两个女生中队），共十一个中队，学员一千八百多人，以青年知识分子居多。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经过半年的艰苦行军，跨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六个省域，行程二千五百多里，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封锁，战胜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阻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盐城，加强了五分校的干部队伍和教学力量。洪学智同志任分校副校长，兼盐城卫戍司令，吴胜坤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其他干部和教员则分配于校部和各大队。

苏北地处宁、沪、徐、蚌四重镇的侧背，又盛产粮、棉、盐等日需物资，是我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积聚抗战力量的战略要地之一，也是日、伪、顽必争之地。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新军部在盐城成立，苏北盐城更为日、伪、顽的主攻目标，敌我斗争就日益尖锐和复杂了。一九四一年春，日、伪军不仅对盐城、阜宁地区经常袭扰，还派飞机轰炸了盐城，炸毁许多房屋，使本来住房已很困难的五分校更添了困难。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日、伪军出动一万七千多兵力，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分四路向我盐城合击，开始了大规模的疯狂“扫荡”。抗大五分校全体同志在“保卫盐城”、“保卫军部”的号召下，积极配合兄弟部队投入“反扫荡”战斗。当时，为了坚持边战斗边学习，女生大队都以排为单位分散到各个中队。同时，由于南方多雨，且盐城处于水网地带，地面潮湿，学员的背包上都带张小板凳，利用战斗空隙上课。因此，敌人就到处寻找有女兵的“带小板凳”的部队，妄图消灭抗大这支培养干部的队伍。

在保卫盐城战斗开始时，我苏北部队在盐城外围地区给予来犯的敌人以阻击和杀伤后，即撤出盐城，分散转入日、伪军侧后，展开游击战。我苏中部队则乘敌人兵力北上盐城的时机，围攻和袭击了敌人在苏中的一些重要据点，迫使敌人自盐城、阜宁等地南撤，回援它在苏中的据点，并转向我苏中部队进行报复性“扫荡”。我苏北部队则乘敌人南撤之际，在盐城地区发动反攻，使敌人陷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处处挨打。我苏北、苏中军民密切配合，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共作战一百三十余次，毙伤俘敌三千八百余人，击沉敌汽艇三十余艘，粉碎了日、伪军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抗大第五分校与新四军第二旅、军部特务团一起，积极配合新四军第三师作战，先后袭击了伍祐、刘庄、冈门、南洋岸等地之敌，并攻克了盐城东南的裕华镇，全歼敌军两个小队，生俘敌军五名，接着，又攻克秦南仓等据点，取得很大胜利。在战斗中，五分校的教职学员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中队长文有武同志在开始阻击敌人时腿骨被打断，伤尚未痊愈又参加反击战斗，在第二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副队长张茂发、吴邦东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为了阻击敌人，掩护学员转移，也光荣献身。抗大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模范行动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为学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许多知识青年入伍才七、八个月，就投入战斗。他们以老干部、老党员为榜样，英勇杀敌，经受了这次战斗的严峻考验，在战斗中迅速成长。

在盐城反“扫荡”期间，五分校一部分学员由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同志率领南下苏中东台地区活动，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与新四军第一师干部学校合并，成立“抗大苏中大队”，这就是抗大第九分校的前身。与此同时，五分校大部分学员随新四军军部迁往阜宁县，并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⑧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抽出部分干部和教员，由吴胜坤同

志带领到第三师成立新的抗大第五分校。将原抗大第五分校校部改称“华中抗大总分校”，负责领导新四军各师的抗大分校和随营学校、教导队培养训练干部的工作。至此，第五分校第一期即告结束，学员分配到各师和分校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月，华中抗大总分校成立，陈毅、赖传珠和余立金、谢祥军、薛暮桥等同志任职不变；冯定、洪学智同志调动工作，由韩振纪同志继任副校长。总分校开办一年多时间，先后培养了两期干部，每一期下设一个营级干部队，一个参谋队，一个连、排干部队，一个工兵队，共四个队，约五百人左右。一九四二年冬，日寇在“扫荡”我华中的淮海、淮北、淮南地区之后，继续调整部署，积极准备再次进犯我苏中、盐阜根据地。为了使我华中、盐（城）阜（宁）地区的部队在日寇大“扫荡”情况下便于机动和回旋，华中局、华中军分会和新四军军部机关于年底主动向淮南地区转移，一九四三年初抵达盱眙县的黄花塘。总分校随军部转移到牛沛湾，根据华中局、华中军分会和军部“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减少单位、加强基层的指示，总分校宣告结束，干部、教员和学员都分配到部队和各分校去。

新的抗大第五分校自一九四一年十月成立以后，

就在新四军第三师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培养干部的工作。校长由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同志兼任，由吴胜坤同志任政治委员，张兴发同志任副校长，王信虎同志任教育长，唐克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训练了一期第三师的干部。一九四二年底，由于准备对付日寇对盐阜根据地的“拉网大扫荡”，部队又进行精减，所以，五分校停办了一年多。一九四四年夏天，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为了迎接战略大反攻，抗大第五分校恢复建制，原有领导干部基本没变，并任命谢祥军同志为校长，在苏北地区扩大招生。这一期下设九个学员队，三个部队干部队，四百多人，六个知识青年队，七、八百人，都是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南京、上海等沦陷区来的青年学生，共一千二、三百人。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学员全部毕业，奔赴解放战场，校部改为盐阜区独立旅，抗大五分校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胜利结束。

抗大第五分校的体制几经变化，经历了抗日烽火的锻炼，作出了很大贡献。它有着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在中央局和军部的直接领导下，和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直接关怀下创建和成长起来的，曾发挥过华中抗大总分校的领导作用。

华中局（原中原局、东南局）和新四军领导对培养干部的工作极为重视。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于盐城召开的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陈毅同志通过总结新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就强调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部队的军政素养。会议决定，华中局和军部要开办党校，加强抗大总分校，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各师、各根据地也要开办抗大分校、军政干部学校和各种轮训班，大力培养提高工农老干部，同时大量吸收、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各种人才。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华中抗大总分校在苏北东坎县（今滨海县）召开教育会议，交流各分校的教育经验，并着重研究了总分校及各分校的教育内容、教育制度和教员的待遇等问题，陈毅同志亲临会议作了指示。当时，新四军各部已先后在第一师成立抗大第九分校，第二师成立抗大第八分校，第三师成立新的抗大第五分校，第四师成立抗大第四分校，第五师成立抗大第十分校，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教育网。总分校经常通过文件、电报，交流各分校的情况与经验，对分校的教育思想、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一九四三年春，

总分校虽在精简机关时撤销，但各分校工作已打下基础，而且总分校的干部和教员也分配到各分校，加强了分校的力量，所以，各分校在军部的直接领导下，仍继续发展。一九四四年，为准备进行战略反攻，各分校和教导队有计划地扩大招生，吸收了大批根据地内生长的青年学生以及沪、宁、杭等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和工人入学，学员总数达五千多人，为我军的建设和大反攻培养了大批干部。

二、干部力量强，教员质量高，不仅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干部，而且为各分校输送了一批教育骨干。

陈毅、赖传珠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兼任五分校领导职务，尽职尽责，经常关心分校的工作，到分校作报告。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陈毅同志肩负着抗击蒋介石掀起的反共狂飙，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日理万机，军务繁忙是可以想象的，但他为了让抗大的同志了解事变的真相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严正立场与斗争策略，特地抽空到抗大作形势报告，鼓舞大家坚定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刘少奇同志也常抽空到分校结合学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作形势报告和关于党的建设、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从而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言近旨远，深入人心，使学员受到很大教益。

冯定副校长是有名的哲学家，薛暮桥同志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都有较深的造诣。在这样好的教育条件下，学员的水平提高得很快。所以，毕业学员分配到各分校工作时，都能起骨干作用。抗大五分校就象春风满园的苗圃，为各分校辛勤培育了许多师资新苗，也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才。

抗大第六分校

抗大第六分校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正式成立，至一九四三年冬结束（中间曾与总校合并八个月），历经新、老六分校两个阶段，前后办了三年，时间虽不长，但它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坚持太行山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二九师及地方党政机关培养了一批干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北方局与华北军分会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特地讨论过一次学校工作问题，认为“由于党所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新四军的扩大，要求专为训练八路军、新四军骨干的抗大，必须随之加强与扩大”。“为了扩大抗大培养干部的事业，应继续准备在晋冀豫、晋西北、华中、一一五师等处增设分校。”因此，决定“目前即应由总校拨出一部分

学生去第一分校受训及拨出二千人的基础去一二九师，将一二九师随校加强，改组成为第六分校。”

根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的指示，抗大总校先后派出了华中、山东派遣大队，并于六月十三日从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派出抗大第四团第一、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共九个队一千余人，由第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政治处主任铁坚等同志率领，前往一二九师驻地河北省的涉县王堡，准备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

正在这时，日寇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抗大总校派出的九个学员队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都先后转入反“扫荡”战斗，筹建工作被迫暂停。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初，反“扫荡”战斗胜利结束，抗大总校迁往河北省浆水镇一带，总校派出的九个学员队及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才先后到达武乡县蟠龙、洪水镇之间的中村、义村一带集中，于十一月底正式成立抗大第六分校，校部驻在蟠龙镇的寨头村。此时，因洪学智同志调往抗大总校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穰明德同志也调回总校，所以，总校另派刘忠同志任校长，黄欧东同志任政治委员，姚继鸣同志任教育长，胥光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初，六分校陆续招生编队，学

员全部是一二九师的基层干部和部分晋冀豫边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共设五个营：第一、第二营是连、排军事干部，第三营是政治干部，第四营是轻、重机枪和炮兵等特科干部，第五营是地方干部，学员约一千余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举行开学典礼，军队干部只训练一期，学习一年；地方干部采取轮训的办法，每三个月为一期，先后训练了三期。

六分校自筹建开始，就一直处于反“扫荡”的战斗环境，即使是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两个春节，也都是在反“扫荡”的炮火声中度过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春节前），日寇就开始所谓“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纠集一万二千余兵力，对我太行地区进行“扫荡”。六分校奉一二九师的命令，以第四营（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步枪数百支，组成一个加强营，在营长谢光粹、政委邢亦民等同志率领下，分散活动于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以精干的小分队，携带机枪、迫击炮，对榆社洪杜、武乡段村等敌人据点进行夜袭，牵制迷惑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所谓“总进攻”。四月二十八日，太行区反“扫荡”胜利后，六分校奉命调回总校归建，学员全部毕业分配回部队和地方机关工作，教职员大部分返回总校，至六月间合编就绪，第六分校即暂告结

束。

一九四三年一月，抗大总校奉命返回陕北时，为了保留一部分教学力量，继续为一二九师和太行山区地方武装培养军政干部，决定以总校基本科第一、二、三营为基础，并从校直机关和各队抽调部分干部，组建新的抗大第六分校。任命徐深吉同志为校长，袁子钦同志为政治委员，胡汉标同志为教育长，张力雄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一月下旬，新的校部组建后，即进驻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河北省涉县元曲、固新镇一带办学，直属一二九师领导。原基本科第一、二、三营，扩编为第一、二、三大队，并新组建一个第四大队，共有教职学员一千六百余人。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分校开学不久，日、伪军又出动三万多人对我太行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敌人分别从山西的长治、潞城，河南的林县和河北的邯郸、武安三路合围我涉县一带的一二九师师部和六分校驻地。六分校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以大队为单位，分散寻隙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转移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五月二十六日，与六分区地方武装联合作战，攻克了河南安阳县以西敌岭头据点，俘虏伪军二百多人，配合主力部队在根据地腹地再次粉

碎敌人的“扫荡”。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六分校又奉命参加了开辟新根据地的著名的“林南战役”^⑨，配合太行区兄弟部队歼灭公开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庞炳勋部，俘敌二千五百余人。战后，太行军区将巩固林县以北新开辟的根据地和改造敌军俘虏两项任务交给了六分校。分校学员即提前毕业，分赴各部队和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地方政权与地方武装的建设工作；同时，以校部教职员为主组建了“一二九师补充团”，进行改造俘虏的工作。

改造俘虏是一项新任务，也是其他分校没有遇过的新课题。但他们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在对俘虏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and 荣辱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慎重、细致地进行政治审查工作，做到心中有数。一九四三年冬，补充团经过三个多月的教育整训后，除少数政治不纯和思想落后者遣送回家外，大部分都自愿参加八路军，补充到太行军区各部队，较好地完成了改造俘虏的任务。此时，太行军区部队进行整编，六分校除留下童国贵、彭宗珠等同志率第二大队教职员改编为“太行大队”，继续留在涉县固新镇一带培养干部外，大部分干部都分配到太行军区各部队工作，新的六分校亦告结束。

新、老六分校创办三年的历史，为整个抗大校史写下了闪耀着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光辉一页。他们不仅要在日寇频繁“扫荡”的战斗环境中坚持教学和根据地建设工作，而且要克服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勒紧裤带，咬紧牙关，渡过抗战时期最艰苦的岁月。

为了解决粮食困难，六分校开展大背粮运动。他们从武乡蟠龙（后期从涉县固新镇）一带翻山越岭，走二、三百华里的崎岖山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和顺、昔阳等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身上要背上背包、武器，还要带三、四天口粮在途中吃。到了目的地，大家用裤子当粮袋，把两条裤脚扎上，装满粮食，再把裤腰捆紧，驮在双肩背回来。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七、八十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四、五十斤。返回途中，要走四、五天，吃掉一些粮食。背回来后，再分一部分给病号和留守的同志，所剩无几，一般只能休息三、四天，又要带着口粮出发，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背粮途中。

那时背回来的粮食，大部分是作为马料的黑豆和高粱，只有少量小米，给重病号吃。同志们由于缺乏营养，患夜盲症的很多，给反“扫荡”、夜行军增添了不少困难。同时，由于体质衰弱，加之疟疾流行，有的还并发痢疾，不少连队患病人员达百分之八、九十，

只能是轻病号照顾重病号。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治疗疟疾的“奎宁丸”很难买到，大家就想办法找偏方：有的用醋煮鸡蛋、铜钱；有的杀狗熬狗肉、狗骨头汤；有的用针灸、拔火罐，千方百计治疗。但不管疗效如何，大家都以革命精神去战胜病魔。不少同志发病时实在挺不住才休息，病稍好，又挣扎起床参加背粮，说是“跑跑路出一身汗就能驱走疟疾”。有一位姓王的学员，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患疟疾已好几个月，身体很虚弱，同志们都劝他在家养病，他不肯，硬挺着身子参加背粮，就在返回途中，有一天晚上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第二天清早才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长眠于背粮途中。

是什么力量使抗大的同志具有这样顽强的毅力？是党的坚强领导，是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背粮行军占用了大量时间，分校领导只能利用行军前的政治动员、休息时的政治课，然后组织“走谈会”，边走边讨论，边走边鼓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明确今天吃苦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甘心情愿为了祖国幸福的明天而艰苦奋斗，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所以，在背粮途中，大家坚持学习，互相帮助，除了过封锁线时衔枚疾走外，一路欢歌笑语，个个精神振

奋，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为了适应背粮行军的环境，坚持教学，六分校还发扬了“钻”和“挤”的精神，制订出行军教育计划。当时工农干部学员占绝大多数，他们渴望学习文化，以便今后学好政治、军事，所以，分校把文化教育作为重点，在行军时，每个学员背包上挂张“学习牌”，写上生字、生词和算术题，让学员边走边读或练习演算，既学习文化，又提高情绪，减少疲劳。经过一年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背粮途中，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公路封锁线。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每个班只有一支老式步枪，但他们大多有战斗经验，把全连的武器集中起来，组成掩护组，当跨越封锁线时，负责监视敌人，掩护队伍通过。一九四一年三月，校直属队到和顺一带背粮时，遇上了敌人。教育长姚继鸣同志立即率警卫连一个排，在牛槽沟阻击敌人，掩护背粮队伍安全转移。所以，每次背粮活动，实际上都是一次“虎口夺粮”的战斗，遇到敌人就打，没有敌情时就学文化或结合地形进行侦察、警戒、行军、宿营以及战斗队形等军事课目的训练，使学员在实际中学会组织指挥连队开展游击战活动的本领，毕业回部队，能成为军政兼优的基层骨干。

抗大第七分校

抗大第七分校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创办，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四年多。开始时，它转战于黄河东西两岸，历经艰辛，经受战斗考验；以后又转移陇东地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通过教育和劳动锻炼，培养了大批年轻干部，为我军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北方局与华北军分会关于增设分校的指示^⑩，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抗大总校于晋西北兴县附近的李家湾，以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创办了抗大第七分校，并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校长由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同志兼任，副校长为喻楚杰同志，政治委员为徐文烈同志，政治部主任为杨尚高同志。分校下设营长队、教导员队、连排干部队、参谋训练队、测绘训练队、骑兵队、工兵队和地方干部队等八个学员队，此外，还附设一所陆军中学，共有学员一千多人。

由于学员都是来自一二〇师各部队和晋绥边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工农干部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所以，八月四日正式上课后，第一阶段进行五个月的

预科文化教育及队列教练，至一九四二年初才转入本科教育，学习军事和政治课程。

七分校地处晋西北，环境与第六分校差不多，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分校必须以极大的力量和时间去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尤其是吃饭问题更为严重，经常要组织人力到百里之外去背粮、背炭；背回的黑豆、杂粮还要推磨拉碾加工；加之日、伪军袭扰、“扫荡”，学校经常转移，仅几个月时间，校址就从李家湾转移到贺家圪台，再转移到杨家坡西的碧村，所以，预科教育按计划虽是五个月，但由于背粮、背炭和转移、搬家，占去了三个月，实际教育时间还不足两个月，可见当时坚持教学之难。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敌后“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更加频繁，日寇为了封锁我陕甘宁边区，加紧对黄河东岸的“扫荡”，妄图消灭我晋西北的一二〇师，然后凭借黄河天堑，筑起严密的封锁线，隔断我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山东和苏北、苏中等根据地的联系，以达到分割包围，消灭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目的。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肖克等同志率领下，发动与依靠群众，展开英勇的反“扫荡”战斗，从二月至五月，晋西北和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军民就分别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消灭敌人六千五

百多人。在此期间，七分校的同志也积极投入反“扫荡”斗争。二月初，由于日寇来势汹汹，为“避其锐气”，保存我有生力量，分校曾一度奉一二〇师首长之命西渡黄河，暂到陕甘宁边区坚持教学。不久再返河东，投入反“扫荡”战斗，边战斗边学习，直至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一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使抗大总校能有一个较安定的学习环境，以便储备干部，准备反攻。决定总校第八期学员与第二、三分校合并。从敌后迁回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县继续办学；与此同时，决定第七分校及附设陆军中学也从晋西北敌后迁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合水县，并令抗大二分校附属中学从晋察冀边区到合水县，与七分校合并，组成新的第七分校，直属总校领导。

一九四三年一月下旬，第七分校及附设陆军中学一千多名学员由喻楚杰副校长率领，从晋西北兴县出发，西渡黄河，经葭县、米脂到达绥德，营连干部队与总校合并；陆军中学九个学员队则继续南下，经清涧到延安，在延安稍事休整后，于三月间开往合水县城，编为第七分校第一大队。与此同时，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一千五百多名男女学员于二月中旬（农历正月十六日）由二分校教育长熊伯涛、附中校长江隆

基等同志率领，由河北灵寿县的牛庄、女庄一带出发，冒着料峭春寒，越过山西省内冰封雪飘的云中山、芦芽山，渡过奔腾咆哮的黄河，经陕北的绥德、清涧，于四月三十日到达延安。五月三日，附中在延安改编为第七分校第二大队。五月五日又从延安继续西行，于五月中旬抵达陇东合水县，与第七分校一大队会合。六、七月间，二大队八个男生队进驻豹子川，边挖窑洞、开荒生产，边组织学习，而两个女生队，则留在合水县柳沟，直属校部领导，继续进行文化教育。九月，原留在河北浆水镇的总校太行陆军中学，与太岳陆军中学亦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到合水县与七分校合并，编为第三大队，进驻东华池附近的平定川。此时，全校学员达三千多人，中央军委任命彭绍辉同志为总校副校长兼第七分校校长，张启龙同志为政治委员，杨尚高同志为副政治委员，喻楚杰同志为副校长，康永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第七分校移驻陇东以后，比敌后的战斗环境安定得多，但这里地广人稀，房屋很少，开学时，有的队不得不露宿于深沟丛林之中。所以，分校一到陇东，就发扬抗大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分散于合水县豹子川、西华池、东华池一带，开挖窑洞，建筑校舍，建立“革命家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一九四四年

冬，不仅解决了三千多人的住宿问题，而且每个连队都修好了课堂、饭堂，制作了门窗、桌凳，还在东华池修建了一座能容纳三千多人的大礼堂，可供全校学员在这里听报告、上课、开晚会，使人烟稀少的东华池改变了面貌，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新气象。

一九四四年春，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七分校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坚持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三月二十九日，全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通过了“生产公约”，并举行向荒山进军的誓师仪式。四月二日，各大队就在豹子川展开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到四月十六日，全分校共开山地一万零七百七十七亩，开稻田三百二十四亩一分。其中开荒成绩最好的第一大队，每个劳动力每日平均开荒八分六厘，大队部和七队平均都在一亩以上。第二大队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青少年，劳动热情最高，全大队平均日开荒一亩以上的就有二百三十四人；第二大队二队分工开稻田，稻田地到处是杨树头，而且要求深挖六寸以上，把树根草根刨净，将下层泥土翻上来，开一分稻田顶山地四、五分的工夫，但二队青年不怕苦，不畏难，埋头苦干，其中张振吉、王进喜两个同志，日开水田一亩二分六厘，创造了最高纪录。

在开荒生产中，全校教职学员人人争先，黎明上山，天黑收工，休息时不歇手，冒着雨雪突击的先进人物，队队都有。

在全校同志的努力下，一九四四年生产的粮食折合细粮共五千六百五十余石，足供全校半年口粮，而且做到蔬菜全部自给。同时，全校养猪一千三百余头，羊一千一百余只，牛一百余头；其中一大队第六队做到四人一头猪，三人一只羊，十人一头牛，将近每人一只鸡，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此外，在手工业方面，还白手起家，先后建立了木工厂、肥皂厂、纸厂和磨坊，仅木工厂一年生产的木板、椽子即价值一十万元（边币）；全校女同志还组织纺纱六千斤，价值六千斗细粮。此外，他们还组织人力进山烧木炭，每个伙食单位都烧木炭三、四万斤。由于生产的发展，学校生活大大改善，到了一九四四年冬天，不仅吃饱了饭，有木炭烤火，每人还发了一件毛衣，一双手套，两双毛袜，可谓“丰衣足食”了。

劳动生产改善了生活，又锻炼了思想和革命意志，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七分校举行了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生产成绩展览会，表彰了大队级英雄与模范七十二人，并选出校级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张秉照等二十二二人及六个先进单位。在展览会上，

展出了五百三十件展品和一百多幅图表、木刻、连环画，表彰英雄、模范和先进单位的事迹，进一步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生产运动中，分校还坚持进行教育训练，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开展战术、技术的基础训练，并继续进行文化学习，使学员得到全面发展。第二大队原是抗大第二分校的附设中学，他们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在冀中参军入学时大多是十三岁至十六岁的少年，经过四年的军、政、文教育和劳动锻炼，既提高了思想水平，又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时，都已成长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干部，不少人已经成为共产党员。而第一、第三大队虽然平均年龄大一些，但其中不少是一九四二年“精兵简政”时储存起来的年轻干部和老战士，特别是原七分校陆军中学的学员青年干部较多，他们经过这几年的教育锻炼，也更加成熟了。这三千多名干部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一批宝贵财富。所以，抗战胜利后，第七分校结束，除部分年纪比较大的干部分配到部队工作，投入解放战争，发挥骨干作用外，大部分学员则根据建军的需要，分别选送到机要、通讯、炮兵、医务等专业技术学校继续深造。现在，这批干部已成为我军

和地方一些专业部门的领导骨干。由此可见，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确是高瞻远瞩，在条件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千方百计选拔、储存和培养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这条经验，今天仍可借鉴。

抗大第八分校

抗大第八分校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以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为基础创立，一九四五年八月胜利结束，历时四年多。它是新四军所属五所抗大分校中环境比较安定，教学质量较高的一所分校。

皖东、皖中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津浦、淮南铁路贯穿其间，是华中战略枢纽之一。一九三八年春，日寇为打通南北战略联系，侵占了津浦路南段滁县、蚌埠等城镇。五月，日寇主力北犯徐州，并分兵占领合肥、巢县，控制淮南铁路，掠夺我煤矿资源。在日寇疯狂进攻面前，原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早已逃之夭夭；四川军队和桂系军队也纷纷从津浦线溃退，躲进大别山区，使皖东、皖中大片国土，沦入日寇铁蹄。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人民，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张云逸、高敬亭、徐海东、赖传珠、邓子恢等同志率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挺进皖中、皖东地区，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我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已取得很大进展。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扩建的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仍坚持巢县、无为地区抗战，扩大武装力量，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这时，我江北部队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第四、第五支队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由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余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原局决定成立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为部队培养基层干部，有学员近千人。这就是抗大第八分校的前身，也是建立抗大第五分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进行整编。原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即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第四、第五和第六旅，由张云逸副军长兼师长，罗炳辉同志为副师长。为了加强第二师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根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各师、各根据地应建立抗大分校的指示，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第二师以原江北指挥部军政干

部学校留在淮南的一个大队为基础，扩建为抗大第八分校，校址设在安徽省天长县张公铺，后迁龙冈、葛家巷。由张云逸同志兼任校长，罗炳辉同志兼任副校长，冯文华同志任教育长，高志荣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第一期有一个营级干部队，两个连级军事队，一个连级政治队，两个排级军事队，一个排级文化队，计七个队，学员七百多人。经过八个多月的学习，于一九四二年春毕业。

一九四二年四月第二期开学，学员近千人，下分九个队，都是第二师的营、连、排级干部，大多是工农分子出身，文化程度较低，所以，开学后先进行三个月的预科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尔后转入军政业务的本科教育。一九四三年春，华中总分校撤销时，派出数十名干部和教员加强八分校的教学力量。这批干部和教员大部分来自抗大总校第二华中派遣大队，有较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他们到八分校后，使八分校的教学工作更正规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一期学习了一年多时间，成绩很好，至一九四三年秋毕业。

一九四三年秋，第三期开学，学员约五百人，分为五个队，都是第二师的干部，主要开展整风运动。通过学习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进干部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这一期开

学不久，根据上级指示，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实行“精兵简政”，分校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教导团，冯文华同志任团长、刘毓标同志任政治处主任。教导团的干部和教员仍是原分校的一套人马，办学方针不变，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于一九四五年春毕业。

一九四五年五月，第四期开学，学员三百余人，分为三个队，主要集训第二师的基层干部。经过短期的军政训练，八月，我军进行大反攻，教导团奉命结束，学员即行分配到前线部队，投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抗大八分校地处皖东抗日根据地，环境较之华中地区其他分校安定得多，所以，分校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正规学校的建设，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一九四二年八月，华中总分校召开教育会议时，陈毅军长曾表扬过八分校取得的教育成绩。一九四三年春，华中总分校结束后，新四军军部又有计划地从总分校抽调一批有教育经验的干部和教员加强八分校，使八分校越办越好，在办学的四年多时间内，扎扎实实地为第二师培养出二千五百多名具有一定军政素质的干部，为加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

抗大第九分校

抗大第九分校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正式成立，一九四四年夏改为“苏中公学”时结束，历时二年。它是坚持于苏中敌后游击战争条件下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的一所战斗化的分校。

第九分校的前身是第五分校的“抗大苏中大队”。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日寇出动一万七千多兵力对我新四军军部驻地苏北盐城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驻在盐城的抗大第五分校在配合苏北部队于盐城外围阻击与杀伤敌人后，即主动撤出盐城，分散转入日、伪军侧后，展开游击战。此时，第五分校一部分学员由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同志率领，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南下东台地区敌后活动。十月间，奉军部之命与第一师干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抗大华中大队”，划归第一师领导，任命吴肃同志为大队长，谢云晖同志为政治委员，下设四个队，学员五百人左右。其中第一队为部队连级干部队，第二队为部队排级干部队，第三队为青年学生队，大多来自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第四队是华侨青年队，大多是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侨学生，因参加抗日救

国活动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的爱国青年。

苏中地区濒临长江、黄海，靠近南京、上海，是沟通长江南北的交通枢纽地带。窃据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把苏中作为他统治地区的中心区域，侵华日军也把它作为“后方大本营”，处心积虑要把苏中造成所谓“模范和平区”。因此，日、伪军到处修筑据点，设置封锁线，经常出动“扫荡”，妄图消灭我苏中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苏中大队一成立就面临着严重的敌情。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们与日、伪军周旋，从东台经沿海地区的海安、如皋、如东、南通、启东等五个县境，最后才在黄海之滨的南通县海复镇停下脚跟，暂时安定下来。在此期间，他们不仅战胜敌人的“扫荡”、封锁和围追堵截，而且还沿途接收部队的新学员，并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吸收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投奔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入学。所以，华中大队到达海复镇之后，队伍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从原有的四个队发展到八个队，九百多人，其中有五个部队干部队，三个知识青年和工人队（内包括一个华侨青年队）。这一批学员于一九四二年四月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

一九四二年五月为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抗大苏

中大队奉命改编为抗大第九分校，仍属第一师领导，校址还设在南通县海复镇。校长由第一师师长粟裕同志兼任，刘季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张崇文同志任副校长，杜平同志任教育长，刘确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分校下设四个队，一个班、排干部军事队，一个政治干部队，一个参谋训练队，一个青年学生队。此外，还附设一个会计训练班，为部队培养财会人员。

九分校刚成立不久，一九四二年六、七、八三个月，又碰到日寇的“扫荡”。分校当即提出“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和“武装保卫学习”的口号，动员全校教职学员投入反“扫荡”斗争。当时，为了适应战斗环境，分校经常在转移途中进行教育，白天上课，夜晚转移，有时为了配合主力作战，还要组织学员出击敌人，担负战斗任务。在敌情最严重的时候，为了保存自己，他们还曾经利用南通地区濒临黄海的有利条件，分散转移到海船上，在渔民群众掩护下，于浩瀚无垠的黄海之中，以海船为课堂坚持上课、学习，既可安全隐蔽，又可进行教育，一举两得。这是其他分校没有用过的特殊教学办法，也是九分校在对敌斗争中独创的坚持教育的经验。

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春，日、伪军积极部署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清乡”。但由于它兵力不足，

所以首先选择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的我苏中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作为它“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调动了一万五千余兵力，准备从四月一日开始，以六个月的时间完成其第一步“军事清乡”计划；接着，再以四个月时间完成其第二步“政治清乡”的计划，普遍建立伪政权。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狂妄计划，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苏中军民紧急行动起来，积极准备对付敌人。一九四三年一月，第一师第二旅南下苏南，与江南的第六师第十六旅合并，利用敌人调动苏南兵力北上“清乡”的有利时机，去苏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为保存干部，九分校奉命渡江南下，到苏南与第二旅、第十六旅的教导队合并，在江南的溧水、溧阳、高淳、广德等地区配合第二旅、第十六旅开辟根据地。这时，九分校扩大到三个大队，九个队，计学员一千二、三百人，对外称特务团，一面进行军政训练，一面执行武装工作队的任务，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不断壮大抗日力量，以实际的战斗行动，支持苏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

九分校转战于江南溧水、高淳一带的石臼湖畔，正处于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复杂情况下。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部为配合日、伪军对我苏中地区的“清乡”行动，与日、伪军秘密勾结，于四

月间突然发起对我溧水县北部铜山地区的疯狂进攻，企图一举聚歼我江南部队，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敌人包围下，我九分校立即投入战斗，担任正面防御任务，牵制敌人，掩护部队迅速转移。在这危急关头，九分校的教职学员在武器差、弹药缺的困难条件下，奋勇抗敌，一营（大队）营长汤万益、政治委员唐昆远等同志都在这次阻击战中英勇牺牲。全校同志表现了高度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虽伤亡较大，仍坚守阵地，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一九四三年夏，九分校随部队突围之后，因为环境不允许继续在江南办学，奉命再次转移到江北办学。这次转移，由于依靠群众，准确掌握敌情，又进行了充分准备，分校队伍以果断、迅速的行动，在一天之内越过日、伪统治地区的心脏——南京附近沪宁铁路上的龙潭火车站封锁线，渡过了长江，到达江北淮南地区的天长县铜城一带。

分校到了铜城之后，因当时日、伪军都集中全力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进行“清乡”，淮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他们即抓紧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和教育训练，一部分学员毕业，分赴部队参加反“清乡”战斗，一部分大队干部也调到部队带兵。学校缩

小编制，取消大队一级机构，由校部直辖四个中队，其中两个军事队，两个政治队，都是部队抽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不久，苏北党校并入九分校，组成一个团、营干部队。这一批学员主要以开展整风运动为中心，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政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一九四三年，我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无数次“清乡”、“扫荡”，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同时挫败了国民党顽军的反共磨擦阴谋，取得了重大胜利，度过了抗战期间华中地区最困难的一年。一九四四年春，整个苏中形势大大好转。九分校即从淮南经淮北返回苏中继续办学，训练了一批连、排基层干部。一九四四年夏天，我苏中部队开始对日、伪军展开反击。一九四五年春，粟裕、谭震林等同志率第一师三个主力团跨过长江，到江南扩大苏浙军区，打开了抗战的新局面。为了训练大批后备干部，准备开展战略大反攻，在此期间，第九分校奉命改为“苏中公学”，利用苏中地区靠近宁、沪、杭等江南大城市的有利条件，大量吸收革命知识青年入学，壮大新四军的力量。到抗战胜利时，“苏中公学”发展到一千多人，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育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一九四六年七月，“苏中公学”并入“华中雪枫大学”，继续担负培养干部的任务，为创办“华

东军政大学”打下了基础。

抗大第九分校创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高度发扬了抗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转战于大江南北，培养了一大批新四军第一师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干部，特别是培养了近百名华侨青年干部，在国内和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抗大校史增添了光彩。

抗大第十分校

抗大第十分校于一九四二年春正式成立，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时结束，历时三年多。它是坚持在豫鄂边区敌后根据地培养训练干部的一所“背包大学”。战斗频繁，流动性大，环境艰苦，是它的主要特点。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队丢弃武汉三镇溃逃，使江汉地区大片国土沦入日寇之手。为了拯救铁蹄下的千百万同胞，十一月间，党中央决定派李先念同志率领一个干部大队，由延安向华中挺进，去加强豫鄂边区抗日武装的领导力量。这个干部大队分为三个中队，其中两个干部中队二百多人，大部分是抗大第四期的毕业学员；另一个中队是掩护部队，

有一百多人。他们经西安、郑州，于一九三九年一月抵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与豫鄂区党委取得联系后，即同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竹沟、七里坪的留守处人员和当地地方党员结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进入湖北省随县地区开辟根据地。六月中旬，李先念同志率领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与陈少敏同志率领的河南信阳挺进队在湖北省安陆县赵家坪会合，成立了新四军豫鄂游击独立支队，由李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陈少敏同志任政治委员，不久，陶铸同志继任政治委员。

豫鄂游击独立支队在鄂东随县、应山、安陆一带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队伍不断扩大。一九四〇年一月，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把豫西、鄂东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同志任司令员，朱理治同志任政治委员，刘少卿同志任参谋长，任质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扩大到五个团，三、四千人。

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迅速扩大，部队新，干部缺，便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适应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李先念等纵队领导同志下决心培养训练干部。于是，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在河南竹沟的教导队为基

础，创办随营军事学校，由李先念同志亲自兼任校长，朱理治同志兼任政治委员，任命杜石公为副校长，黄春霆同志为副政治委员，参谋长刘少卿同志具体负责随营学校的领导工作，这就是抗大第十分校的前身。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皖南事变之后，新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后，部队进行整编，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同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卿同志任参谋长。下属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等三个旅和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纵队。随营军事学校直属师部领导。学员增加到一千余人，学校领导干部基本没变。一九四一年底，副政委黄春霆同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一九四二年二月，根据军部的指示，将随营学校改编为抗大第十分校，李先念同志仍兼校长和政治委员，调第十三旅副旅长肖远久同志任副校长，豫鄂边区抗日保安司令员郑绍文同志为副政委，任命余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水泉同志为训练部长，领导力量大大加强。

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十分校第一期在湖北省随县白兆山区开学，下属三个大队，有学员一千多人。第一大队为军事队，主要训练连级指挥员，还有少数

准备提升的营级干部；第二大队为政治队，主要训练连队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还有少数准备提升的营级教导员；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队，多数是河南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学生，其中有一个青训队，都是十五岁左右的小学毕业生。军事队的军事训练时间占百分之七十，政治学习时间占百分之三十；政治队和青年学生队的学习时间比例相反。学习的内容与抗大总校相同，因为当时教材的来源较困难，只有分校的干部和教员从抗大总校带出来的一些书籍、讲义，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油印股，自行翻印。由于蜡纸和纸张都很困难，每次只能翻印三百份左右，分给教员一部份，发到班、排，数量很少，大家集体阅读或轮流阅读。拿到书的同志如获至宝，经常是如饥似渴地挑灯夜读，直至深夜，爱不释卷，即使在行军转移十分疲劳的情况下，也是争分夺秒地埋头读书，学习空气十分浓厚。虽然每期学习时间只有四个月至半年，但学习的收获都比较大。

一九四三年秋，肖远久同志调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由杨焕民同志接任副校长；郑绍文同志调任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余潜同志也调部队工作，由冷新华同志继任政治部主任；并升任原第二支队长邝林同志为教育长。杨焕民同志原是抗大第一期（红大）第二

科学员，又曾在抗大第四期当过学员队长，对教育工作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曾当过作战部队的师参谋长和团政委，也有指挥作战的经验，这对于分校坚持在敌后战争环境下办学更为有利。

十分校第二、三期也分为三个大队，但由于敌人的封锁，外来的知识青年大大减少，第三大队就以训练部队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为主。第四期开学后，为了精简机构，以适应战争环境，将政治部和训练部改为政工科和作训科，大队改为支队。一九四五年春，第五期开学时，因第五师的部队和根据地扩大，师部兼豫鄂皖湘赣军区，下属第十三旅和八个军分区，地域广及五个省的边区，如果再集中办校，势必造成调集和分配学员的困难。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十分校奉命派出干部和教员，到离师部较远的地区创办四个教导团，其中第十三旅分一个团，二、四分区分一个团，三分区分一个团，鄂东分区分一个团；分校直属四个学员队，负责训练师部附近部队的干部。分校先后办了五期，每期学员都在一千人左右，大部分来自部队的基层干部，还有少数来自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培养干部五千多名。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分校于湖北应山县吴家大店村举行毕业典礼，学员分赴解放战场，校部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改编为新第十四旅旅部，带领部队逐鹿中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第十分校位于中原豫鄂地区，濒临长江和武汉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日本侵略军在武汉一直驻扎一个军团的重兵，汪精卫傀儡政权也在武汉设置行营，驻扎伪军五、六个师。而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陈大庆、王仲廉等部四个集团军，在放弃武汉之后，即龟缩于武汉东、西两侧的大别山和大洪山一带，伺机配合日、伪军向我进攻。我军在日、伪、顽夹击之下坚持游击战争，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斗十分频繁。同时，因为豫鄂地区平汉铁路纵穿其间，淮河、漳水和涇水等水网纵横交错，便于敌人利用交通线及河道设置封锁线，使我抗日根据地难于连成一片，而形成小块根据地分布于豫鄂边广大山区和农村。十分校处于这种游击战争环境，流动性之大是其它分校所少见。他们在办学的三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固定的校址，先后流动于湖北的随县、应山、京山、小悟山、孝感、黄陂和河南信阳等广大地区，一般在一个地方只能驻十天、半个月，能较平静地驻扎一个月以上就很难得。所以学员们每天起床都要打好背包，随时准备行动，在行军转移途中进行教学。有的同志说：抗大在延安住窑洞，称为“窑洞大学”；我们天天背着

背包行军，坐着背包上课，可谓之“背包大学”了。

“背包大学”以教学为主，一般不担负战斗任务，但它经常活动于据点林立的敌人封锁线之间，难免与敌人遭遇。有一次，第三支队驻在京山县以南一个山村，突然遭到日军的偷袭，一个排的同志大部分负伤，还牺牲了十几个同志。这个事件使分校同志吸取了沉痛的教训，更加提高了警惕。不久，第三支队再次遭到敌人包围，三支队长周正同志立即将全支队一百多名“枪榴弹”手集中起来，占领制高点，用“枪榴弹”大量杀伤敌人，把敌人打退，掩护支队顺利转移。还有一次，分校刚转移到黄陂县王家河，一天晚上，日、伪军一千多人突然封锁住公路，顺着山沟企图包围袭击我分校。幸好哨兵及时发现敌情，杨焕民副校长沉着指挥，发扬熟悉地形的优点，带领大家沿着另一条山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穿过公路封锁线，转移到敌人侧后，使敌人扑了个空，保护了分校的安全。

“背包大学”与“窑洞大学”一样，都充分体现了抗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优良传统，在抗大校史上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抗大太岳分校

太岳分校于一九四四年秋以抗大太岳大队为基础组成，一九四五年十月并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时结束，历时一年多。它是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太岳军区部队培养干部的一所抗大分校。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日寇开始所谓“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出动一万二千余兵力“扫荡”我太行山区；出动七千余兵力“扫荡”我太岳山区；国民党顽固派又与日、伪勾结，加紧对我根据地的封锁，因而给抗大总校的招生和毕业学员的分配增添了许多困难。为了粉碎日寇的“扫荡”和打破顽固派的封锁，培养更多的干部，总校决定派出一部分干部和教员到太岳区建立太岳大队，就地培训干部。这就是太岳分校的前身。

太岳大队从抗大总校第一大队中抽调部分大队干部、军政教员和五个学员队的区队长（排长）以上干部共一百多人组成。任命杨秀全同志为大队长，张力雄同志为政治委员，刘鹏同志为军事主任教员，张衍同志为政治主任教员，率队从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出发，前往山西太岳区的沁源县阎寨、郭道南北孔滩一

带敌后办学，受抗大总校和太岳军区的双重领导。

太岳区是陈赓同志率领的第三八六旅开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位于晋东南白（圭）晋（城）铁路以西，同蒲铁路以东，北靠太岳、南依中条山的广大农村作为依托，西连巍巍吕梁，东傍茫茫太行可作屏障，是联结我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岳大队抵达沁源县阎寨之后，就着手接受学员。开始时建立五个队，约六、七百人，大多数是第三八六旅和决死队第一旅（旅长李聚奎同志，政委周仲英同志）的基层干部，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连、排干部，还有少数营级干部和优秀的班长。一九四三年又建立一个队，专门训练县、区两级的武委会主任和民兵干部，还派出一个队单独到中条山（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去接受训练从西安、豫西和敌占区投奔根据地来的知识青年，教职学员发展到九百余人。每期训练时间一般为半年左右，主要任务是培养部队的基层军政干部。

太岳大队是抗大一个独立大队，带有随营学校性质，随太岳军区机关行动，一面学习，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由于太岳根据地所处战略地位的重要，反“扫荡”战斗特别频繁。一九四二年十月，日寇对我太岳北部地区进行所谓“剔抉扫荡”；一九四三年四

月，又对这个地区进行所谓分区“辗转扫荡”；当我太岳大队随太岳军区机关转移到太岳南部安泽县翼氏一带以后，十月，日、伪军又出动两万多兵力，采取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对我整个太岳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妄想把我军往南压进中条山区，再来一次“中条山战役”^⑪，象吃掉国民党几万军队一样，把我太岳部队一口吃光。敌人对我太岳区的“扫荡”，规模一次次扩大，花样一回回翻新，但都一仗仗以失败告终。在反“扫荡”战斗中，我太岳大队在太岳军区直接指挥下，紧密依靠群众，与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结合起来，利用山区有利的地理条件，发挥我人熟地熟的优势，及时化整为零，以队甚至以排为单位，迅速分途转进，寻隙脱离敌人的合击圈，转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地雷战，一般坚持一两个月，就可以粉碎敌人的一次“扫荡”，而每一次反“扫荡”的胜利，都是一次很好的实战锻炼。

一九四三年春，太岳大队大队长杨秀全同志调太岳部队任团长，由刘鹏同志继任大队长；政治委员张力雄同志调第六分校任政治部主任，由李良汉同志继任政治委员。

一九四四年春，由于日寇的连年“扫荡”和残酷的“三光政策”，太岳区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军民的

生活十分困难。加之日、伪军在沦陷区大肆抢掠、抓丁拉伕，沦陷区大批群众涌进我抗日根据地寻求生路，根据地的人口急剧增加，仅阳南县（即阳城南部我根据地）人口即从原来的八万人，猛增到十二万人，吃饭更成了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太岳区也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办法，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要求除作战部队外，机关、学校的粮食要半自给，每天每人只发九小两口粮（老秤，每斤十六两制），要吃饱饭，只有自力更生。当时正值春荒，又要进行春耕，太岳大队的同志一面挖野菜充饥，一面开垦荒山，种上谷子、土豆、南瓜等作物，经过半年多忍饥挨饿的辛勤劳动，秋季获得丰收，才渡过了困难。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还抓紧进行教育训练，获得学习、生产双丰收。

一九四四年秋，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十月间，太岳部队由内线作战开始转入外线反攻，派出部队渡过黄河，南下豫西，与太行部队并肩战斗，开辟新的豫西根据地。这时，随着部队的发展与根据地的扩大，急需迅速地培养大批基层干部，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将太岳大队扩编为太岳分校，由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亲自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赵征夫同志任副政治委员，李良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李茂之同志任教育长，校址也由岳南的翼氏一带迁移到中

条山区的阳城上、下庄一带。

太岳分校开学初，下设五个学员队，约七、八百人，都是太岳军区的连、排干部和少数营、团干部，先后轮训了两期学员，毕业后即分配到部队工作。与此同时，分校还派人随军南下，在豫西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为太岳部队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

一九四五年十月，抗大总校从绥德派出一支由一百五十名干部、教员组成的干部大队，由大队长赖光勋、政治处主任郭奇同志率领，到达长治，筹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太岳分校奉命由李良汉等同志率领六百多名教职学员从阳城到长治集中，与抗大太行分校合并，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政大学”，继续为我军培养新的干部，太岳分校即告结束。

抗大太行分校

太行分校于一九四五年春以抗大太行大队为基础组成，一九四五年冬并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时结束，历时近一年。它是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培养干部的一所抗大分校。

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千山万壑，峰峦起伏，绵亘数百里，地势险峻，且西有吕梁山、太岳山，

北有五台山、恒山，南濒黄河，东接冀鲁平原，进可攻，退可守，有广大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因此，抗战一开始，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就已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有一个艰苦斗争的阶段，并预定在日寇入侵山西时，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太岳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基地。

一九三七年九月底，一二九师出师抗日，到达山西前线后，经过艰苦作战，广泛发动与武装群众，开辟了太行山和太岳山区的抗日根据地，而且成为八路军总部的驻地。

为了巩固与发展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刚成立，抗大就派出庆阳步兵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学员到太行山区成立八路军随营学校。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央决定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办学，开始预定的目的地也在太行山区，当时虽然受敌情和气候的影响，不得不转道晋察冀，但到一九四〇年二月粉碎敌人大“扫荡”之后，抗大总校仍按原计划挺进晋东南太行山区办学。而且，为了培养更多的基层干部，一九四〇年六月和一九四三年一月，总校曾两次派出教职学员在太行山区组建抗大第六分校。由此可见，党中央、中

中央军委对太行山区部队的建设十分重视，所以抗大在这里才能持续不断地办学。

一九四三年冬，太行军区部队整编，抗大第六分校结束时，为保留太行山区培训基层干部的骨干力量，特留下第二大队的干部和教员，在河北省涉县固新镇一带组建太行大队，作为一二九师的随营学校，任命童国贵同志为大队长，彭宗珠同志为政治委员，继续为一二九师培养基层干部。一九四五年春，太行军区部队由内线作战开始转入外线反攻，派出部队渡过黄河，与太岳军区部队一起，开辟豫西新的根据地。为了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将太行大队扩建为抗大太行分校，童国贵同志任校长，彭宗珠同志任政治委员，并任命孟擎宇同志为教育长，李克如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短期轮训了一二九师的大批连、排干部。

一九四五年十月，抗大总校派赖光勋、郭奇同志率干部大队到山西省长治筹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时，童国贵、彭宗珠同志调离太行分校，由孟擎宇、李克如同志率领太行分校的六百多名教职学员从涉县到长治集中，与抗大太岳分校合并，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政大学”，继续为我军培养新的干部，太行分校即告结束。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抗大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

一九四一年，党中央、中央军委考虑到日、伪、顽对我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外来知识青年进入根据地日益困难，特别是进入华北根据地更加困难。为了我军发展的需要，除了新四军一些分校靠近宁、沪、杭等江南大城市，尽可能吸收一部分知识青年到抗大学习外，必须自力更生培养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提高部队的文化素养，以掌握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所以，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先后在总校和第一、第二、第七分校和太岳地区创办了抗大陆军中学，并在第二分校创办了附设中学，着手培养青少年接班人。这批青少年经过几年培养锻炼，到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大部分都已成材，成为我军的一批骨干力量。今天看来，中央这个决定确是一项高瞻远瞩，远见卓识的战略措施。

一九四二年初，总校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招收第八期学员时，正值八路军各部队进行“精兵简政”。他们就从各机关、部队精简下来的班、排干部和优秀的老战士中，选拔了六百三十名具有小学程度、德才

较好的学员，成立了附设陆军中学，由史紫千同志任校长，陈鹤桥同志任政治委员，于五月一日与总校第八期开学典礼同时举行陆军中学成立典礼。陆军中学的学制初步预定三年，计划通过长期培养，全面提高他们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使这批工农出身的干部知识化，作为今后建设特种兵的骨干。一九四二年五月间，史紫千校长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由任白戈同志继任校长。一九四三年一月，抗大总校迁回陕甘宁边区时，陆军中学仍留在浆水镇，改为太行陆军中学，直属一二九师领导。九月，敌人再次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陆军中学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甘肃省合水县，并入抗大第七分校，与太岳陆军中学合编为第七分校第三大队，在较安定的环境下继续学习。

一九四二年春，在抗大总校派出干部和教员到太岳地区建立太岳大队后不久，太岳军区也从三八六旅和决死纵队“精兵简政”中编余的部分连、排长、优秀班长和老战士里，挑选了三百多名学员，组成抗大太岳陆军中学，由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亲自兼任校长，张力之同志任副校长，曾延伟同志任教导主任，李一萍同志任政治处主任。下属三个学员队，教职学员三百余人。学制定为三年，军政训练与文化学习并

重。一九四三年十月，由张力之同志带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甘肃省合水县，并入抗大第七分校，与太行陆军中学合编为第七分校的第三大队。

一九四二年八月，第一分校也在冀鲁豫边区的濮阳县琉璃井村创办一所陆军中学，从冀鲁豫军区整编时编余的干部中挑选部分年纪较轻的团、营、连级干部，以及连队中部分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班、排长和战士入学培养。陆中下设四个队：第一、二队为营、团干部军事队和政治队；第三队为连、排干部队；此外，还有一个青年队，都是十五、六岁至二十岁的青年班、排长和战士，共计学员六百余人。由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兼任校长，余克勤同志任副校长，郑思群同志任政治委员，潘焱同志任教育长。九月二十七日遇到日寇的大“扫荡”，学校虽迅速转移，但郑思群同志却负了伤。此后，陆中一直处于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冀鲁豫边区的濮阳、范县、观县一带，坚持边学习边战斗。由于学校没有固定校址，经常流动，无法进行生产，过着半饥半饱的艰苦生活。但是，他们仍抓紧战斗空隙时间，努力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这一期学习历时近两年，一九四四年六月，冀鲁豫边区开展整风运动，陆中奉命迁往河南省林县麒麟镇，改为冀鲁豫党校，组织边

区干部进行整风轮训，陆中学员即毕业分配到各部队工作。第一分校陆军中学虽然只办了一期，但为冀鲁豫军区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为部队的建设作出贡献。

抗大第七分校陆军中学比总校陆军中学、太岳陆军中学和第一分校陆军中学成立更早。一九四一年七月，总校在山西兴县以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成立第七分校，同时也组建了陆军中学，由七分校校长周士第、副校长喻楚杰、政委徐文烈等同志兼管陆军中学，培训班、排长和优秀的老战士一百多人。但由于日寇连续“扫荡”，晋西北环境不安定，一九四三年二月，陆军中学随第七分校转移到甘肃省合水县；五月，与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合并，成立新的第七分校，编入七分校的第一大队继续进行训练。

一九四一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分析了当时边区的情况，认为自一九三七年冬我军开创晋察冀根据地以来，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冀中平原地区，历来文化比较普及，中、小学校比较多，建立根据地几年来，对学生加强了抗日救国教育，新一代知识分子正在成长。虽然由于敌人的封锁，外来的知识分子大大减少，但我们可以现有的基础上，自力更生，继续培养提高

边区这批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使他们为今后我军的建设服务。所以，决定创办抗大附设中学，从冀中地区招收一批高小毕业生，把他们提高到中学毕业水平，然后根据需要培养他们成为特种兵干部或技术人才。分校领导坚决执行聂司令员的指示，立即派出干部到冀中招生，很快吸收了七百多名十三岁至十六岁的高小毕业生入学，并由抗一团带领他们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来到灵寿县陈庄一带。不久，敌人对冀中地区进行“扫荡”，冀中的“抗日中学”（大部分是烈军属子弟）的一部分学生，又通过封锁线来到冀西参加抗大附中。此外，晋察冀部队在“精兵简政”中精简下来的一部分“小八路”和文工团员，也保送到附中来学习，学员人数达一千五百多人，分为八个队。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正式开学，晋察冀军区任命我兼任校长（一九四二年秋，由江隆基同志继任校长），袁佩爵同志任教导主任，具体负责教学工作，杨建群同志任教导处长，戴伯行同志任副处长。此外，还有生活指导科、供应科、总务科、卫生所等等，干部力量相当强。当时确定附中学制为三年，但只进行一年多教育，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分校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归回总校建制，附设中学也随校部转移，经绥德、清涧、延安，到甘肃合水县与第七分校合并，编入第七

分校第二大队继续学习。

一九四二年二月,为了保存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准备通过严格的军、政、文训练,培养成为战略反攻时具有良好的军事、政治素养和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基层连队指挥员,决定创办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从晋察冀部队中选拔了约六百名优秀的班、排长和老战士(其中有个别副连职干部),编为四个学员队,任命唐子安同志为总队长(后李钟奇同志继任总队长),陈宜贵同志为政治处主任。这批干部年纪都在十八岁至二十二岁,文化水平一般都是高小程度,少数初中程度,个别高中程度。他们大多经过战斗考验,其中有熊秀龙、阮守贤、蔡昌寿、张治国等少数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还有闻名全国的“狼牙山五壮士”中幸存的英雄人物葛振林、宋学义同志,政治质量比较好。这一期学员原定学制为三年,在冀西只学习一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分校奉命返回陕北绥德归回总校建制,陆军中学本拟作为第二梯队随行,可是刚离开灵寿县阎庄一带不远,日寇发动对晋察冀边区大“扫荡”,陆军中学奉命参加反“扫荡”战斗,直至一九四四年春才到达绥德,编为抗大总校第二大队继续学习。

总校陆军中学,第二、七分校陆军中学,太岳陆

军中学，以及第二分校附设中学，自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春，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分别并入抗大总校和第七分校，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一部分年纪稍大的学员即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大部分学员已成长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根据需要选送到炮兵、通讯、工兵、机要、医务和艺术、外语等专业学校继续深造，解放战争胜利后才陆续毕业分配工作，参加我军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我军特种兵的建设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特别是文化、教育、卫生以及机要、通讯、外交等部门，继续锻炼成长，发挥着骨干作用。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在那烽火遍地的年代，就高瞻远瞩，重视接班人的培养，期望着革命事业能一代一代往下传。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要我兼任附设中学校长时，就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过，毛主席曾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部队要建设，要发展，没有文化不行；要当好干部，没有文化也不行。遵照聂司令员的指示，我愉快地兼任了附中校长，担负起教育青少年的任务。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附中举行了十分热烈隆重的开学典礼，聂司令员亲自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勉励同学

们好好学习，准备将来建设新中国。晋察冀边区政府宋劭文主任，原二分校副校长邵式平同志也出席了大会。开学典礼后，附中学生进行了三天庆祝活动。孙毅同志和我陪同来宾参观了同学们的墙报，观看了他们的体育比赛和表演的活报剧、歌咏、舞蹈等精采节目。整个分校处处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分校附设中学由江隆基校长率领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于四月三十日到达延安。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到了延安，真象是回到家，见到了亲人，个个欢呼雀跃，面向宝塔山纵情歌唱。五月三日，朱德总司令、贺龙师长、总校何长工副校长特地来看望孩子们，给他们讲话，祝贺他们胜利通过封锁线，勉励他们为革命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好挑革命的担子。革命老一辈对青少年一代寄托的希望，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接着，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工作人员，带他们参观了延安宝塔山；并特为他们举行了两次晚会，让他们在中央大礼堂观看了精采的文艺节目。中央领导同志对少年一代的深情关怀，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至今谈起这段经历，许多同志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培养青少年一代，各级领导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本钱”，把有丰富教育经验的、德才兼备的

优秀干部派去办学，并要求他们“当好媒姆，带好娃娃”。这些干部明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意义，责任心和荣誉感都很强，一直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比如，总校陆军中学校长任白戈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三十年代就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曾到过日本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到延安担任过抗大总校的大队政治主任教员，以后又担任校政治教育科长，是个博学多才的教育家。二分校附设中学第二任校长江隆基同志，是个留学法国四年的留学生，懂几种外文，曾在陕西省担任过中学校长，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太岳陆军中学副校长张力之同志也是留学日本的留学生，知识渊博，很受学员的敬重。在抗大二分校的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里，也有不少教员是北京、上海等地到解放区的大学生，如附设中学的数学教员戴伯行是大学数学系学生，语文教员刘卓群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至于行政管理干部和政工干部，也都挑选一批政治水平高、有教育经验的同志担任。不少同志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建国以后都成为我军或地方高等院校的负责干部，在教育事业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这些青少年战士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学校领导十分重视培养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

得到全面发展。在提高他们政治觉悟的基础上，重点抓好文化教育。陆军中学的课程安排，文化教育占百分之五十，政治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军事训练占百分之三十；附设中学的文化教育占百分之八十，军政基础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在课程设置上，陆军中学以语文课程为主，以算术课程为辅。而附设中学的文化教育课程则更全面，有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还分班教授英语、日语、俄语，与当时全国普通中学的课程相似。所以，他们到毕业时，一般都达到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水平，为继续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党和各级领导同志深刻认识到，花盆里栽不出参天松，庭院中驯不出千里马。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有让他们在革命斗争的暴风骤雨中去锻炼、摔打，在革命实践的艰苦奋斗中增长才干，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五所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在敌后学习时，都经历过反“扫荡”的艰苦斗争；五所中学在从敌后转移陕甘宁边区时，也都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长途行军跋涉。附设中学一个体弱的小同学，在跨越上、下八十里的芦芽山时，因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冻死在这座雪山之上，但整个队伍还是战胜了这场风雪，胜利地越过雪山，经受了锻炼。当时，革命

师生曾自豪地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锻炼成为铁的红军。我们今天也学习老红军，跨过雪山，在去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身边学习的路上，先上了第一课。”在行军途中，大家一路走一路高唱：“鼓起精神上战场，团结起来坚如钢，年纪虽小意志强，我们一定能打胜仗”，整个队伍雄赳赳、气昂昂，一直唱到延安。

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是个教育单位，虽然没有战斗任务，但在敌后，战斗是难以避免的。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日、伪军出动四路兵力合击我抗大总校驻地浆水镇，陆军中学奉令转移，不料在向路罗川转进时，途中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校长史紫千同志带领第五连学员阻击，掩护其他连队突围。第五连都是年轻的班长，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他们凭借山地的有利地形发扬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打得勇猛顽强。最后，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他们就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个个刺刀见红，杀出了威风。奈因寡不敌众，完成阻击任务后，这个连只有一部分战士突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校长史紫千同志也不幸负伤被俘，英勇就义。从总校陆军中学第五连的英勇事迹，可以看出抗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已在青年一代中得以继承，发扬光大。

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分别编入总校和第七分校以后，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大生产运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都是工农子弟，无论开荒种地、纺纱捻毛线，样样都和老同志一样干。在劳模群英会上受到表扬奖励。

现在，这批抗大陆军中学和附设中学的学员都已年近花甲，但每当他们回忆当年的战斗岁月，都深情地说，四十多年来，自己能跟着党走过这样漫长、曲折的革命道路，坚定不移地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一步步前进，都是青少年时代党的哺育、教育打下的基础。

注 释

- ① 抗大第五大队：于一九三八年秋第四期末组成，驻于甘肃省庆阳故又称庆阳分校。
- ② 抗大第六大队：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抗大第二期步兵学校撤销，一部分学员组成八路军随营学校，开赴山西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继续办学。一九三八年五月，又从前线返回陕北洛川，编为抗大第四期第六大队，又称洛川分校。
- ③ 抗日沟：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交通沟。
- ④ 八路军军政学院：是一九四一年元旦成立的培养八路军政工干部的学校，院长由王稼祥同志兼任，教育长为张如心同志。
- ⑤ 《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央军委根据对第三分校工作检查的结果而下发的工作指示。详见第一部分“挺进敌后办校的第五期”的有关记述。

- ⑥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4页。
- ⑦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0页。
- ⑧ 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分会：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同志为书记；同时成立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同志为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同志为委员。
- ⑨ 林南战役：为了扩大根据地，确保太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以太行区部队为主力，冀南军区一部及冀中警备旅等十三个团，在河南省林县以南地区发起了“林南战役”；激战八天，至二十六日胜利结束，共歼日、伪军八千余人，开辟了豫北、太南广大新区，解放人口四十万。抗大第六分校参加了这次战役。
- ⑩ 北方局与华北军分会关于增设分校的指示：详见“第六分校”的有关记述。
- ⑪ 中条山战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寇以五万余人的兵力进攻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区。结集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共七个军，另在东北面的高平地区还有四个军，合计二十五万人。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部队，本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对日寇一向无作战准备，在日寇进攻时大部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我八路军在这个战役中积极配合国民党军打击日寇，国民党军仍然全部溃败，在三周之内，丧失了五万余人的兵力，余下的部队也渡河逃跑。

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回忆湘鄂赣边区史实之二

钟 期 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最难忘最值得回忆的。

血 染 红 旗

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平江扑城暴动，显示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取得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因此，敌人出于阶级本能，疯狂反扑，血腥镇压革命运动。

扑城暴动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随即调伪十六师彭位仁部、十九师李觉部，会同阎仲儒旅和县长刘作柱，向平江游击队发动“围剿”。首先在安定、思村、献钟、

钟洞等地成立和扩大挨户团等地主武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县被杀害者数千人。平江武装斗争的领导人、扑城暴动委员会主任罗纳川同志，于四月在西乡梓江被捕解县，当夜遭受惨杀。

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唐生智在湖南地区的内战暂时停息，反动当局对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镇压更加残暴。五月，鲁涤平任湖南省伪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何键兼“清乡”会办。他们将全省划分为五个“清剿区”，分别配备兵力，对革命运动进行残酷的“清剿”。平江、浏阳、醴陵三县被划为第一“清剿区”，以伪第二军副军长张辉兼任指挥官。参加“清剿”的部队有：朱跃华领导的二十三师、周磐领导的湖南独立第五师、第六师第二团、第三十五军之徐营。在全省“清乡”督办领导下，各县设立“清乡”委员会，组织“清乡队”、挨户团等地主武装协助“清乡”。敌人在平江杀人最多，有几个地方受苦最大，东乡的辜家洞、徐家洞、灶门洞、百福洞，被血洗一空，所有房屋全部被烧毁。不管你是否参加过革命，也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杀。真是“杀人不眨眼，血流成江河”。萤火洞与浏阳县交界，敌人就搞平浏两县“会剿”。我家所在的肥田区三眼桥的各级农会委员长，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只要被敌人捉

住都要杀掉。我们那里是第二十七乡农民协会，农会委员长叫钟紫云，就被敌人杀掉了。那时，敌人把这叫做“抓暴徒”，把共产党员和同情支持革命的农民群众及其亲属，统统叫做“暴徒”，抓住就杀。我家的三间房子全部被烧掉，一个姐夫被杀掉了。同我在李氏小学校教书的一位教师李国安，是共产党员，为人忠诚老实，对革命很坚决；因他有老婆孩子，敌人来时走慢了一步，就被抓住杀害了。

但是，革命的不怕死，怕死的不革命。敌人的血腥镇压，不但没有扑灭革命；相反，真正的革命者更加坚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更多了，党的组织更严密、更有战斗力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革命的红旗。国民党反动派搞“清剿”虽然十分嚣张和残暴，但由于他们只能占驻重点城镇，所以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仍是游击队的天下。他们虽然也经常下乡“清剿”，但只敢走大路、公路，不敢走小路，更不敢进山。常常山下是敌人，山上是我们游击队。他们依靠的是豪绅地主，还有民团挨户团，人数很少。我们的群众多，广大工农拥护革命。平江人民非常好，那时虽然生活很苦，没有米饭吃，搞不到盐，但不论我们跑到哪里，到处可以吃到红薯丝饭，群众有什么就给我们吃什么；群众还象亲人一样保护我们，从不向敌人告密。

尽管不少人因窝藏“暴徒”遭受株连，有的被满门抄斩，但绝大多数群众始终站在革命一边。

国民党独立第五师是一九二八年六月由南县调平江“清乡”的。师部直属队和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第一团驻平江县城，张超的第二团驻南江桥，刘济仁的第三团驻长寿街，黄公略同志的第三团三营驻嘉义市。一、三团中因有我党的组织，官兵同情革命。他们的“清剿”同其他反动军队大不一样，进村前先朝天放枪，名为“清乡”，实为报信，让我们游击队转移。乒乒乓乓放一阵枪之后，还给我们丢下一些子弹就走了。一团的党组织很坚强，有个副官长叫邓萍，是一团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彭德怀同志的左右手。滕代远同志去一团时，首先找到他接上党的关系。（后来他当了红五军参谋长，到中央苏区办教导队，据说红军长征时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牺牲了。）滕代远同志是湖南长沙人，常德师范毕业。当时他任省委巡视员，先到浏阳，后到平江县，那时我们平江县委在靠县城三四十里的濁水、宦田一带。他到平江县委以后，我物色人抬了一乘轿子，把他抬着送进县城。因为在当时，只有有权势的人才能坐轿子，一般人坐不起，这样就可以避免守城官兵的检查。我们把他送到君子巷镜中天旅社，他跟一团邓萍同志联系上，我们就不管了。那时，我

们还不知道要起义，只晓得有个什么“大计划”。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发动的平江起义，震撼中外，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对湘、鄂、赣三省边界各县的革命斗争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各县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人民武装，并产生了统一的革命组织——湘鄂赣边区党的临时特委，成立了湘鄂赣边区苏维埃政府。从此，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了。

平江起义后，在长寿街召开了平江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张怀一(后叛变)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好几个委员会，如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赤卫委员会，等等。我担任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负责行政工作；同时，又是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是黄栋清(后来是涂正坤)，胡筠任县委财政部长，张若清(又名张警吾)任县委宣传部长，刘宗义(又名张薰清)任军事部长。后来，平江游击大队组成红军三纵队，刘宗义跟吴溉之带领红军三纵队到中央苏区去了，由我兼任县委军事部长。那时，县委的领导中心，是在北乡与东乡交界的钟洞、思溪、留良洞一带，以这里为主要根据地。因为这一带好机动，进出都方便，四通八达。

这个时期，何键调六个团来平江进攻起义队伍，

镇压革命，敌人随即又搞三省“会剿”，红五军被迫离开平江，斗争十分艰苦；但平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还是作了大量很有成效的工作，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首先是整顿和壮大游击队。各乡游击队从起义部队那里得到一些枪炮子弹，经过整编训练后，全县成立了一个游击队，总队长是孔荷宠（担任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后叛变）。这支游击武装，对保卫革命政权、开展对敌斗争和后来充实扩大主力红军，都起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其次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县委通过各乡、区当地党员骨干，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反动派的各级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开展党的工作，有效地动员群众，发展组织。再就是巩固和扩大各级农民协会。农会是农民自己的革命组织，代表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广泛的基础。尽管敌人大力破坏，杀了不少农会干部，但由于县委和县苏的不断发动群众，并进行各项工作，农会始终没有被搞垮。特别是各个洞里的农会，总结了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敌人很难抓到农会干部。此外，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不少人成为湘鄂赣革命斗争的骨干，有的后来成了我党我军的优秀人才。

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也出现不少

偏差。例如，在发展组织工作中，有的地方受会道门的影响，采用会道门入会的办法，就是摆上香案，把香点燃，由入党人持香宣誓：“如果我叛党，照香行事”，一刀把香斩成两段。这种办法不符合我党的组织原则，是会道门“红家”（即所谓“圈子”）的办法，龙门这地方就这样搞过。这主要是前期的事，后来纠正了。又如，平江县委曾经颁布一种纪律，叫做“杀的纪律”。规定“违犯纪律者杀”、“泄露秘密者杀”、“携械投敌者杀”……共有十二条。这种做法持续了好久，直到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以后，提倡“自觉的纪律”，才开始得到纠正。当时在“杀的纪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做过一些错事。平江扑城暴动以后，有的人逃到外面去了。有个叫梁振廷的，他逃到修水后，把二十条枪卖给了修水靖卫团，得到一笔钱。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携械投敌行为。后来形势缓和他回到平江。他有个儿子叫梁国基，担任边区团特委的书记。我们就把他们爷俩捉住杀掉了。后来湖南省委专门为了解决平江“梁案”问题，发表了一个《告湘鄂赣边境全体同志书》，由省委巡视员蒋长卿同志来传达省委指示，纠正“杀的纪律”。是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经手处理的。他说：你们哪个干的，只要坦白了就没有问题。十二条“杀的纪律”是县委集

体定的，杀梁振廷父子是县委很多委员赞成的，但又不能由集体承担责任，只好推选三个人出来承认错误。其中有我、邓神生和谢光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学生，我是学生出身的。我们三人承认错误，说就是我们干的。最后蒋长卿同志作结论，认为梁振廷把枪卖掉，个人得到几十块银元，死有余辜；但他儿子梁国基没有参与，不应株连；今后不能这样干了，要纠正“杀的纪律”。对我们处理是：把我们三个人调离平江县委（把我派到铜鼓县工作，邓神生调到长沙工作，谢光振消沉下来了），并给我们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以教育边区全党同志，正确地执行组织纪律。在公布杀梁振廷父子的问题时，李克家写了个布告，落款为“中国共产党平江救党委员会”。我们不晓得有这个东西。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因为写个“救党委员会”，就是表示从党里分出来一个派系，是分裂党的行为。

扩 大 苏 区

一九二九年九月，我被调到铜鼓任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并代理一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边区特委的口号是：“发展苏区，扩大苏区，将苏区

连成一片。”这也是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宣传部长袁国平同志派我去铜鼓工作的任务。

我去以后，铜鼓县委负责人走掉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叫樊任民，是本地人。从平江去的人除了我，还有袁国平的岳父邱紫霞，作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是个老头子，有气喘病，经常烧个火盆烤火。他的儿子叫邱炳，是我的同学，一直跟我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后来到南昌病故了。

铜鼓背靠平江，大部分地方是山区，穷得很，连番薯都没得吃，又没有钱，就是有钱当地也买不到东西，要到外地去买，老百姓连油盐都很难吃到。肖克同志带着湘鄂赣边区的红十七师来铜鼓与红十六师会师。十六师到外面去了，没有会到。肖克的部队搞不到粮食，没有饭吃，呆不住走了。我去前有三四个区是苏区，幽居是个基本区，是个老根据地，县苏维埃政府就设在那里。那时候，湘鄂赣敌人的策略是：

“车干塘里的水，来捉塘里的鱼”。就是把老百姓杀的杀掉，赶的赶走，迁移的迁移，拆散我党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使我们失去群众，以达他们扼杀革命的罪恶目的。铜鼓的敌人的民团很厉害，驻在尤家河，抓到人就杀。铜鼓本来就穷，人烟稀少，加上敌人的“杀、赶、移”，苏区群众更少了。我是外地人，刚到铜鼓，对

当地老百姓不熟悉，没有群众基础，工作很不好搞。民团经常来进犯，那时县里没有武装，不能抵抗，只能跑，敌人来了就躲起来。好在是山区，贫困偏僻，敌人呆不住。他们一走，我们便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我们主要做两项工作：一是稳定人心，发动群众；二是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留下没有走的老百姓，都是很穷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向他们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性质和任务，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民团是他们贫困的根源。我们通过广泛宣传，层层发动，苏区群众觉得有了依靠，明确了奋斗目标，革命积极性高涨起来，外出自谋生路的老百姓陆续返回，被敌人强迫“移民”的人也纷纷跑回家乡。于是，我们就领导大家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巩固和发展苏区。山区土地多，就靠山吃山，组织群众开荒种茶，把加工好的茶叶，运到修水那边渣津、马坳去卖，也到浏阳这边的白沙镇去卖，卖了茶叶换回粮食和生活用品。山上野猪多，还组织群众上山打野猪，解决吃肉问题。就这样，铜鼓苏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不仅巩固了原来的三四个区苏维埃政府，还扩大了一个新的苏维埃区政府，地名叫做杨家墩。

后来，边区特委组织部长杨幼麟（又名石夫）同志到铜鼓巡视工作。那时边区其他县不少苏维埃政府被敌人搞垮了，当他了解到铜鼓的红旗没有倒，而且苏区扩大了，各级组织健全，工作活跃，生产得到了发展，受到群众拥护等情况时，他表示满意。边区特委听了他的汇报以后，对我在铜鼓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并决定调我回平江工作。

攻 打 长 沙

一九三〇年五月，王首道（又名王一芬）同志把我调回平江，让我跟随着三军团参加打长沙。

七月中旬，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开会。会议由彭德怀同志主持，讨论攻打长沙问题。我参加了会议，听到彭德怀同志和红八军政委邓乾元两人吵架。彭认为长沙好打，要打长沙；邓说中央指示打武汉，不同意打长沙。当时执行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目标首先是打下南昌和武汉，长沙没有列入。所以彭、邓意见不一致。实际上当时武汉确实不好打，红军从湖南北进，隔着长江，又没有船，易守难攻。邓乾元同志是文人，不懂军事，也不敢放肆跟彭德怀同志吵。彭德怀同志是打下岳阳以后，觉

得武汉不好打，才回头将部队开到平江，准备打长沙的。会上除彭、邓意见分歧外，其他人都是听会没人发言。最后按彭的意见做攻打长沙的准备。

一九三〇年七月打长沙时，名义上是红三军团，实际上是以红五军的部队为主体打的，仗打得很顺利。红军从平江西门出发，过了西乡，有个瓮江市，在那里一下子把守敌一个旅打掉了，真是势如破竹。敌人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兵象鸟兽那样四散逃跑。红军乘胜追击，直抵长沙城。平江有个独立师参加了打长沙，师长叫朱平，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是我们那个垵里人，家住濁水。朱平同志很勇敢，在第一次打长沙的战斗中，他带头冲过长沙东郊的梨梨市。那时候梨梨河没有桥，是临时搭的浮桥。他指挥独立师通过浮桥向长沙浏阳门和小吴门进攻，首先占领这两个门，为后续部队冲入市中心开辟了通路。他善于调查研究，熟悉路线，熟悉情况，仗打得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时牺牲了。

第一次打长沙，敌军溃逃到湘江西岸去了，红军和农民都没有多少伤亡，城里没有巷战，因此没有多少破坏。打开长沙以后，在市中心的教育坪开了好多次大会，群众队伍高举红旗，五彩缤纷，锣鼓喧天，火铳齐鸣，庆祝胜利。随即成立省苏维埃临时政府，

选举李立三为临时省苏政府主席，他没有到职。实际上省苏的工作由王首道、彭德怀、杨幼麟等同志主持。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肃反司令部，由省苏维埃政府成员、边区特委委员赖汝樵同志任司令。它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打下长沙清街道时，捉住长沙四乡各县逃到城里的许多土豪劣绅，在天心阁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镇压。又打开何键的监狱，放出几千名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政治犯”。红军派出大批小分队广泛进行街头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拥护。农民大量进城，因为有组织有领导，秩序并不乱。商店照常营业，只有大商店的老板跑掉了，就没收其财物，特别是红军和群众都需要的药品和现金。再就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盐、铁锅等，农民搞到不少，没收钟表店时，农民不要小表，专挑大钟，认为钟表越大越好。红军主要是清理敌人的兵器库，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打长沙时，平江县委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农民参战，组织担架队。平江农民参加打长沙的有几万人。农民扛着抬轿子的大杠，以区为单位编为赤卫队，秩序井然。他们过瓮江，到浯口，经长乐街，抵金井，从浏阳门进城，住在韭菜园，每天同市民一道参加红军召开的群众大会。农民很拥护打长沙，感到能到长沙来很了不起，又有实际利益，走在大街上威风得很。当

时准备成立长沙市委，拟由王首道同志兼任市委书记，要我参加市委的工作，后来没有组织起来就撤退了。回来时，担架队没有什么伤员抬，主要是抬运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那时我们不懂科学，缺乏军事常识，帝国主义军舰在湘江里打探照灯，一照几十里，农民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赶紧撤退。农民先出城，三军团在后面掩护，平安地撤回平江。

红军打下长沙，对湘、鄂、赣几省震动很大，并且影响全国以至世界。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夺取的唯一省城，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国民党武装镇压人民的有力回击，给了湖南敌军以沉重打击，使白军后来“谈红色变”，壮了红军的军威，为以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鼓舞了军心民气；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对装备和扩大红军与地方游击队起了很好的作用；搞到了不少现金和物资，不仅改善了红军给养，而且长沙附近各县农民也得到了实际利益。但红军并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这次打下长沙在客观上起了证明立三路线“正确”的消极作用。

“左”倾危害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是湘鄂赣边区

的全盛时期。边区以平江、浏阳为中心，包括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三省边境二十余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在广大苏区，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进行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苏区军民欢欣鼓舞，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平江县在一九三〇年几乎“全县赤化”（只有两个山区不属于我们，由豪绅地主盘据，掌握着一个挨户团，我们打不进去。一个是黄龙山由黄伯魁占领，另一个是南江桥由黄少谷统治，这两个反动堡垒，一直到全国解放时才被我们消灭）。当时县委书记是王赤，妇女部长是李贞，宣传部长是黄耀南，我任县文化委员会主任（等于现在的教育部长）。那时我们办了好多列宁学校，初小、高小很普遍，让广大农民的孩子免费上学，还办了农民夜校，给成年农民扫盲。

靠平江南乡的边界，有个长沙县的遵阳区，一九三〇年建立了革命政权，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叫余考山。这个地方归长沙县管辖，但当时的革命政权属平江县领导，还成立了一支游击队。

这个时期，湘鄂赣边区革命形势得以发展的原因是：从客观上看，经过一九二八年的“围剿”，敌人以为革命势力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一九二九年春，蒋介石

石、李宗仁内战爆发，鲁涤平离开湖南，其所辖部队也从这一地区撤走，给革命形势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从主观上看，红五军已由江西返回湘鄂赣边区，将五、八军合编为红军第三军团，胜利攻占长沙，以后一军团又来会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很大发展，这是边区革命形势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可靠支柱。有了武装，一方面保卫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开辟白区工作，组织群众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运动日益扩大。

但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党内“左”倾路线给湘鄂赣边区的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敌人的疯狂进攻，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一九三一年，我被调到湘鄂赣省军区当宣传科长。在那里没有呆多久，又调到省委保卫局。涂正坤是保卫局长。我开始当政治检查科长，一九三二年七月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侦察部长。那时，党中央由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他们不相信湘鄂赣当地干部，不相信知识分子，只信任从苏联回来的人。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央派林瑞笙、陈佑生来改组湘鄂赣省委和省总工会，否认敌人会进行第四次“围剿”，提出“反平浏观念”、“反游击主义”，执行“国际路线”，“向东南发展”。由于放松了对敌斗争的准备，把斗争

矛头指向革命队伍内部，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那时，省委常委直接抓肃反工作，由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傅秋涛、张金楼等分工负责。陈佑生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的代表，他在湘鄂赣一手遮天，根本不讲什么民主，只有他说了算，其他人都不行。省委书记林瑞笙是从湘赣边区调来的，把“左”的那一套都带来了，保卫队长就是他带来的。保卫局有个保卫队，三个排，人数比一个连的人还多，叫政治保卫队。名字很好，实际上负责抓人、关人、杀人。当然，保卫局是执行命令的。省委副书记黄加高，执行部长罗兴，都是执行“左”的路线。那时，认为“左”就是革命，“左”最革命，不“左”的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卫局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大搞逼供信，谁不同意他们的作法，马上就整到你头上来。在部队里，红十六军的政治部主任吴天骥同志也被当成“反革命”抓住杀掉了。省互济会主任胡筠同志、省反帝大同盟主席张警吾同志、省苏主席赖汝樵同志等大批省级干部，都成了“肃反”的主要对象，被捕捉刑讯，有的惨遭杀害。这是历史上的大冤案，应该平反。鄂东南苏区就是肃反扩大化自己把自己搞垮的，搞得没有干部领导了。浏阳也搞得很“左”。平江整自己人不多，“左”主要反映在对敌斗争上，抓住土豪劣

绅的家属，押送的人自己就可以就地杀掉。

“反平浏观念”，就是打击和清洗土生土长的，并得到群众拥护的平浏老干部。在湘鄂赣边区，平江、浏阳建党建政较早，培养的干部较多，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李宗白、杨幼麟、赖汝樵等一大批在当地革命斗争中产生的领导干部，对湘鄂赣边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林瑞笙、陈佑生为了扫清推行极左路线的障碍，对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统统加以打击排挤，以组织名义做出决议，公开进行批判斗争。林瑞笙等迫害平浏老干部，失掉人心，致使革命形势急骤逆转。这是十分惨痛的历史教训。

“左”倾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打击和排挤知识分子。林瑞笙、陈佑生搞唯成份论，让一个是文盲的雇农当省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那时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吃不开的。但在湘鄂赣边区党的早期建设中，正是一批学生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最先接受党的影响，投身革命，不少人为实现党的纲领献出了生命。因此，“左”倾路线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是不得人心的，是危害革命的严重错误。

向长武路发展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央派陈寿昌、徐彦刚同志来湘鄂赣，纠正林瑞笙、陈佑生同志的“左”倾错误。在这之前，中央多次发来电报并派巡视员来边区，指出：否认敌人会进行第四次“围剿”，放松对敌斗争的准备是错误的。陈寿昌同志来后，首先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举办训练班，以中央有关肃反问题的文件作为教育材料，批判“肃反中心论”、“肃反唯心论”。从而制止了革命队伍内部的乱捕乱杀，稳住了人心，把革命矛头转向了对敌斗争。当时，中央派到湘鄂赣的有好多干部。陈寿昌同志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徐彦刚同志任省军区司令员，他是四川人，很勇敢，很坚强，很能干，当过聂帅的参谋长。一九三五年八月突围时，他带着四十六团顺江而下，到江西瑞昌码头上岸，在永修县山区牺牲。他身上有支小手枪，刻有李明的名字。李明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或师长），在江西打了败仗，手枪被徐彦刚缴获。敌人发现那支小手枪才判断是徐彦刚被打死了。到湘鄂赣的干部还有刘玉堂、谭启龙。谭启龙同志任湘鄂赣团省委书记。

陈寿昌同志刚来时，让我做省委秘书长。后来，省委决定成立两个边区：修（水）铜（鼓）宜（丰）边区和湘鄂边区。总工会委员长施济被派到了修（水）铜（鼓）宜（丰）边区，任务是“向东南发展”；我被派到了湘鄂边区，任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任务是“向长武路发展”。省委派了一些干部，由我带着到那里去。但因这些干部不是本地人，不懂话，斗争艰苦，不能生根落脚，工作很困难。于是我尽量发现和起用当地干部。那里不同于平江老苏区，到老百姓家里吃饭要钱，没有钱不行。带去的人长期在山上不行，搞不到钱不能生活。后来提出一个口号叫“下畈去”，就是到群众比较密集、田地比较多的山区谷地开展革命活动。虽然到处都有敌人的挨户团，但老百姓还是保护我们的。中心县委开始有个千数人的独立团，后来交到主力红军去了，剩下一个保卫队，主要是在山区活动。

湘鄂边中心县包括湖南的临湘、岳阳和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和蒲圻等县的广大地区。当时没有电台，与外面没有联系，只有靠独立自主。县委领导，有个副书记叫黄天宝，蒲圻人，大个胖子。我调走后他当了县委书记，后来叛变了，当了敌军的教导员。他的部队在江南被我们打垮后，他跑掉了。宣传部长

叫陈樵，岳阳人。军事部长张存信，蒲圻人，很老实。妇女部长沈春华，家住蒲圻茶菀园，她的丈夫周长工，是县委委员。保卫局长黄启炳，也是蒲圻人。当时省委派到中心县委去视察工作的有张藩、李平同志。李平过去叫饶国瑞，蒲圻人。他是省保卫局执行部长，当过代理保卫局长，很勇敢，可以带兵打仗，又是当地人，搞钱很有办法，解放后当了湖北省水产厅厅长。中心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叫李济平，绰号叫“豆腐渣”，后来叛变了。带着敌人到处抓我、抓张藩同志和在那里养伤的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同志，但都没有抓到。解放后“豆腐渣”被镇压。

中心县划分有六个区。如东关区在崇（阳）通（城）交界，马颈区在长武路上，塔坳区在崇阳，等等。县委的活动中心在崇阳、通城，这里靠近三省边界，山高林密，敌人很难对付我们。

湘鄂边中心县处在粤汉铁路长武路段的中间地带，山峰连绵，地势险要。从山上山下，截住敌人的火车，就可以搞到钱和各种物资，除了我们自己使用，还可以供给省委。那里成了省委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重要“后勤基地”，省里经常派人来取钱物。当时省委机关在平江、浏阳交界的连云山脉黄金洞，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经常派刘玉堂等同志到我们

那里搞钱。我们的工作，除了搞钱搞物，主要是发动群众积极扩大苏区，发展党的组织，使边区各县连成一片。

靠近我们有个山头，山上是茂密的树林，驻着一股土匪武装。我们派人打进去做他们的工作，说服他们在对付国民党的“围剿”问题上同我们合作，结果打通了关系。后来敌人进攻他们时，他们就跑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有时捉到土豪劣绅，他们也派人帮我们看押，对革命起过一些作用。

红 旗 不 倒

一九三四年夏天，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湘鄂赣苏区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特别是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长征北上以后，湘鄂西和鄂豫皖等苏区的红军，也相继离开根据地，使湘鄂赣苏区和红十六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此开始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敌人集中“围剿”江西中央苏区，最得力的汤恩伯部八十余个团，其主力有敌十五师王东原部、十九师李觉部、六十二师陶广部、五十师岳森部、七十七师罗霖部、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建筑四道严密封锁线，对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实行“最后”的“清

剿”。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限敌军三个月消灭湘鄂赣苏区及其红军。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苏区大部分地区被占领，红十六师损失很大，仅剩二百余人，临时编为一个营，革命受到严重摧残。当时称为湘鄂赣省“六七月事变”。但苏区军民在省委和军区党委领导下，斗争意志始终没有消沉，移到平江的黄金洞、连云山、福寿山，浏阳的金坑、大围山、丙子岭、龙五排等山地，以及鄂东南、赣西北广大山区，继续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湘鄂赣边区人民始终没有屈服，红十六师始终没有被打垮，湘鄂赣的红旗始终没有倒下。

一九三五年春，我由湘鄂边中心县调到红十六师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徐彦刚同志是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任政委。这时红十六师已恢复扩大为四千余人的湘鄂赣主力红军。五月份，在平江的虹桥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是边区著名的虹桥战役。那时，国民党第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自恃“装备精良，剿共有方”。师长李觉是何键的女婿，猖狂得很，他封手下的陈铁侠旅为“陈铁军”，下令每个兵带根绳子，说红军没有子弹，没有什么力量，你们用绳子给我捆活的。结果一打，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埋伏的森林中四处出击，把“铁军”打成了稀泥军，

两个团被消灭，四百余人当了俘虏，敌兵原来带的绳子捆了他们自己，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十六师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里提一下方步舟。他是湖北大冶人，和徐彦刚共同指挥了虹桥战役，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当过士兵，后来对开辟和发展鄂东南苏区有过贡献。当过鄂东南道委书记，会打游击战，但以后在一九三七年逃跑叛变，当了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时，他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各千余举行起义，由王建安、谭启龙同志的七兵团接管。他们觉得不好处理，以后将他送到南京三野司令部来。陈毅同志主持三野前委讨论他的问题，经过研究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究”。陈毅同志交代我找南京市委书记彭冲同志作这样的处理：“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入党”。南京市委分配他在安徽宣城一个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在南京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现名为向光如。以后他先后被分配到农场工作。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方针是“北和南剿”。就是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主力红军，被迫表面上以“和”为主；而对我们南方革命根据地，则公开地大力进行“围剿”。在湘鄂赣边区，凡是交通要隘地区，国民党都建立了绥靖公署。

在浏阳的东门、白沙与铜鼓的排埠交界的地方，就搞了一个绥靖公署，把我们省委机关所在地黄金洞的后路堵住了。通城这一边，在平江北乡的天岳关也建立了一个绥靖公署。这个地方以山为界，北边是通城，东面是修水，南面是平江，天岳关一卡，使三县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被切断。还有平（江）、修（水）、铜（鼓）交界那个地方，也搞了一个绥靖公署。在边区内地，凡是我們稍微有点群众基础的地方，敌人就在那里修建碉堡，安个钉子，叫做“堡垒主义”。

我们同敌人针锋相对。他进山，我们就出山；他出山，我们又进山，跟敌人“换防”。他搞重点进攻，我们就分散搞支撑点。如平（江）修（水）铜（鼓）边、平（江）浏（阳）长（沙）边各是一个支撑点。修（水）武（宁）崇（阳）通（山）边也是一个支撑点，由江渭清、余再励领导；还有修（水）铜（鼓）宜（丰）边，汪克明、吴加明、吴咏湘在那里负责；湘鄂边也是一个地方支撑点。这样，化整为零，把部队分散，转移敌人进攻目标，分散敌人视线。支撑点越多，天地越广阔，机动范围越大，敌人就越难捕捉我们。既有利于保存各个分区的力量，又可保卫中心地区。

有分散，有时也集中。集中就进攻敌人；分散就

作群众工作。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是“逐屋推进”。前面有个屋子，看谁认识，就由谁去联系，总有认识主人的人，找到主人就有了办法。因为当地人熟悉情况，知道谁家好与坏，就可以一家介绍一家。今天你到李家屋，李家屋就把你送到丁家庄；丁家庄的人再把你送到毛家屋；毛家屋又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庄子。这样，我们就如鱼得水，许多困难都得到了解决，革命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利用矛盾，争取主动。三省交界，敌人内部有矛盾，还有嫡系非嫡系的区别，他们都想保存自己的势力，所以配合不好，“围剿”时你来我不来。我们就利用敌人的这些矛盾，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江西敌人来进攻，我们往湖南跑；湖南敌人来进攻，我们则往江西跑。我们是运筹帷幄，机动灵活。

掌握政策很重要。在敌人白色恐怖下，有许多人领到“良民证”。过去都把他们说成是反水，实际上没有反水，他们是为了保存自己，说他们反水是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后来我们提出口号：“变守望队的组织为赤卫队的组织”。守望队是敌人搞的挨户团的外围组织。经过我们做工作，名义上是敌人的守望队，实际上成了我们的赤卫队。这样一搞，我们就有了群众基础，地区就不断扩大。没有群众不行，要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不能同群众对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依靠群众，就立于不败之地。

那时候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但知道搞宣传造舆论的重要。我们经常派侦察员到公路上活动，捉到邮差就可以搞到报纸等东西，了解一些敌我情况。我们就写传单，要邮差夹到信里到处送，一直送到城里面去。邮差出于种种考虑，也给我们送，所以很多人收到过我们的传单。这种做法虽然在反动官僚阶层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在文化教育界和其他各界还起了一定作用，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揭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使人民同情和支持革命。那时写传单没有好纸，用的是毛边草纸，还不容易搞到，更谈不上现代化的印刷条件。

最重要的一条，是团结内部。内部不能有叛变分子。派人出去，跑掉一个就了不得。只有中心地区有个政治保卫队，其他地区主要靠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来增强党性、坚定信心。只要坚持斗争，革命总是有前途的。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内部团结一致，这是我们在那种艰苦环境中能够坚持下来最根本的保障。

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期间，锻炼和考验了一批党的骨干。傅秋涛同志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是工人

阶级中的好样的。他年轻时给店主作雇工，打豆腐、杀猪，很能干。一九二七年组织店员工人纠察队，领导工人运动。“马日事变”以后，专门从事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平江扑城暴动。特别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挑起了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的重担，在敌人残酷野蛮的“围剿”下，在整个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面前，他有股革命的“蛮劲”。他经常讲：“要下定决心，要执行决心”。有些人下了决心，往往不能坚持执行决心，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发生动摇，而他不是这样。正是由于他的革命坚定性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革命韧性，产生了他对敌斗争的胆略，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文化程度很低，但注意学习，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身上始终背着两本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也有历史性的缺陷，在“左倾”偏激情绪支配下，曾经做过一些错事。

国共合作以后，几经谈判，并得到上级党的指示，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武装发展到一千余人，一九三七年八月，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傅秋涛同志任团长，张正坤同志任副团长，王淮生同志任参谋长，我任政治处主任。从此，我离开了同敌

人浴血战斗了十一年的湘鄂赣边区，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而留在边区的党组织和部分党员，以秘密方式继续坚持战斗，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

回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的一段斗争

——在河北省委召开的冀中人民
斗争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 成 武

河北省委决定召开冀中抗日斗争史座谈会，吕正操、程子华、罗玉川、杨士杰、孙毅等不少同志都讲了话，讲得很好。要我也讲讲，我来主要是向大家学习的，冀中的抗日斗争史不少同志都比我熟悉，我只就亲身参加的后一个时期的斗争，谈谈情况，供同志们参考。

冀中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集中体现。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光荣的、胜利的历史。

这一伟大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中央、毛泽东

同志的英明领导，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规定了正确的路线，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和策略，从而指引斗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对日寇最后一战》，写了一系列文章、著作，代表党中央对抗日战争的各种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这些科学的论述，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就是人民战争的思想，这是我们前进的指南，行动的依据。例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切斗争，都是在这一光辉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进行的，所以说冀中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战略指导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的必然结果。

这一伟大胜利，是在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彭真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取得的。

这一伟大胜利是在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各兄弟根据地的斗争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下取得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开创，是同冀中地下党的组织和吕正操等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斗争分不开的，同一九三九年贺龙、关向应同志率一二〇师主力到达冀中河间，打了胜仗，对于冀中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及时雨的作用分不开的。

这一伟大胜利，也是冀中党政军民全体一致，长期坚持，共同努力，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结果。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形势是很严重的，到了一九四三年，冀中区党委、军区撤销，地委直属晋察冀分局领导，各分区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当时冀中的抗日斗争就是依靠各分区、县、区、村党政军民的共同奋斗，坚持了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能在那里站住脚，实现毛泽东同志讲的：“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各地区不怕牺牲，不怕付出任何代价，硬是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总之，党的领导正确保证了我们的胜利；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没有群众寸步难行。这是基本的两条，是已为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现在，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及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后的形势。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察冀边区包括冀西（即北岳区）、冀中、冀东等主要地区和冀热察辽地区。冀中平原又具有地区广大，物产丰富，人力雄厚，文化比较发达，群众觉悟高等有利的条件，对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有重大作用。冀中和冀西互为依托。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冀西处境就会很困难。在“五一”扫荡前，我们在冀西穿的衣服是高阳布做的，布要到冀中去背，吃的粮食有的还是从冀中背过来的，兵源也主要靠冀中补充。所以，冀中的战略地位很重要。

冀中处在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之间，是敌伪统治华北的腹心地带。如果这个地区敌人不能掌握，它占领的平、津、保、石、沧、德等大中城市都会不得安宁，并时刻受到很大威胁，那就更谈不上侵占冀西和其它地区了。冀中周围有平汉、平津、津浦、德石四条铁路，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对敌人的交通命脉构成致命的威胁，而且使敌人想确保华北占领区也成为不可能的。因而敌伪在华北驻屯了庞大的武装力量，从一九三八年不断调集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围攻、扫荡、分割、封锁、蚕食，而冀中平原根据地则成为敌伪主要围攻和扫荡的重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急欲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冈村宁次纠集五万余兵力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起，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在这种情况下，冀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撤到了外线，只留下少数部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了冀中平原的斗争。

“五一”反扫荡后，冀中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敌人为了达到其总的战略目的，进一步强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总力战”，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在冀中八千多个村庄，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千七百多个据点，修筑了七千五百多公里的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封锁沟。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把我冀中根据地分割为二千多块，每一块都置于严密火网封锁之下。然后分区逐块进行“清剿”、“剔抉”。村村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实行奴化教育。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我到冀中当军分区司令，一直到日本投降为止，没有穿过军衣，都穿便衣；总是十几个人一块行动，

有侦察科长原星同志，作战科长高存信、周自为同志，几个参谋，加上一个警卫班，每人一辆自行车，一天跑百把里路，多是晚上活动。林铁同志不会骑自行车就骑毛驴。为防备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被敌人一网打尽，我和林铁、金城、罗玉川、沙克、李志民等同志行军不在一起，而分为三路。每到一村住的都是堡垒户，不是村支部书记家就是副书记、委员家，最低是党小组长家里，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比较好的地道，一进村，就把自行车印扫掉。我一般睡在房里顶楼上，警卫员放哨，拉条绳子通到我的房子里，拴一个铃铛，拉几响是发现情况，几响是敌人进村了，几响是钻地道。那时候，总之是一条：紧紧依靠群众，没有群众寸步难行。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回顾五十多年的斗争历史，有两个时期，一个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一个是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时期，感受最深刻。冀中斗争最艰苦，整个平原一泻千里，一望无边，无险可据，敌情又那么严重，我们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战胜敌人渡过难关的，核心是党员、干部。冀中的群众好得很，有什么给我们什么，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子弟兵。在敌人最疯狂的时候，冀中一望无际，好象全无隐蔽，其实我们更好地荫蔽于群众之中，荫蔽于地道之内，表面看一个八路军都

没有，其实到处都有，而且坚持了犬牙交错的武装斗争。侵华日军高级军官当时曾经说：有两个冀中，一个地上冀中，一个地下冀中。

那时我们全部穿便衣，衣服是紫花布、高阳布做的，头上扎个毛巾。我不多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因为我不是北方口音，为此，还调了几个人随我们行动，一个是保定附近的，一个是天津附近的，一个是饶阳的。晚上睡觉手枪都放在床头，因为环境险恶嘛！

“五一”大扫荡后，在异常残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冀中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很多同志认为：能坚持！不仅能坚持，还能取得最后胜利。也有的同志对此有疑虑。

毛泽东同志早就预见到并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不足等等条件，平原游击战争是能够坚持的，并提出要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队，分散处于广大平原各县各区，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坚持斗争。这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以及坚持的办法是什么。

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聂荣臻同志根据毛泽

东同志的指示，针对冀中地区的严重形势，提出：我们在冀中有了五年的工作基础，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有广大的群众作依托，目前日寇在冀中的军事优势是相对的。今后只要坚决贯彻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到敌后之敌后，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冀中平原的斗争是完全能够坚持的。聂司令员告诉了我们坚持的条件，怎么坚持，连组织形式斗争形式都讲了。搞两面政权开展敌伪军工作，正确贯彻党的除奸政策，把党政军民拧在一起，鱼水相依，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不同斗争形式。我们坚决执行了中央、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的指示，所以越打形势越好！

这场战争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敌我之间的斗争非常残酷和复杂，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即辩证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各方面的斗争，去争取胜利。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把战术性质的游击战在具有特殊性的敌后抗日战争中提高到战略地位，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持久战，达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战略目的。以此方针指导冀中的斗争，我们逐步取得了主动，完成了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恢复了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林铁、罗玉川、金城和我都到了冀中。当时赋予我们的任务是：恢复、发展、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积极准备战略大反攻。在冀中区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坚决依靠群众，紧紧掌握武装斗争为主的中心环节，把留下的一小部分主力分散到各个地区，地方党政干部和部队统一编组，展开高度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并与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来对付敌人的“总力战”。

为完成恢复、发展、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任务，结合冀中当时的情况，我们研究拟定了五条方针：

（一）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

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必须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放手发动群众。

斗争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在无险可据的冀中平原上，唯一的靠山是广大革命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掩护，就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有了群众，则“如鱼得水”，活动自如。今天在座的当时的主要领导有罗玉川、旷伏兆等同志。旷伏兆同志所在的那

个地方是最艰苦的，正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带。敌人采取了“掏水捉鱼”等很多残暴的手段，妄图割断我党政军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因而更紧密地依靠群众，更深入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就成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根本问题。

经我党长期教育的冀中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精神。许多群众以身家性命保卫子弟兵，例如深南县王家铺村的群众为掩护子弟兵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群众被抓了二十多人，逼迫说出八路军藏在哪里，他们坚强不屈，虽然十四个人连遭杀害，杀一个不说，又杀一个还是不说……，直到最后，一个字也没有吐露。

日寇的“大东亚新秩序”和连续不断的强化治安运动给冀中人民带来了长期的极大的苦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强调荫蔽待机，不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保卫人民群众，就必然会脱离群众，群众的斗志也不能持久；或者只图一时痛快，轻率而战，又会引起敌人更残酷的镇压，也要脱离群众。因此，在游击战争的策略上既要反对不敢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保守主义，又要反对盲目蛮干的冒险主义。当时冀中区党委、军区注意了这两方面的问题，正确地掌握了对敌斗争的高度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既

敢于在敌重兵围困之下，为保卫群众利益，坚决打击敌人，又讲究斗争的艺术，坚持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首先打击对群众危害最大的小股敌人和铁杆汉奸。冀中子弟兵和人民创造了“挑帘战”、“院落伏击”、“捕捉战”、“化袭与偷袭”等多种对敌斗争方式，保卫了群众，锻炼和壮大了群众武装。坚持冀中斗争的广大人民、广大妇女、广大民兵是有着很大的突出贡献的。一九四四年，美国考察小组的杜伦中尉从冀中军区司令部去九分区司令部驻地皮里村考察，上半夜刚到，下半夜就被驻任丘、河间两县的日伪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全村一百多户的群众和九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关全部人员都钻进了地道，其中就有美国考察组杜伦中尉等。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八、九分区小队及其它部队在外边箝制敌人，里外夹击打了一天，敌人伤亡几百人，我只伤亡一大一小，一小是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刚生下来的儿子，在地道里怕他哭叫暴露地道，捂死了；一大是一个老大娘，没来得及下地道，被敌人抓住，敌人让她说出地道在哪里？她坚决不说，被敌人剃了好几个手指头，晕死过去了。把敌人打跑后，老大娘经我们抢救脱险了。杜伦回到军区司令部对我说：共产党伟大！八路军伟大！地道了不起！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胜利！信服得五体投地。

（二）把武装斗争与党对敌伪军的政策和革命的两面政策相结合

用敌人的拳头敲敌人的脑壳是冀中军民对日寇斗争的又一成功经验。分区、县、区、村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把许多伪组织变成“白皮红心”，同时我们有计划地派一些人到伪组织中去，为党的利益进行工作，两种办法，一个目的，就是表面应付敌人，实际掩护抗日战争。

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许多伪组织成了抗日的两面政权。我们利用它来监视、侦察敌人，取得情报；利用它来掩护我们的部队、群众，使我党政军干部和部队在敌占区畅行无阻；利用它来掩护我伤病员，甚至使伪军的点、碉成了我伤病员的荫蔽医疗所；利用它来欺骗敌人，把敌人引诱到预定作战地点，予以歼灭。

当日伪军联合行动时，我们经常放过伪军，专打日军；对少数“铁杆汉奸”和对我危害大的伪军头目，采取“单打一”、“掏老窝”等手段予以除掉。“单打一”不是不分轻重地打，而是拣要害打；对最反动的部队，坚决打掉；对一般被俘伪军，经过教育，能争取的争取过来，给予任务，当场释放；发挥全民的力

量展开政治攻势，教育伪军。伪组织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立功赎罪；扩大日伪矛盾，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经过反复斗争，逐渐地把一部分伪军、大部分伪组织置于我控制掌握之下。有一次，我们过平汉路以西开会，提前通知沿路伪军哨卡：我们几点过路，在什么地点过路，要他们监视日军，保证我们的安全。就这样，我们一路安安稳稳地经新乐附近到达开会地点。

冀中党、政、军、民善于把合法的和“非法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粉碎了日寇“以华制华”的阴谋，陷星罗棋布的敌点、碉于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使它形成一个一个的孤岛，使敌人处处挨打。

（三）开展冀中平原地道斗争

在粉碎日寇“驻屯清剿”的斗争中，冀中人民创造了地道战，大显神威。

“五一”大扫荡前，人民群众就挖了许多土洞和地窖，以防备敌人的抢夺、强奸妇女，坚持对敌斗争。

“五一”大扫荡后，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党领

导人民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发展成各家相通，环绕全村的地道，然后又发展成村村相连的地道网。但此时，地道还存在不少问题，关键的是地道只能荫蔽不能进攻，同时人多了进入地道，如何对付敌人的水攻、火攻、烟攻、毒攻、挖掘以至吃饭、喝水、大小便、照明等等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否则，大量干部、群众进入地道，敌人来了，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危险。为此军区进行了考察，做了调查研究，冀中平原最好和最差的地道我都钻过，还先后去任丘、蠡县、大城、饶阳、安平等县考察地道。除上面存在的问题之外，还发现因通风不好或地道过低，人进去就透不过气来，人多了更不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推广了一些地方如米家砦的经验，将单纯荫蔽的、防御性的地道进行一番改造，改造成了能守能攻的战斗堡垒。

后来，许多地区把发展地道与改造地形、改造村落结合起来，形成了“天地人”三通，构成了房顶、地面、地道和沿村、街道、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网，再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一个连环的立体的作战阵地。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形成了对付敌人的地下长城，对坚持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人不离地区，发挥了巨大作用。

地道战的高度发展，保证了党政群干部的安全，有了地道，许多顾虑都解除了：没有山做依托，但有了“地下长城”做依托，胆子就壮了，办法就多了，斗争的条件就大大地改善了。使我军在敌碉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它既利于小分队活动打击敌人，也利于较大部队集结荫蔽突然地歼灭敌人；既利于防御，也利于进攻，还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野外地道，封锁敌人的岗楼和据点。有一次在霸县、固安附近的米家峁，我十分区部队利用地道作战，打了一个星期，结果粉碎了日军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团的进攻。

冀中全区到底挖了多少地道？这是难以作出确切回答的。仅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后（这以前挖了多少无法计算），就挖了一万多里长。

在战争最残酷的年月里，英雄的冀中党政军民，以英勇的战斗精神和无比的智慧，筑成了一道“地下长城”，把无险可守的平原变为不可攻克的要塞。从这里可以看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智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各种各样的困难都能够战胜，都可以得到克服。冀中的广大民兵在坚持地道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它配合区小队、县大队，保卫了我们的党组织、政权组织、群众

组织，他们是立了大功的。每个村党支部的领导也有很大功劳，没有他们的领导，那样大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在斗争中，不仅青年男同志起了重大作用，女同志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组织“拳头”，准备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化，巩固、发展、扩大根据地，变游击区为巩固的根据地，积极为战略大反攻作准备。

为了达到中央、分局、军区的恢复、发展、巩固冀中根据地，准备大反攻的要求，仅有上述三个条件是不够的，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要组织“拳头”。因为“五一”扫荡后，冀中主力的十几个团都走了，有的到北岳区，有的到冀鲁豫，有的到晋西北，剩下的只有一个团，即二十四团，还是一个小团。如何把“拳头”组织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冀中军区及时地研究和决定了这个问题，并积极地进行了工作。

一九四三年，我们的斗争更加深入，各项政策更加发挥了作用。部队由高度分散逐渐走向集中作战。日寇为了防备被我各个击破，被迫收缩兵力，并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方针，不断地向我奔袭合击。在这种形

势下，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在地委和分区的领导下，地区队、县大队和区小队，采取三级武装联合作战的形式，坚决向敌占区挺进。但是“拳头”还不大、不硬。于是军区和区党委决定，从六、七、八、九分区各抽调一个地区队（团），包括二十四团（当时团长张英辉、政委梅成章同志），组成训练团，到路西进行了四、五个月的训练，组织了军区的“拳头”。另外为了统一作战思想，又组织了一个教导团，在路西专门轮训干部。练兵团团长由军区司令兼任，参谋长是黄寿发同志，政治部主任是王奇才同志。从一九四四年冬天到四五年春天，经过四、五个月的时间，军区有了五个团，各分区也有几个区队，“拳头”就大了。此后，进一步组织三级武装紧密配合，向敌人展开进攻。民兵广泛出击、武工队插向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主力部队穿插于敌点线之间，袭取敌伪据点，消灭驻守之敌。并以伏击手段消灭运动之敌。进攻矛头指向敌孤立之据点，有的采取围点打援，有的采取爆破形式。我们依靠深厚坚实的群众条件、绝对的政治优势，封锁敌人，欺骗敌人，造成敌人的许多错觉，把敌人变成聋子、瞎子，然后挥拳猛击，进行了若干战役，使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一步一步地取得了主动。

那时，日寇开展了“新国民运动”，首先在我九分区的任丘、高阳进行“突击示范”，围我群众三万多人。在长达六十里的任丘、高阳公路上，每隔十步放一个“新国民”，架了一条“人电线”，企图以此来监视和封锁我军活动。冀中人民利用了敌人这一阴谋，利用“人电线”为我们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使我们的部队，党政军干部畅行无阻，帮助部队打击了敌人。不但使敌人的“新国民运动”彻底破了产，而且把它变成了我们对敌斗争的新形式。这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我们的战争性质是正义的，人心是向着我们的，向着共产党的。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坚定意志和高度的智慧，使我军的战斗活动更加自如，胜利一个比一个大，把敌人打得无法招架。

一九四四年春，日寇被迫由“一县联防”到“数县联防”，我军则从一个地区的三级武装联合作战到几个地区的主力协同作战，加强了进攻的威力。到一九四四年冬初，西起平汉线，东抵平大（名）公路，北自大清河北，南达沧石路的广大农村已基本上连成一片。

这种气势磅礴的发展，是在根据地不断巩固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不可忘记根

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我们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办的。在根据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即转入以巩固为主；新区到巩固起来可以作为依托时再进一步向前发展。巩固与发展相结合。有的地区在发展中求巩固，有的地区在巩固中求发展。军队所到之处，党、政、民的工作立即全面展开。象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在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的统一领导下，兵马未到，工作先行，发动群众，除奸肃特，建党建政，减租减息，互助互救，发展地道，扩大民兵，壮大部队，做了不少工作，使主力部队得以轮番整训，交替出击。

恢复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保守主义，增强敢于胜利思想的过程。冀中地区由于“五一”扫荡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斗争非常残酷，因而克服保守主义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克服保守主义的根本问题，是要使党、政、军、民全体，特别是领导者要树立大智大勇精神，要具有洞察战争全局的能力，又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来处理是打还是不打，以及斗争策略和战术问题。冀中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既及时地防止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的急躁蛮干和

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轻敌冒进的思想，又始终抓住了反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进行斗争的右倾保守思想，因而较快地扭转了“五一”大扫荡后的严重局面。到一九四四年秋，我之攻势愈益猛烈，有的地区已发展到攻城夺镇、占领县城，形势是很好的。冀中各地委、各分区的领导同志、各县、区的领导同志为恢复、发展、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当时六分区司令员王相臣同志就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当时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同志，六分区还有叶楚屏、裴铁英、张逢时、吴树声同志等；七分区有张达、于权申、吴西、甘春雷、杜文达同志，还有苏锦章、姚振林、于世言同志等；八分区有周彪、张逊之、李弗畏、王念基同志等；九分区有陈鹏、魏洪亮、王道邦、刘光裕、李健、贾桂荣同志等；十分区有旷伏兆、刘秉彦、张如三、李大卫同志，还有金城、杨英、王之、吴砚农、王亢之、周宠、帅荣同志等。冀中军区的各个团，还有各分区的地区队、县大队，各县、区的干部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同志有的不在了，有的还健在，他们都为冀中斗争付出了心血，巨大的牺牲和代价，都是有功劳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在上述四项工作有了一定基础之后，于一九四五

年春天，我们开始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斗争，决定在冀中区内线发动六个战役。这六个战役我们完成了五个。最后一个战役即安（国）博（野）蠡（县）战役，在即将进行时，我的老秘书陈子端收到了莫斯科的广播，说苏联向日本宣战，出兵东北。根据这一情况，军区就下了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原地待命，准备迎接大反攻。

一九四四年冬天，日寇在我解放区军民的严重打击下，面临总崩溃的前夜，但仍疯狂挣扎，在冀中地区增调大量伪治安军，不断向我反扑扫荡。其重点是大清河以北地区即旷伏兆、刘秉彦同志那个十分区。为迎接新的斗争，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进一步壮大“拳头”，提高部队战斗力，积极准备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步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正规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在实行战略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遵循着毛泽东同志“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的指示，区党委和军区、

行署在一元化领导下，把各地区的游击队逐步地上升为各分区的主力，地区队变为野战团；把县游击队变为区队，区游击小队变为县游击大队，一步一步往上提。同时把各分区的主力部队集中起来进行政治整训、军事训练和干部轮训，开展大练兵运动。用毛泽东同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教育部队，统一作战指导思想，统一作战要求和战斗作风。树立敢于超越地区作战和打大仗的思想，树立敢于彻底胜利的雄心大志，敢于一次一个营、一个团的歼灭敌人。

一九四五年春天，毛泽东同志发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鼓舞了冀中区的全体军民。冀中区党委、军区、行署立即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放手地开展扩大解放区的战役。战役的总方针是：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贯彻毛泽东同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相结合为辅的方针，先由西而东，从白洋淀指向渤海边；尔后由南向北，席卷北平以南，天津以西，进而穿过永定河、子牙河，切断北宁线、津浦线，协同冀东、冀察部队夹击平津。

整个战役是以北平至大名的平大公路为中心展开的。第一仗是打平大公路上敌人的坚固据点辛中驿，揭开了战役的序幕。这一仗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

攻坚，用地道爆破的办法攻下辛中驿，一是攻点打援，集中我之主力，打击河间、任丘来援之敌。结果两处敌人都不敢来援，我们就占领了辛中驿。把任丘到河间这一段的敌人全部消灭干净，滹沱河以北就连成了一片。这个胜利之后，紧接着就打任丘和河间两个县城，进行第二个战役。为了迷惑敌人，其它军分区的部队进行佯动；七分区在西面，八、九分区打梁各庄，十分区在北边，六分区在南边。在各分区部队的配合下，我们胜利地占领了任丘和河间两个县城。当时我们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饶阳的五公，大家还骑马到河间去看了一下，那时打下个河间府不简单呀！以后我们又进行安平、饶阳战役。战斗还未打响，饶阳的敌人自己发妖风，往安平逃跑。于是我们命七分区副司令杜文达带分区的三个团、加上六分区徐信、李克忠同志那个团在安、饶之间的韩村打了个伏击，敌人大部被歼。残部逃到安平，又与安平之敌逃到深县，这样我们就解放了饶阳、安平。与此同时，分区一个游击队攻占了献县，一下子就夺回三个县城，解放了滹沱河南面的广大地区。此后九、十分区的主力又攻占了文安县和新镇县，打开了向信安、胜芳进军的大门。随后又展开了子牙河东、大清河北战役。八分区部队在南边佯动，九、十分区主力主攻，连克子牙

镇、大城县、信安、王庆坨等城镇，占了好大一片地方。

在整个战役中，我们使用“拳头”的总方向始终只有一个，就是集中几个分区的部队主攻，其他部队配合，打敌人的突出部、接合部、翼侧等要点和要害，同时从多方面箝制了敌人，使敌人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动向，陷敌于迷惑、混乱、恐慌之中，以保证我军行动的秘密和迅速、突然。在战术上，我们将奔袭、围攻敌人据点和伏击敌人援兵三者灵活地结合起来，使得敌人跑也跑不了，增援也进不来。由于巧妙地采取了这种作战方法，任丘、文安及大清河北的信安、堂二里、王庆坨等处的敌人都没有跑掉。我们还把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结合起来瓦解敌人。记得在攻任丘城时，敌人很顽固，一时攻不下来，我们就宣传优待俘虏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在攻深泽城时，敌人的堡垒在河堤上，很不好攻，敌人不缴枪我们就用爆破的办法一下子把炮楼子端了，剩下的敌人全都投降了。那时我们作战没有什么教条主义，比较灵活机动。在总的战役下边，各个团、各个分区，各个区队、各个县大队、民兵都互相主动地出击配合主力作战，取得了较大的胜利。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有秋风扫落叶之势。冀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战争，

参加战争，出现许多“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子打东洋”的动人场面。我们的部队、民兵、群众连营百里，民兵、担架队，给部队送东西的群众人山人海，晚上到处是烟火，敌人心惊胆怕，动都不敢动。当冀中区党委和冀中行署发出“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号召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罗玉川同志还记得吧，在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前我们全是便衣，你这个主任下命令让老百姓给做军衣，仅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军衣，你看看群众的力量多大！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不仅经受了考验，而且建立了丰功伟业！

五个战役，我们一共消灭日伪军一万多人，解放县城十二个，将解放区扩大到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近郊和津浦路至渤海边的广大地区。不久，我们在胜芳召开誓师大会，这个大会上宣布了延安电台广播的让我们拿下天津的命令，还传达了朱总司令的命令，任命杨成武为天津警备司令。此后我们打下了堂二里、胜芳、杨柳青、杨村、北仓、天津西站、灰堆、大沽口、岐口。

从被敌人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到置敌人于我军民重重包围之中，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从“五一”大扫荡后的昼伏夜出到白天昂首阔步地战斗，从屋内、

院内打起，到拔点、夺线、攻城陷镇，从消灭一个敌人缴一条枪开始，到成营、成团大量消灭敌人，这又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有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二是有冀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三是有从“五一”扫荡以后一直在冀中坚持斗争的许许多多的同志们的努力。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这么迅速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基本上是以广大群众为基础，以党员为骨干，以军队为核心进行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不断积蓄力量。在战争过程中，我们的部队不断壮大。到日本投降时，已由“五一”扫荡后的一个小团（二十四团）发展为九个地区队，又由九个地区队发展为二十六个团，编为冀中纵队，即晋察冀三纵队，后又组织了第二纵队即新三纵队，开赴张家口、归绥、大同、承德、热河执行野战任务，接着冀中军区又组织新的野战兵团支援前线。至此，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发展、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取得上述的胜利，完成了恢复、发展、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光荣艰巨的任务，为战略大反攻做了准备。这是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是党中央、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结果，是冀中广大干部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中央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决定的结果，是冀中广大军民英勇奋斗的结果。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干部、战士，归功于冀中人民。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和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尖锐、激烈、复杂、高度分散、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由于我们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的指示理解不够，水平不高，在斗争过程中这样那样的缺点也一定会是不少的。这些，也都要认真地加以回顾，加以总结。

日本投降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在这个时候，回忆冀中军民当年战胜日寇的英雄历史，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民族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时所指出的：“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要认真总结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史，用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来教育人民，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同时来教育我们自己，不要忘记这个历史，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把我

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尽我们的一份努力,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搞得更好。

庚申忆逝（之二）

张稼夫

（十二）

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央来电调我去延安。我从此就暂时离开了晋西。我走了以后，由龚逢春同志接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到了延安，在陈云和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时，才知道中央是调我到上海作地下工作。当时，刘晓同志从上海来延安，向中央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情况，说上海文化学术界人士比较多，要求中央派人到上海协助他工作。中央知道我曾任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和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有过来往，就决定派我去上海。我正在作准备时，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地突然围攻和消灭根据他的命令北移的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形势很险恶，同时，全国各地的反共活动也很猖獗。这就

是当时所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地下交通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去上海暂时是完全不可能了。不久，中央成立了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康生担任组长，吴德、栗再温同志分工负责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我和马纯古同志分工负责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当时，各地区，包括敌后地下党的领导干部也来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还有一些从各地来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的城市地下党的代表同志。我们就把他们请来，向他们作调查，了解敌后地下党，特别是敌占城市中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和经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等，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那时，抗日战争已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乘机发动反共高潮，使党的地下工作遇到许多困难，遭受了一些损失。毛主席研究了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后，提出了十六个字的地下工作方针。这就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十六个字不仅改变了过去地下工作中的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简单、幼稚的做法，而且预计到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发展，必将随之而来的战略反攻的新形势。因此要求党的地下工作者“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配合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保护好工厂、机器和城市的各种建筑设施，不致被失败的敌人破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以使敌占城市得以较为完整

地回到人民手中。

一九四二年夏天，中央决定将原晋西地区党委改组成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且把绥远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由林枫同志负责分局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构，是林枫同志来延安后，住在杨家岭提出报告，请示中央决定的。开始时，中央要林枫同志任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很谦虚，说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建议由关向应同志任书记，他可以担任副书记。后来，关向应同志重病卧床，在延安治疗，林枫同志就代理书记，以后任书记。秘书长是刘惠农同志，一二〇师的干部，湖北人，后随刘丰同志到东北去了，由刘文珍同志接替。刘以后是周文同志，再后是郝德青同志，直到大军南下。分局成立以后，林枫同志又向中央建议，要我回去参加晋绥分局的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既然不能去上海，中央就批准我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大约是十二月的一天，康生通知我说，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在早饭后到了毛主席那里，从八点钟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毛主席非常谦虚、亲切。谈话中为了把观点说得生动深刻，有时举例打比喻。当他听说我是山西文水县人时，就说：“噢，你们县里出了个女皇帝武则天呀！”后来，他问到我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情况，

又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等。毛主席的记忆力极好，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正题。毛主席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他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他指着茶壶继续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象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得很大，象茶壶的肚子了；现在又在缩小，到了象茶壶盖子那样大小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就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地区人口缩小到不到一百万人了。黄河这边是陕甘宁地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毛主席笑笑接着指出，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日本人和阎锡山暗中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资产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资产阶级。你们就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

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说，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负责加以保护，还可请

他们的代表人物当参议员，认真地搞好三三制政权！对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反动地主，就坚决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毛主席还批评我们搞得士气不振，环境一艰苦，斗争一激烈，就往回跑，就过河。毛主席对晋西北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具体。接着他又谈到领导工作方法问题。他说，领导要善于提纲挈领，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去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引用了一句古语说，“君逸臣劳”，这是古来就懂得的道理；我们的同志却不懂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不好。毛主席谈话很明确，很透彻，使人听了豁然开朗。毛主席和我一直谈到中午，并留我吃午饭。他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你要走就早点走，回去协助林枫同志把工作做好，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喜报。我兴奋地带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和指示，回到枣园我的住处，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大政方针。我在行前，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分别向贺老总、关向应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以后，就动身返回到我离别了两年多的晋西北。

(十三)

一九四二年底，我从延安回到晋绥边区时，分局正在河西召开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这两个会议是先后交叉召开的，先开高干会，中间举行了临参会。临参会结束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段高干会。在高干会上，分局已经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蚕食”、“挤敌人”的指示，我又传达了毛主席和我谈话的经过和口头指示，与会的同志听了传达，都感到很振奋，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经过认真讨论，高干会提出了一九四三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这就是：“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临参会的内容和高干会的内容是一致的，它是把高干会的内容，即把三大任务具体化为施政纲领，在全边区贯彻实施。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会议，选举林枫为议长，刘少白为副议长。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就是在林枫的报告中宣布的。除此之外，临参会还决定发行公债，作为边区货币的基础。这是一项应急措施，很得力，很有效。后来，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地盘也扩大了，财政收入增加了，大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这笔公债全部还清，很得人心。

原先，晋绥边区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所了解的一样，地盘逐渐缩小，人口由三百万减少到不到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连续不断的“扫荡”、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八分区的副司令员刘德明同志于一九四一年底在一次反“扫荡”中牺牲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频繁的反“扫荡”战斗中也受到较大的损失，从敌占区搞物资的渠道大大减少，战士、干部的生活极其困难，士气确实不怎么高。在这期间，刘少奇同志从华中赴延安，途经晋西北，在讲话中批评了我们只注意搞饭吃而忽视群众工作的缺点，并介绍了华中群众工作的经验。此后，以林枫同志为首的晋绥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也狠抓了群众工作，边区的形势大大好转。当时，干部、群众、部队听了中央的“反蚕食”、“挤敌人”指示以后，精神立即振作了起来，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展开了深入的学习，并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执行的具体办法。林枫、周士第、陈漫远、张平化、李夫克等同志和“抗联”同志以及设在军区的民兵总指挥部的同志一起，专门学习和研究了毛主席“挤敌人”的指示。毛主席为什么不提把敌人“赶出去”呢？这个“挤”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聚精会神地讨论，力求领会其精神实质。经过讨论，我们理解到，“把敌人挤出去”，是根据当时晋

绥边区敌我斗争形势的实际，提出的对敌斗争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赶出去，打出去，都不符合实际。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同志还写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文章，在干部、战士、民兵和群众中，广泛宣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经过在党内外认真的学习、动员和部署，一场扎扎实实的“挤敌人”的斗争开始了。“抗联”的负责同志前边我已列举过了，民兵总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先后有慕纯农、李一夫、卫一清、李硕等同志。这些同志在“把敌人挤出去”的对敌斗争中，均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起了积极的作用。

开展“挤敌人”的斗争，主要的方法是组织大批精干的武工队，骚扰敌人，开展地雷战，有可能时就拔除敌人的据点。在反“扫荡”战争中，干部、民兵和地方部队坚持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方针，切实实行坚壁清野，劳武结合，地方干部和民兵积极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除此而外，还进行一项极为重要的情报和内应的活动，这就是要加强敌占区，主要是敌据点中的地下工作的配合。由于我在延安参加过沦陷区地下党研究小组的工作，分局分配我负责分局城工部的工作。我们大力开展了敌后城市、敌占据点和交通要道，以及广大敌占区的地下工作。此后，又把属于晋绥边区管辖的敌后城市工作人员，

和准备派赴各敌占据点的工作人员陆续召集回分局，一边参加整风学习，一边学习毛主席关于敌后城市“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并以此十六个字为指针，总结各地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然后再派回到原地工作。挑选敌后工作干部的条件是党性强和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当时，在晋绥边区东侧日军占领的各个据点，全部派遣或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此以后，各个敌占据点的情况，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敌人出发“扫荡”，消息很快就传回来，我们就能及时采取对付的办法。加以随后吕正操同志调来晋绥担任军区司令员时，带来一些干部，如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同志、三分区地委书记孙志远同志等。这些干部同时也带来了冀中军民地道战、地雷战等一套对敌斗争的新经验。于是，我们在各地开办了训练班，训练部队和民兵，逐渐掌握了这一套战略战术。晋绥分局向全边区提出了“家家造地雷，人人会爆炸”的口号。那时，日军出发“扫荡”，从汾阳峪道河进山，到兴县三百来里地，一两个星期还走不到。他们走到哪里在哪里挨打，找不到粮食吃，甚至找不到水喝，夜里也不能休息，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回到据点后也不敢轻易出来。在分局成立以前，日军据点一直修到静乐的娄烦、离石的大

武、临县的三交，就连交城县的我方芝兰、岔口这样的重要军事重地也被日军占领为据点。我们从实践中积累了“挤敌人”的经验：先把经常离开据点出来“扫荡”之敌挤回据点；然后把交通线上的敌据点逐渐吃掉；就这样，终于把边区附近的日军据点都挤掉了。将近两年时间的斗争，晋绥边区的人口由不到一百万恢复到三百万以上，并将平川地区几乎全部变成了两面政权的游击区。全边区军民喜气洋洋，积聚力量，迎接不久将要到来的战略大反攻。

在“挤”敌人的斗争中，吕正操、周士第、陈漫远、李夫克等同志都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尊敬！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四年夏天，由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所谓盟国记者团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参观。当时正是挤敌人节节胜利之时，记者团到达八分区司令部的时候，罗贵波同志正在指挥攻打汾阳县协和堡、大营盘、火车站等日军据点的战斗。记者团到达前线亲自参观了这次战斗。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很快地拔掉了敌据点，还俘虏了好几个日本人。打得这样好，除了士气高，指挥有方以外，我们设在敌据点的地下工作人员起了重要作用。其实，那些据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要打哪个就能打下哪个，不过，有些敌据点，从全局考虑，暂时放在那里不打更好一些，所以我们

不打就是了。记者团亲眼看了这次战斗，高兴得很，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个美国记者名叫福尔曼的，拍摄了大量照片回到美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其中专门记述了在晋绥参观的情况，在国际上为我们作了宣传。

对本地区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况，分局作了调查研究，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相当重，大大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抗战以来，许多农民，连维持原有的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但是，为了团结地主参加抗日，又不能采取土地革命时期的办法，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少地和无地的贫苦农民，只能实行中央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区党委为此通过行政公署制订并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还颁发了在全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指示。条例中规定：地租和利息，一律减百分之二十五，叫做二五减租。这项工作适当地减少和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对于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根据有粮出粮的原则，适当地加重了地主和富农的公粮负担。在“公粮条例”中规定农户产量以平均每人五斗为起征点（每斗二十六市斤）。大小口平均产量为五斗以下者，免征公粮；五斗以上累进征收；土地多产量多，征收的公粮多，土地少产量少的征得也少，

这就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一些地主富农则感到压力大，有的以各种方法把土地转让出去，以逃避公粮负担。后来，甚至发展到一些地主，也成了免征户，他家的人均产量不足五斗！到了一九四四年，“公粮条例”又增加了“资产米”一项，即：虽然粮食不足五斗，但家中资产尚多，也要征收公粮；这一条当然是针对地主富农的，群众非常拥护。那时的减租减息和“公粮条例”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并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势在必行的政策。

在发展生产方面，我们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办法，一面发展机关生产，搞小家务，以减轻群众负担；同时，大力组织领导群众生产，开展生产运动。在农村组织供销合作社，对农业生产，提倡自愿互利的变工队、互助组，培养劳动英雄，纺织英雄，就象对待战斗英雄一样，给予荣誉和奖励。经过两年努力，粮棉多了，吃穿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实现了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此基础上，一九四四年冬召开了第四届边区群英会。这是边区两年来生产、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检阅盛会、庆功大会。参加大会的包括战斗英雄，劳武结合模范，劳动英雄，纺织英雄，战斗部队以及公安部队的英雄人物代表，如：段兴玉、崔三娃、张初元、温象拴、孙兴昌、路玉小、

张秋林、刘能林等。在会上，各路英雄模范，热情地交流经验，畅谈生产战斗的心得体会，群英会的热烈场面充分体现了边区的大好形势，是感人至深的。

还应当追述一下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学习运动，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心情舒畅。但是，在秋冬开展的抢救运动，直接冲击了学习运动；开展这个运动的主要文件是中央下达的康生在延安作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而延安的抢救运动又直接牵连到晋绥边区的干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坦白就抢救。抢救什么呢？抢救那些过去和现在充当了国民党特务、阎锡山特务和日本特务的失足者。康生不断给分局打电报，送抢救简报，今天说延安的谁谁谁坦白交待了，是个什么什么特务，供出了晋绥边区某个单位的某某人也是个什么特务。过了两天，又送来简报。简报上说，谁谁谁是假的，不是特务，本人推翻了；谁谁谁又坦白，又供出你们那里的某某人是特务。弄得乱哄哄的，人人自危，不知那天要戴个特务的帽子。执行政策时“左”得很，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

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还不罢休。领导上居然也信以为真，弄得工作没法进行。这种抢救运动的高潮，进行了一个多月，直接影响到三大任务的完成。当时分局正在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因在行政公署出现了异常严重的事件，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抢救，转入甄别工作阶段。随后到当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后，抢救运动才逐渐停止下来，改为搞甄别工作。抢救运动搞得时间不长，可是伤害的人很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甄别工作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时才基本结束。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啊！

晋绥边区还有一项特别任务，是护送干部过境。晋绥边区如同延安的门户，敌后各根据地前往延安的干部，或者从延安前往敌后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部分要经过这里。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干部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八分区、二分区、六分区担任。在八分区的晋中平川，早期是经过文水县的南胡堡的汾河渡口，从祁县车站附近既可以来往于封锁线，又可以直接买票上火车。后来这条线曾经被敌人破坏，敌人放火烧了南胡家堡，随即改为以文水县云周西村为敌后交通据点，那里是著名的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曾被群众誉为小延安。这个小

延安在对敌斗争中，在护送干部渡河通过封锁线的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后来刘胡兰是一九四七年在云周西村英勇就义的。在二、六分区主要经过忻县、崞县和代县之间的交通线护送干部。在护送工作中，上至刘少奇同志和许多七大代表，下至各根据地通讯人员。在千百次的护送任务中，没有发生过重大失误。这和六分区、八分区、二分区的干部的高度负责精神是分不开的，也是和各县、区、村的干部、民兵、武工队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艰苦奋斗精神分不开的。

(十四)

一九四四年底召开的边区四届群英大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敌斗争、生产斗争、减租减息运动搞得生气勃勃，部队、干部以及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群众情绪稳定，工商业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大力开展“挤敌人”的斗争，日军处于守势，已不可能频繁地进入边区“扫荡”。一九四四年秋冬，林枫、吕正操等同志到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去了。我是副书记，虽然也是“七大”代表，为照顾工作，留在前方代理书记的工作，没有参加“七大”。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希特勒战败；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和日军早有勾结的阎锡山，却命令他的部队立即进入太原等城市，日、阎合流，妄图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同时也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进攻。我们党为了捍卫全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进攻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便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林枫同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被调到东北，李井泉同志接任晋绥分局书记，我仍任副书记。这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贺龙同志带领部队返回晋绥，一度解放文水，之后，亲自到大同前线，指挥对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作战。

一九四六年夏，中央下达了《五·四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分局于六月召开了高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就关于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根据《五·四指示》精神，作了比较认真的讨论。那时对晋绥地区的工作估计以及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还是比较稳妥的。同时对于领导作风中的官僚主义作了检查，是有收获的。但是会议中由于对过去的工作片面地强调了找缺点，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例如，在各地、县负责干部汇报工作时，只准说缺点错误，不准说成绩，缺点错误越多越好，一直发展到查算一九四〇年“四大动员”时的老帐，越算越泄气。

而领导却说什么“成绩不说丢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这种专看缺点的作法，到一九四七年初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又有了发展，指名道姓地指责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把边区的工作形容得漆黑一团。后来这种做法未加制止，进而发展为逼、供、信。于是在干部中就出现了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反正我有两个口袋，一边装的是羊毛，一边装的是猪毛，你要猪毛有猪毛，你要羊毛有羊毛！”当时也竟将这样得来的材料写成文件大量散发，同时也将它送报给党中央。这种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土地改革中发展到顶点。在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以后，才有所收敛、改正。我自己身为分局的副书记，明知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然而总以为自己参与了过去的领导，不便为之辩解，未料到这样竟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自己对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惨痛教训，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

在高干会议以后，分局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狠抓了新解放区的锄奸反霸运动，同时抓了以下三项工作，这三项工作也就是把减租减息转变为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很有成效的。

第一项工作是派出工作组，作农村阶级关系和土

地情况的调查。工作组出发前分局在蔡家崖召开会议，布置调查任务，贺龙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先后讲了话。后来，这些调查组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和初建根据地时的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新中农普遍增多，李井泉同志强调要团结中农。由于形势的发展，这项工作尚未结束，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开始了。

第二项工作是分局制订了一个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文件《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这个文件是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结合晋绥解放区的农村实际情况制订的。这个文件不仅考虑到山西农村和南方农村情况有所不同，也考虑到本解放区抗日战争以来政治、经济、阶级情况的变化。负责起草这个文件的是段云、梁膺庸、吕韵、丛一平、方正之等同志。这个文件中，对于阶级成份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并且引用本区的实例加以说明。例如：地主和经营地主，什么情况才可划为地主或经营地主，土地占有、剥削的方式和数量，举数例分别加以说明。这就大大便于农村工作干部掌握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利于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运动。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曾把这个文件称为马列主义的文件。可惜的是，土改运动开始不久，就被康生否定，全部收回烧掉

了。

第三项工作是培训干部。从减租减息过渡到土地改革，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农村政策。土地改革是一场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运动，是在农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性的运动。为了适应这一运动的到来，分局决定培训农村工作干部，帮助广大干部实现思想上的转变。开办训练班，并立即把边区实验学校迁到岚县的东村。分局决定由我任校长，王文达同志任副校长。分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亲自讲课，主要讲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政策、方针、步骤、纪律等。并联系边区农村的实际，提出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具体要求。当时，把农村分为四类：一类是好的模范村，村干部好，工作能力强；二类是基本上好的，但有缺点，甚至错误；三类是工作不好，领导班子有明显的问题的；四类是问题严重，不可依靠的。这四类村子，第一类和第四类是少数，总的说来是两头小中间大，这种分析大致符合实际，而且分类指导这种作法，也是比较好的。遗憾的是，运动一起来，由于康生、陈伯达的干扰和破坏，就来了个大放手，不加区别，几乎全部否定了基层党的领导，大大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严肃批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分局从各机关单位、部队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陆续到达农村，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

(十五)

一九四七年春天，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发动了全边区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分批进行。《五·四指示》以后下到农村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分别编入各地的土改工作团。分局要求各工作团，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并以分局正式通过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为依据，划分阶级成份。运动初期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很快便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偏差，为这一伟大的运动造成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大约是在初春，康生由陕北来到晋西，到临县的郝家坡蹲点搞土改。分局派我也到郝家坡，公开说是协助康生工作，实则是所谓的“带上”。“带上”二字是康生的发明，他来到晋绥以后，对于当地的干部分为三类，采取三种办法。第一类是好的，叫做“依靠”；第二类是差的，叫做“带上”；第三类是坏的，叫做“超过”。看来，我是被划为二类，“带上”了。从

此以后，整个土改运动，我只能在郝家坡被康生“带上”，对于全区的工作，分局的工作，完全脱离。分局的会议不能参加，文件也不能及时看到。我这个分局的副书记，名义尚在，实际上无形中免掉了。所以，对于分局是如何领导这一运动的，我并不了解。在土改运动中，有一次王震同志曾经问我：“你怎么把小学都取消了？”我说：“我怎么知道呢？我在郝家坡，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不清楚。”只是郝家坡的情况和康生的情况以及一些比较明显的现象，记忆犹新；写了出来，只能算作一得之见吧。

土地改革运动，是在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背景下发动的。这一运动对于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总的说来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其次，晋绥的土改，又是在我党从上到下全面掌握领导权已达七年之久的情况下进行的。基层党组织，农村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蜕化变质或是被地主富农篡夺了领导权的是极少数。土地改革运动应当主要地依靠这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而不应当把他们一脚踢开。再其次，从“四大动员”起到土改的七年中，农村出现了一些新中农，这批新中农原来是贫农，由于我党的阶级政策的实施，他们才得以上升为新中农。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应当把他们看作和其他贫农一样，是

依靠的力量。至于土改的主要对象地主，情况也有某些变化。有一部分地主、富农的土地数量远远超过平均数，他们还在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剥削农民，还有相当的资财。但是，同样也应当看到，“四大动员”、“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公粮条例”以及其它税收和负担的政策实施，相当一部分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资财已经不多了。例如，晋绥边区的第一流的地主牛友兰，已经下降到免征公粮户；“四大动员”时，他捐献资财很多，也很主动，被称为开明士绅，所以他被推举为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一二〇师的司令部就设在他的院子里。他在河西办了个纺织工厂，也全部捐献给边区政府；他老婆死的时候，边区政府还送了花圈。可是，在土改中，牛友兰成了主要斗争对象，这显然是个错案。康生所在的郝家坡有个地主叫刘佑铭，一九三六年初，红军东渡时，被打土豪，“四大动员”，减租减息，以及各项负担，他都是重要对象；到土改的时候，已经破产，地卖光了，老婆孩子没有了，一个人住在一眼破窑洞里。我向康生反映这个人的情况，他说这是“化形地主”，他的地是卖光的，不是分配的，不能算作土地革命，没有土地，应当挖他的浮财和底财。影响更大的是陈伯达参加的兴县后木栏干村的土改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写了一个《后木栏

干调查报告》，分局把它铅印成册，发到各土改工作团。这份报告提出要查三代。据说，在后木栏干搞调查的一个负责干部，跑到野外墓地，查看墓碑，以此为依据划成份，这么一查，好些党员、干部、民兵的成份，虽然早已下降为贫农，或者本来就是中农，土改中却被当成地主，挨了斗争。同时在《后木栏干调查报告》中，除了强调了查三代这一条以外，还强调了“看铺摊”和“看政治态度”两条。这样就将土改的打击面扩大化到异常严重的程度了。后木栏干村在划成份前只有两户地主，占总户数五十二户的不到百分之四，划成分后把剥削阶级划成二十一户，占到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寨县东秀庄行政村在土改复查中，发动群众审查和改订阶级成份，由过去地主一户改订成十九户，富农二户改订成十户，中农七十五户改订成三十六户，贫农三十五户改订成四十四户；其他一户改为五户。地富的比例由原来的百分之三上升为百分之二十五（详见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晋绥日报》头版消息报道：《五寨东秀庄土地复查中发动群众，审查改订成份，清查大批地主，群众觉悟提高》）。不少地方，甚至把工商业者当作“化形地主”，公开侵犯他们的利益。康生在郝家坡常说：“地主就是老财，老财就是地主”。对工商业者，康生有句定义，即“无商不奸”。对待干部同样

以感想代替政策，把那些了解下情的基层干部（他们知道地富土地已经分散，搞不到多少斗争果实）的说法一概视为“右倾”和当作土改障碍而“超过”，叫做“搬石头”。郝家坡支部书记严朝臣，贫农成份，作风正派廉洁，就是有点好人主义味道，胆小怕事；康生认为这种人不能用，不能依靠，一直发展到把支部也一脚踢开。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兴县胡家沟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审查党员”的错误口号影响下，批判了二区区委组织部长刘初生，称他为“候补敌人”，他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实际上，刘初生是个较好的有影响的干部，兴县的许多干部得知刘初生被斗被撤职的消息以后，反应非常强烈，认为象这样的好干部被打成“候补敌人”，咱就早该撤职了。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当时，我虽然是被“带上”干工作的，但对这些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作法看不下去，常和康生争论。因为我是被“带上”的，最终还是康生说了算。在郝家坡搞土改工作的还有李伯钊、杨之华、谷羽、毛岸英、魏怀礼，还有太岳区派来的郑海，他们都认为康生的做法不恰当，也给他提了意见。但是康生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他很霸道。他说的话，还要我们作记录，油印出来存档。这些东西很多，可以在中央档案馆查到。

“左”的错误越发展越严重。康生看了《后木栏干调查报告》，认为很好。可是对分局制订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却大发议论，说是这个小册子在重庆可以用，在晋绥不能用，并且说当我军打过了长江时，就要宣布“土地国有”了。不久，分局下通知把这个文件统统收回去，烧掉了。毛主席一九四八年路过晋绥时说：“在你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毛主席说的“那么一点”，指的就是那本《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正确的政策不要了，只好听康生、陈伯达的瞎指挥。当时，郝家坡附近出现了打人的情况，不仅仅打地主、富农，也打干部、党员。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他不仅不制止，反而说什么，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义愤嘛，打几下也可以嘛。不久，打人之风便盛行起来，捆绑吊打一齐上，伤害了许多干部党员和中农，也打死一些好党员、好干部和积极分子，著名民主人士孙良臣也被打死，在群众中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一九四七年初夏，康生在郝家坡召开土改经验交流会，各地土改代表团都派人参加。正在静乐县领导土改的陈伯达也来了。陈伯达去静乐县搞土改比我们郝家坡晚一些，但他很快就搞完了。陈伯达在会上发言，介绍他在静乐县搞土改的经验，题目是《遇事和

群众商量》，实际上就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甘当群众的尾巴。晋绥分局通过的以农会名义公开发表的《告农民书》就号召“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公然宣扬不要党的领导，这一套尾巴主义的东西确实是从康生、陈伯达那里弄来的。在运动中，陈伯达在静乐县枪毙了一个民兵英雄，说他是恶霸，是“狗熊”，接着，他又抓了一个“五虎弟兄”。《晋绥日报》又加以宣传，这可就不得了了，这里也有“劳动狗熊”，那里也有“五虎弟兄”，闹得不可收拾。在这个经验交流会上，康生大谈其挖底财的经验（实际没有挖出多少），陈伯达听了大叫起来：“唉呀，我犯了个大错误，忘了挖底财啦，我要补课！”本来，他在静乐搞的那个点的土改结束了，他又匆忙赶回静乐去挖底财。

对于康生、陈伯达的那些作法，晋绥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早就有抵触情绪，非常反感。康生不仅不作自我批评，反而大骂晋绥干部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要继续“搬石头”、“贫农团要代替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打乱平分”。在这种“左”倾思想的基础上，《晋绥日报》发表了内容非常错误的《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还发表了针对工商业者和地下工作者的评论《过河必须拆桥》。这种言论不仅错误，其后果更十分有害。还在报纸上公开

宣布解散所谓地主操纵的朔县、右玉、平鲁、怀仁等四个县委、县政府。报纸上还发表了批斗晋西北临参会副议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的长篇消息。影响所及，又是火上加油。一九四七年七月，晋绥分局召开土改整党工作会议，又叫做地书会议，各地委书记，土改工作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是按照康生、陈伯达的旨意召开的。当时，本来运动已经搞得很“左”了，但会议的主题却是继续反右。通过这次会议，土改中的那一套“左”的东西合法化、系统化了，林枫同志是缺席受批判，而我是被作为批判对象参加这次会议的。会后不久，我率领晋绥代表团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由党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在这个会上，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这个大纲中，提出了成立“人民法庭”处理罪犯的规定。我们回来以后，在分局机关干部会上作了传达。但是，分局未提出任何具体措施，以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而是任其发展。

一九四七年底，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会前，毛主席派乔木同志来临县调查划分阶级成份扩大化和侵犯私人工商业的错误。同时，乔木带来了毛主席在苏区

划分成份的小册子。其中规定地、富成份不能超过百分之八，而当时在临县几个点都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明显地把一些中农划到阶级敌人阵营中去了。中央的这次会议批评了晋绥在土改中的错误。李井泉同志参加了这次中央会议，回来以后，及时发了三个关于纠正“左”的偏向的指示，但有关中央这次会议的情况，就连我和龚逢春同志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主席路过晋绥和我谈话时，才了解到在中央会议上批评晋绥分局的情况。四月一日，毛主席在蔡家崖军区礼堂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于晋绥边区的工作以及土改的成绩作了充分的全面的估计。毛泽东同志指出：“晋绥的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领导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这表现在实行了减租减息，相当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纺织业、军事工业和一部分轻工业，建立了党的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近十万人的人民军队，因而就能依据这些工作作基础，进行了胜利的抗日战争，并打退了阎锡山等反动派的进攻。当然，这个时期的党和政府是有缺点的，这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明白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成份不纯或者作风不纯，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工作上的不良现象。但是，就总的情形说来，抗日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引自《毛泽

东选集》第四卷第1309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估价,完全符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深受晋绥广大党员的拥护。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晋绥的党组织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这主要地是三个偏向。第一,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这项偏向已经纠正了。这样,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现在,这些偏向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

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过去一年中，晋绥在这方面曾经发生的偏向，现在也已纠正了。”（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05页）毛主席的讲话，成了晋绥土改后期工作的指路明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偏向。例如：末期土改尚未分配土地的地方，把打乱平分改为抽肥补瘦，填平补齐。又如，对部分错误地被开除的党员恢复了党籍，对部分受到侵犯的中农的财产也给以赔偿等，受到群众的拥护。

会后，毛主席应邀亲笔题写了两张条幅：

一张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

一张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毛主席的这两条题字，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后来，全国各地都影印了这两张条幅，供干部认真学习，指引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十六）

一九四八年春，在我党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在粉碎了胡宗南向陕北的进攻的同时，将我人民解放军组成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经过冬季的新式整军以后，有计划地分工配合向敌人发起了春季攻势。四、五月间我一二〇师由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先后解放了晋西南地区的阎顽在隰县和运城两个坚固据点。当时的吕梁区党委，由王震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彭绍辉同志任吕梁军区司令员，罗贵波同志任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政委，魏怀礼同志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张永青同志任区党委宣传部长，区党委秘书长是阎子祥同志。吕梁区党委下设汾西地区的九地委、新绛地区的十地委、运城地区的十一地委。与此同时，分工由陈赓同志的部队负责对阎顽的临汾据点的进

攻。在临汾城尚未攻下之前，我党中央为了支援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任务，决定将解放了的晋南地区划归陕甘宁、晋绥，作为向西北、西南地区进军的战略后方。于是成立了晋南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派出机关，书记是武新宇同志，副书记是龚子荣同志。临汾城解放以后，中央又决定委派西北中央局副书记马明方同志兼任晋南工委书记，武新宇、龚子荣任副书记。我自己当毛主席路过晋绥边区时，曾经多次要求到基层搞实际工作；经主席同意，就派我任晋南工委副书记兼临汾县委书记。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中央和晋绥分局，接受了我多次请求，给我一个到实际工作中锻炼的好机会。同时，我也感到遗憾，这遗憾不是由于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这只是个人的区区小事，不足介意；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眼看着工作受到损失，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就离开了老区的群众，心中实在感到惭愧。那么，我只有一个办法，这也就是接受经验教训的办法，把新解放区的工作搞好，以驱散淤积于自己心头的内疚情绪。

当时，临汾县委的主要工作是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们的理论、政策武器就是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有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那时，临汾县委的副书记为冯克心同志，临汾县长为张平同志。在工作中，我们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临汾县的河西地区，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我主要是依靠了慕生忠、魏怀礼、彭德、赵守攻等同志。慕生忠同志是陕北老干部，我把汾河以西以北的一摊子交给他，所用的大多数是分局党校中在土改期间被打下来的干部。魏怀礼也是陕北老干部，在瓦窑堡挖过炭，抗战初期，是晋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开辟人之一，当时任吕梁区党委组织部长，由他来主管临汾以南、金殿一带。彭德当时是晋南十地委的党委书记。赵守攻是十地委委员兼新绛县委书记，领导本地区的土改工作，晋南地区的土改工作比较稳，进展也比较快，没有出什么大的偏差。一九四八年底，晋绥分局通知我和武新宇同志回去开会（此时我仍是晋绥分局的副书记）。我到兴县时，才知道要召开党代表会议。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李井泉同志去了绥远，没有参加会议。到开会时我才知道开会是要统一思想。那么统一什么思想呢？原来，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分局受康生、陈伯达“左”倾错误的影响，在运动中伤害了不少群众和干部，中央，特别是毛主席指

出晋绥土改中的错误以后，纠偏工作搞了一些，但是很不得力，落实政策的工作也不够好。为此，有些干部对晋绥分局的意见很多。我猜想，分局召开这次会议，大概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总结经验，促进团结。我想要达到这个要求，如果参加会议的某些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曾经出谋献策、推波助澜、胡编乱造的人，也都作点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担一些责任，情况就会好得多。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大有想把土改错误的责任全部都推到少数领导同志身上的企图。显然，这种做法是恶劣的和不公平的。结果，只是由张子意同志代表分局做了个工作总结，笼笼统统检讨了几句，会议就草草结束。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此很不满意。年底我回到晋南去，没有工作多久，中央就调我去西北局工作，匆匆离开临汾，到了延安，这已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了。

西北局的书记是彭德怀同志，副书记是习仲勋同志和马明方同志，马文瑞同志任组织部长，我到西北局后任宣传部长。这时贺总、王维舟、张经武等同志都和我开玩笑地说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等等。我说我是安泰，刚刚匍伏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现在又悬到空中了，说不定那一天我会被阶级敌人扼死的。我到延安只有两个多月，西安就解放了。六月初，西

北局迁到西安。从延安到西安，工作对象，任务不同，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当时主要工作是接管、剿匪、反霸、统一战线，有的地方搞土改。我们的武器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工作忙得很。这一段工作，身体比较疲乏，还患过病，但工作顺利，心情愉快。西北局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西北局的书记彭老总对干部很信任，很放手，除了制订本地区的大政方针、工作计划和检查工作外，他主要抓了西北第一野战军的工作。而第一野战军的总部是设在兰州的，同时他也常到各地指挥解放大西北的战争。西北局的日常工作由习仲勋同志主持。整个西北局的领导工作很放手，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下面的干部也不是个个都很强，但是工作得很好。彭老总、习仲勋同志善于把中央的精神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制订方针政策，使干部人人心中有数。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的任务，一是出主意，一是使用干部；要做到知人善任。彭总和习仲勋同志可以说是深得要领的。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那就是党内生活非常健全、民主。那时，西北局常委定期开会，我是常委之一，每次会议都提前将会议讨论的内容印发给常委每人一份，以

便早作准备。大自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小到人事任免名单，都是集体讨论决定。不搞一言堂，不搞突然袭击；而是做到认真、稳妥，人人心情愉快。例如，毛主席曾对西北地区的工作有过多次数指示，大意是讲：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民族问题复杂，你们要搞得稳些，不要性急，不要抢先，搞少数民族工作，要先把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搞好，不然就很难接近群众，这是我们搞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长征时你不和上层人士搞好关系，就很难接触群众，群众也不敢接近你，千夫长，百夫长，一声令下就把你干掉了。陕甘宁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一定要把民族问题解决好。西北局常委会对毛主席的指示，都是进行认真的传达和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的。我记得，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有一个藏族部落的千户，名叫项谦的，由于不了解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动不动就造反，拒绝我们进入他们那个地区。我们就耐心地做工作，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搞到七、八次，终于得到他们的信任，打开了局面。对于民主人士，凡是过去和我们合作过，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都予以适当照顾，安排了工作，而不是过河拆桥。对李鼎铭、邓宝珊、高桂滋等等都安排了工作。后来，有人说什么西北局的工作右了，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我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彭老总、习仲勋同志担负的任务那么重，头绪那么多，但是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领导很注意互相团结，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有问题就摆在桌面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没有团团伙伙那类不正之风。我初到西北局时，担心人地生疏，不好工作；不久，这种担心就消失了。彭老总、习仲勋同志鼓励我们放手大胆工作，同志们处得也很融洽。彭老总比较严肃、内向，但从来不板起脸孔训人，他对人是非常赤诚的。习仲勋同志的担子最重，但他善于发挥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上给以支持、信任、帮助、提高，还关心干部的生活，所以，他很主动。每天晚饭后，还常常约我们到城墙上散步。

西北局的民主、团结、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至今不能忘怀。

(十七)

一九五二年底，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西北局，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科学院是建国初期成立的国家最高科研机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有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陶孟和等科学专家，还有陈伯达。

我到科学院以前，科学院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恽子强同志，副书记是丁瓚。中央调我去科学院，任命我为副院长，党组书记。恽子强主管理化方面的工作，丁瓚调心理研究所。我到职以后，习仲勋同志和胡乔木同志（当时习仲勋同志任中宣部长兼中央文委副主任，乔木同志任中宣部副部长，于光远同志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我多做调查研究，搞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把科学院整顿一下。为了便于以后的工作，又让我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学习他们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代表团团长是钱三强同志，秘书长是武衡同志，给我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代表团的成员选的都是些尖端技术的科学家，其中党员有刘大年、汪志华、何祚庥、宋应、张勃川、沈其震、曹言行、康瑛等人。这次访苏的任务是：（一）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三）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方针是以学习为主，以团结为重，客随主便。当时，通过朝鲜战争，中苏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中央嘱咐要慎重对待两国关系。

代表团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下旬动身的，三月五日

到达莫斯科。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秘书长托普切也夫以及许多的科学家到车站迎接。代表团访苏的时间，正赶上斯大林逝世，因此，代表团也几乎成了吊唁团，要参加各种吊唁活动，守灵，参加追悼会。在参加吊唁活动的同时，也为我们安排了参观活动。我们了解到苏联科学院有八个学部，分得很细，科学家们上下都是通过学部进行活动。联共党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科学院学术秘书处进行的，学术秘书处由十几个科学家组成，都是党员，在学术上至少是博士以上的专家。学术秘书处实际上是联共党领导科学的中介，通过这个秘书处把联共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同时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来。主席团会议讨论的问题、计划、措施等，都由学术秘书处首先提出，经讨论通过，然后付诸实施。当时苏联科学院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状况，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战线”，而提出的工作方针则是“全面安排，重点使用力量”。学部是学术行政领导机构，各个学部都设有学术秘书。他们这一套组织很科学，工作方法很灵活，对我们有参考价值，但我们并没有也无法照搬。

在座谈中，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简单粗暴，他们还列

举了若干列宁对待知识分子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后，许多科学家跑到外国去了，科技人才很缺乏。联共党就尽量争取团结留在国内的专家学者，尊重他们的习惯，为他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优越条件。如著名生理学家、条件反射论的创始人巴甫洛夫，政治上是联共党的反对派，科学院一连给他派了六个党员做助手，他坚决不要党代表，都被他撵了出来。列宁指示对巴甫洛夫还是要尊重，认真做团结工作。巴甫洛夫创立的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的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对苏联科学院因陋就简的精神印象很深。科学院院部就设在清朝李鸿章当年在俄国办外交的楼房里，好多科研人员没有办公室，写字台放在走廊里，非常俭朴，工作效率却很高。

苏联科学家对我们很友好，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很关心。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中国的农业有很大的优越性，有几千年历史，认真地总结一下，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应用，可以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

尽管苏联对我们很友好，但有些科研单位也不让我们参观。

我们在苏联参观访问三个多月，于五月底回到东北。为了综合各学科的参观记录，并在长春小住，由

刘大年同志和汪志华同志起草给中央的“访苏报告”，最后由武衡同志修改定稿，上报中央。在这期间，我们还顺便对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科研人员只许看俄文书刊，其他外文科技书刊都锁了起来，理由是其中有西方骂斯大林的文章，不准看，来了个因噎废食。我们到苏联参观，人家首先让我们看图书馆，介绍藏书多少，备有多少外文书籍期刊。书刊是重要的武器，一些最新的、尖端的东西都是首先在期刊上披露出来的。因此，苏联科学部门把这看成是科学水平的标志之一，而不搞闭关自守。我们才开始搞科学，经验不多，正需要很好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不看外国的科技书刊怎么行呢？后来又了解到，全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和扩大了情报研究所和图书馆，并且规定各种外文资料邮来以后，必须在一周内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的研究室，就是受到这一启发的结果。二是科研机构不宜轻易搬动。我在长春时，东北分院化学所和光机所的负责人向我诉苦，这两个所都是从上海搬来的，原来的基础很好，长春的条件也不错，但搬一次家，折腾了三年都恢复不了

正常的科研秩序，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当时，刮起一股搬迁风，外地的科研单位都想搬来北京。于是我们便作了一条规定，原有的科学单位能不搬的一律不搬，刹住了这股歪风。后来，科学院在兰州建立分院，吸取了东北的经验，就是先抓建设，盖房子，安装机器和水、电、煤气，等一切科研工作条件都就绪了以后，再从北京、上海等地调人来，不搞大搬家的做法，避免了由于搬迁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是张德生同志，他对我们的建院工作很支持，我们还请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第一任的院长。

(十八)

七月份回到北京，由我向乔木同志作了两次访苏汇报，之后，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交了书面报告。根据中央指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科学院党政领导核心密切协同，从进一步调查研究入手，着手科学院的整顿工作。首先采取组织措施，设立了学术秘书处，委托钱三强同志和武衡同志负责组建。选人的标准是：一、年轻能干的科学家。包括各个学科的人才，如柳大纲是搞化学的，张文佑是搞地质的，叶笃正正是搞气

象学的，叶渚沛是搞化学冶金的，还有贝时璋、钱伟长等，都是知名的科学家。二、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当时，在我们的科学家中党员甚少。整个秘书处有十几名科学家，党员也很少。事实证明，这些科学家都是很好的同志，后来绝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国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不久，又建立了各个学部的办事机构，恽子强任数理化学学部党员学术秘书，过兴先任生物地质学学部党员学术秘书，赵非克任技术科学学部党员学术秘书，潘梓年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党员学术秘书。院学术秘书处建立以后，首先抓了科学院各学科的调查摸底工作，他们经过各个学会，对各门学科进行了摸底，感到问题很严重。我国过去大都是些轻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化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力学也有一点基础，但是落后。重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半导体我们根本不知道，只知道锗是从烟囱里弄出来的，却不知道怎么用。电子学根本没有，高分子也很缺乏，搞植物学的人最多，但都是搞分类学的，连研究真菌的都没有。地质学方面有点基础，李四光同志抓得很紧，但是比起一五六项建设项目的要求，相差甚远。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地质资料都远远不能满足。总之，我们好多门学科没有，有些学科有点基础，也是少这缺那，很不

完全。这就是我们的家底，了解了这个家底，就心中有数了。这对以后制定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对于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摸底，对每一个人的学历、经历，有那些论文、著作和专长，都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绝大多数的人有真才实学。也有在理论上能行，实践上差劲的。还查出了极少数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这一查，心中又有数了。在实际工作中，就能作到区别对待，量才使用，扬长避短，实事求是。

对科学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刘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表示赞同。在会上，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一再强调了要做好团结科学家的工作。后来，中央又专门就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作了批示。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们首先召开了科学院党的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接着抓了科学院建院工作，和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会的工作。党组几经研究觉得最好把科学院建在中关村，靠近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那里地下水道、煤气管道都是现成的，建院比较方便。而且，搞一些学术活动，交流情况都很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科学中心。

北京市委也很慷慨，干脆把中关村，一直到西直门、大钟寺那么一大块地方都给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院址就是这样选定下来的。这时，科学院采取了一项措施，原有的科学单位尽可能地不搬家。当时毛主席提出要“超英赶美”，时间就是速度，所以先在全国设立三个分院：上海分院，包括南京科研单位；东北分院，包括长春、大连的科研单位；西北分院，几乎是平地起家建起来的。各地对分院的建立都给了很大的支持，保证了各分院的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

在建设科学院大楼的同时，还创建、扩建了中国科学院的情报研究所和图书馆。情报研究所所长是袁瀚青同志。他很热心此项工作，订购了很多资料，苏联的，英、美、法等世界各国的杂志期刊都订了。而且规定，收到邮件以后，要在一周内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研究室，工作效率很高，充分发挥了情报工作的资料作用。后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头脑有点发热，不讲科学，把情报所也冲掉了，甚至将已经继续招考了两年之久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也取消掉了。实践证明，这是做了一件大蠢事。

关于在科学院设立学部和学部委员会的工作，在设立学术秘书处时就开始了。由于对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进行了摸底，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

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如果把他选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学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全院设立了四个学部：物理数学化学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质学学部（包括医、农科），技术科学学部（包括工业应用、工程等，理工农医有关应用的部分都属于这个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学部机构成立以后，把名单一公布，科学界感到震动。科学界的重心就进一步倾向于科学院了。在这以前，许多科学家们

认为科学界的真正领导是科联，认为科学院是共产党办起来的，并不懂得科学；他们之所以不得不到科学院来，其目的是要钱，要人，要编制，要房子。个别人还以科联和科学院分庭抗礼。学部一成立，他们看到学部委员都是科学家，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名字，这一来他们觉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此后，中央又规定了一些照顾知识分子的办法，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三反”、“五反”中的某些错案也得到了纠正，影响很大。科联的活动越来越少，到了一九五七年，就取消了科联，成立了科协。在这以前，国务院为了加强对科学规划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后来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委，由聂荣臻同志挂帅，以政府的名义管理科学工作。从此，我国科学工作走上了正式轨道。

建立了学部，工作很得力，很方便，但是各学部中党员太少，真正懂得科学的党员只有几个人，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据当时统计，科学院本部总共只有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十一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没有党员副所长，因此建党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我向中央组织部要人。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需调到一五六项工程搞建设，党员干部很缺，调不来。于是在北京市找了一些半休养半工作的党员干

部；这些干部身体不大好，但是多少还懂得一点自然科学，党的领导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到科学院来可以起沟通党群关系的作用。例如，边雪峰同志就是那时候来的，后来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后又向陈毅同志要党员干部。陈毅同志对科学院的工作十分重视，他说你这一摊子比一个方面军还难搞，我给你从复转军人中找些干部吧，后来果然调来了一批。此外，我也学习在西北局团结使用党外人士的经验，直接依靠科学家，对他们信任、尊重、放手，鼓励他们主动地积极工作，这办法果然有效。

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召开学部成立大会之前，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回访我国，同时，也是应邀来参加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的。团长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冶金专家巴尔金。巴尔金的心脏病很严重，随时都可能死去。陈毅同志听了很紧张，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陪同巴尔金访问，要照顾好，不要叫他死在中国；二是抽一些人跟着他，向他学冶金技术。随同前往的有，冶金部副部长刘斌同志，科学院也抽了好几个人，其中有李四光的女儿李琳同志，东北金属研究所所长李薰同志，搞化冶学的叶渚沛同志等。那时，我们刚开始建设高炉，经常出毛病，不是结渣，就是出不了铁水。请巴尔金一看，很快就找出问题，炉口高了、低

了、大了、小了，照他的意见一改就好了。这里特别说说叶渚沛，他是福建人，曾留学南美，是冶金化学的多面手。他很注意冶金工业的综合利用，认为矿石都是综合体，除了炼铁，还应当把其他的东西也收了回来。解放初期，在冶金部工作，宣传他自己的观点，因和苏联的一位专家意见不一致，因而不受重用。吴玉章同志把他推荐到科学院工作。这次陪同巴尔金参观访问，收获很大。巴尔金曾经看过叶渚沛的学术论文，对他很尊重。巴尔金回国后，我对叶渚沛说，给你成立一个研究所，由你调人，他非常高兴。后来，他在石景山钢厂附近建了一个小高炉，定名为化工冶金研究所，这可有用武之地了。以后由于他的贡献突出，就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在参加攀枝花矾钛矿的建设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个很有贡献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说成是苏联特务，被迫害致死了，实在令人痛心。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局领导同志都坐在台下听科学家的发言，体现了党对科学和科技人员的尊重和重视，使到会的所有科学家深受鼓舞。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影响很大。会后，在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许多华人科学家都陆续回到祖国参加建设。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就是这时回来的。这批科学家回国，大大加强了我国的科技队伍，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对头，注意了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政策也比较稳定。看来，这是一条规律，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争取在十二年内各个主要学科方面赶上或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口号。

一九五六年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以及对我国科学现状的调查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出发，迅速制订一个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这就是后来制订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叫“十二年规划”。当时，我们的家底很薄，国际许多先进的尖端的东西我们没有，原来的一些东西发展也

不平衡。为了解决国家大规模建设事业的长远需要，在制定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时，我们遵循了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方针，既认真考虑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又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大体说来，科学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科学问题，而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关，主要应该解决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则根据其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理论问题，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搞这个远景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根据总路线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以任务带科学”。这个口号自然有一些局限性，比较侧重应用，这也是由当时实际情况决定的。后来为了吸取苏联制订远景规划的经验，还特别请来一位苏联总顾问拉扎连科。他本人就是搞技术科学的，他的专业为电火花加工，而且他自己曾经参加过制订苏联科学院长远规划的工作。他给了我们以十分有力的帮助。当时，给我和拉扎连科之间当翻译的是赵同同志。赵同同志在制订“我国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中是起过重大的作用的。但这个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完成，主要是科学院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后来实践证明，这个规划基本上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到了一九六六年，这个计划就大部完

成了，其中，不少项目都是提前完成的。由于这一计划实施的结果，使我国科学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许多学科，如半导体、电子学、原子反应堆等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科学院十二年长远规划制订过程中，我就病了，许多人都以为我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也觉得不行了。于是，我把过去保存的许多文件、资料作了处理。在病倒以前，我就曾经向分管科学工作的陈毅同志，以及安子文和张际春同志提出请求说：“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不能继续这项繁重的工作，调换一下工作吧。”陈毅同志说：“老马识途，继续干吧。”我说我是老牛破车，拉不动了，再干下去，要耽误工作。经我再三请求，中央才同意调我到国务院二办，由张劲夫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后来，中国科学界在科学院党组的领导下，提前完成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同时，在聂总的领导下，国防工业两弹一星上了天，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令人欢欣鼓舞。

在交接工作的过程中，我受到过周总理的批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苏联通过苏联顾问拉扎连

科告诉我，要在欧洲召开一个人文科学的学术会议，要求中国派人参加。我对拉扎连科说，如果台湾派人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就不派人参加。苏方答复说没有邀请台湾人参加。那时，我们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装有直通电话，联系很方便，苏方一天来几次电话催着要名单。这样，我就通知社会科学部拟了个以陈翰笙为团长的代表团名单，通过电话告诉了苏联科学院。实际上，当时周总理已经了解到台湾要派人参加这次会议。这样，我们再派人去参加会议就成了一个政治错误。为此，周总理曾当众批评我，指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细，事先又不向中央请示，这是错误的。这一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自己随后还向中央写了书面检查。

我的工作关系转到国务院二办以后，我就病倒了。经大夫诊断说我是疲劳症候群，又说我患有进行性的大脑动脉硬化，建议我到青岛疗养。从一九五六年夏天到一九五七年冬天，我在青岛疗养了一年半，病好了。等我回到二办时，林枫同志却因患心脏病休息了，二办的工作由张际春同志负责。我回去以后，因考虑到我的身体不好，就让我在二办分管卫生、体育工作。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关于我在国务院二办这一时期的工作，了解情况的人比较多，

钱信忠、徐运北、崔义田、李达、荣高棠、李梦华等同志都还健在，我就不细说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那就更是大同小异，尽人皆知，我就更加没有必要加以赘述了。

（束为、黄征整理）

编者注：张稼夫同志嘱我们代为说明，此系征求意见稿，望读者提出意见，他将进一步修改。

收复张家口之战

段 苏 权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我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经过浴血奋战，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华北军事重镇张家口。但多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此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外国书刊甚至有意歪曲事实，说张家口是苏联军队解放的，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我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直接指挥前线作战，亲历事件始末，洞悉事情的真相。现将此役的经过作一简要回顾。

势 在 必 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要篡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因此，收复张家口之战，既是我军对日伪军进行的一次收复失地的战斗，也是我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一场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紧接着于八月二十七日攻占了张家口。不久，汉奸于品卿和夏恭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分别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和伪“晋北自治政府”，并分任伪政府主席。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者又策划和指使于品卿、夏恭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在张家口拼凑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张家口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察哈尔、绥远地区蒙汉人民的中心。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战后，八路军一部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同年十一月成立了以聂荣臻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第四纵队为配合我党领导的冀东暴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深入到冀东、平北地区作战。一九三九年初，以肖克同志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经过艰苦斗争，在张家口以东、潮白河以西的平北山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建立了中共平北地委和军分区。到一九四三年，平北根据地已建立了七个联合县，抗日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我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经常在崇礼、张家

口、宣化地区打击敌人，配合地方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牵制了伪“蒙疆”、“满洲”及华北敌人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一九四四年，我抗日武装力量有了更大发展。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军区成立包括冀察军区在内的四个二级军区。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区党委书记兼政委刘道生）下辖平西、平北、察南和原北岳一分区四个军分区。张家口是平北军分区的重要作战地区。

一九四五年四月，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我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冀察军区部队于五月至七月间相继发动了察南战役和平北战役。五月十三日，察南军分区的部队攻克怀安，部分主力深入到万全、兴和、尚义一带活动。七月一日，我军攻克崇礼县城后，张家口周围的张北、崇礼、宣化、怀来等地区的广大乡村已基本为平北根据地所控制。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大大改变了战场形势。日军在我军沉重打击下，被迫收缩在张家口及平绥铁路沿线的重要据点里。至此，张家口实际上已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苏联已出兵我国东北，其右翼苏蒙联军一部正向张北方向推进。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八月十一日，即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一连发出三道命令，命令其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却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向敌伪收缴武器；命令日伪军“维持治安”，等待国民党政府派员前去受降。蒋介石又命令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由绥远东进，妄图抢占张家口，在长城一线建立封锁线，防止我军挺进东北。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向全党指出：“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并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同时，党中央作出了“分兵北进”的决策，一面命令绥远的我军阻止傅作义的部队东进，一面命令冀晋、平北和冀东三区的部队迅速分兵北进，与苏蒙联军配合作战。正在延安开会的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肖克副司令员、刘澜涛副政委立即打电报给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程子华和副参谋长耿飏，命令冀察军区的部队首先攻占张家口。自此，收复张家口的准备工作便紧张地开始了。

进军张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平北军分区的部队正在围攻赤城，军区转来聂（荣臻）、肖（克）、刘（澜涛）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对日宣战并出兵，可能直趋张家口，他们命令我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与此同时，冀察军区命令平北部队立即作好进攻张家口的准备。当时平北军分区有主力部队步兵第十团、第四十团和察蒙骑兵支队（内有两个步兵连）。接到聂、肖、刘的电报后，我们立即命令分散在各地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政权的察蒙骑兵支队集结，同时停止了对赤城的围攻。部队在雕鹗堡（赤城县南）、三岔口（龙关县东）一线集结后，立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是补充新兵和武器弹药（部队首次装备了重机枪和迫击炮），同时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和担架队，并对所有人员进行了政治动员和入城教育。部队情绪十分高涨，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接着，根据上级指示，在县支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编第四团和新编第六团两个步兵团。

八月十四日，察蒙骑兵支队集结了三个骑兵连和

两个步兵连，分别从崇礼县的狮子沟和张北县的脑包图出发，到张北至德化（今化德）方向接应苏蒙联军。

八月十五日上午八时，我们收到冀察军区首长的电报，命令詹大南（平北军分区司令员）和我率领平北军分区主力攻占张家口，钟辉琨（分区副司令员）和陆平（平北地委副书记）指挥各县支队围迫各县城，令敌伪投降。不久又收到冀察军区的电报，命令钟辉琨率领新编第六团在宣化至南口之间破坏铁路，以便断敌退路，迅速迫敌投降。后来，军区又派参谋长易耀彩指挥察南军分区的部队，协助平北部队进攻张家口，但一直没有同我们取得联系。

出发前，我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是争取和平受降；二是如果敌人拒绝投降，我们就以武力收复张家口。根据军区的命令，詹大南和我率领第十团（团长李荣顺、政委吴迪）、第四十团（团长杨森、政委刘国辅）、分区教导大队和直属分队立即向张家口进发。平北地区专员、张家口市第一任人民市长张孟旭，率领专署机关随军前往。部队行军速度很快，当晚就赶到张家口以东十五公里的青边口。先头部队进至距张家口十公里的羊房堡。我们一面派出侦察分队了解情况，一面进行战前准备。

八月十六日，日军司令部派出的两名骑兵，打着白旗寻找我军，联系投降事宜。我们把朱德总司令要日军投降的命令交他们带回。十七日，我方派出两名代表前往日军司令部谈判。日方表示，同意我方提出的受降条件，但要请示北平司令官后才能办理投降事宜。第二天我们再去催促时，日方却说，已接到冈村宁次的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不准向八路军投降。我方代表据理驳斥，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根据上级通报，日军有可能继续抵抗，伺机撤退；傅作义的先头部队正在向张家口方向开进；活动在兴和、尚义、张北一带的国民党土匪武装，也准备配合傅作义的东进部队抢占张家口；驻张家口的伪军也同傅作义取得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武力去收复了。

十六日晚，察蒙骑兵支队副支队长吴广义，副政委肖泽泉、柴树林打来电报说，他们于十五日在张北遇到了苏蒙联军。苏军对他们有怀疑，并索要联络手续。我们将此情况报告了晋察冀军区。军区很快转来中央的电示，要我们派领导同志前去与苏军联系。十七日晚，詹大南同志和平北地委常委张克宇即带电台和一个连星夜赶往张北。直到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发给他们祝贺电后，才消除了

苏军的疑虑。

十九日，詹大南同志来电报说，苏军计划于二十日进攻张家口，要求我军从东南两面配合进攻。同时要求我军破坏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以防止敌人逃跑。当晚我召集了团、队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敌情，研究确定了战斗部署。

激 战 山 城

八月二十日拂晓，我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启刚，率领各团、队指挥员来到张家口以东一一七七高地察看地形。张家口北傍长城，南接平川，北、东、西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清水河由北向南把市区分为东西两部分。河西为居民区，伪政府机关及敌军司令部都在河西；河东有火车站、油脂公司和部分商店及民房。日本驻“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大使馆和部分后勤仓库设在东山坡下。当时，张家口地区驻有日军第二独立混成旅团和刚从上海调来的第一一八师团，共一万多人。还有伪警察约三千人。日军主力大部集中在张家口西北三十公里的大、小狼窝沟及春垦一带筑垒地区，以防御苏军的进攻。张家口没有城墙，只有一般防御设施，守城任务主要由伪军担任，这对我军进攻较为

有利。根据地形和敌人的设防情况，我们进行了具体的战斗部署。为了切断敌人退路，派第十团一个连攻占榆林飞机场和十三里敌军营房。

二十日清晨六时左右，部队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第四十团很快攻下了东山坡南山敌人碉堡，占领了有利地形。然后居高临下，冲下山去。八时左右，占领了日本大使馆。部队冲进使馆时，使馆人员已经跑光了。第四十团指挥所便设在这里。军分区指挥所也进到东山坡。教导大队作为预备队，并担任北侧警戒。部队继续向清水河大桥方向攻击。随后，第十团一部打进日军荒井部队（后勤警卫部队）营房，消灭了部分敌人。该团主力进至火车站附近，经过反复争夺，占领了车站及其周围建筑物。至下午三时，清水河以东地区全部被我军占领。第十团的第二连按计划攻占了十三里营房和飞机场。这一天，我军进展比较顺利。部队坚守在清水河以东一线，等待苏蒙军的消息。直到天黑仍无动静。于是，我令部队撤至人头山、羊房堡一线待命。当晚打电报向詹大南同志通报战况时问及苏蒙军情况，得悉苏军一直拒绝我方人员与其同行，无法及时了解苏军意图。直到二十一日晚，詹才发来电报说，苏军在狼窝沟进攻受阻；并说苏蒙联军二十二日仍按原部署进攻张家口，要求我军按原计

划行动。

二十一日，防守狼窝沟的日军开始撤退。十五时左右，其先头部队到达人头山以西的甲官坪村，受到我第十团的阻击。战至天黑，敌人丢下一批重装备绕道南逃。这一天，钟辉琨同志指挥新编第六团和延庆县支队攻占了康庄，破坏了怀来到康庄的铁路和公路大桥，截断了敌人退路。接着，察南军分区的察北支队解放了尚义县城。

二十二日上午，我军再次向张家口发起进攻，部队很快占领了清水河以东地区。侦察分队越过清水河，进入河西市区。

上午十一时左右，从大同方向撤下来的大批日军乘火车到达张家口。敌人以铁甲车开道，企图通过张家口火车站向北平撤退。当他们发现火车站已被我军占领时，就在车站以西与我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我第十团在第四十团一部支援下，凭借有利地形和建筑物，进行顽强阻击。敌人反复冲锋十多次，一直被我军阻于车站以西，不能前进。此后，日军把大炮和重机枪架在敞车上向我军射击，掩护步兵冲锋，对我军的威胁较大。为了避免过大的牺牲，我命令部队稍向后撤，敌人乘机夺路南逃。

下午三时许，防守狼窝沟的日军主力退入张家口，

沿着清水河东岸向火车站败退，在油脂公司附近，我第四十团在第十团的掩护下进行顽强阻击，战斗到黄昏，双方伤亡都很大。我军整整打了一天，没有得到苏蒙联军的消息。于是我命令部队撤至人头山一带监视敌人。我军撤出战斗后，大批日军分多路急速向北平方向撤走。夜里，日军的后卫部队一路经过人头山西侧山地时，遭到我第十团的阻击，敌人丢下几门山炮和部分马匹，仓皇退走。

同日，战斗在铁路沿线的新编第六团攻占了怀来火车站；龙宣怀支队和著名民兵英雄何金海带领的游击队攻占了下花园发电厂和沙城；分区副政委吴涛指挥新编第四团在沙河镇北伏击南口至北平日军，缴获卡车两辆；崇礼县支队再度收复了崇礼县城；赤源游击队和民兵收复了宝源县；察蒙骑兵支队一部收复了康保县。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

二十三日拂晓，张家口市内的最后一批日本人集中到火车站附近加紧撤退。我侦察分队随即进入市区。接着第四十团从东山坡北侧进入市区，并于十二时左右包围了德王府。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龟缩在德王府里的伪军政头目及七百多名伪军警全部交械投降。我第十团一部进攻火车站，另一部越过清水河大桥攻入市区，同伪军展开巷战，俘虏了一批伪军和日

军，一百多名伪军向万全逃跑，该团乘胜追击，收复了万全。与此同时，从张家口以南二十三公里的西庄子赶来的察南军分区第二十团两个连攻占了西山坡，该团主力随后进入市区。下午三时左右，市内战斗结束。天黑，冀察区党委和军区的部分领导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和新华支社记者团从张家口南三十公里的吕家庄赶到张家口。事先已组成的市党、政、军机关人员在部队协助下，连夜维持治安，查封仓库，接管银行、电台、报社等，使全市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

这次作战，我军共毙伤俘伪军警二千余人、日军二百多名；缴获步枪及轻重机枪一万多支（挺），子弹五百万发，大炮五十余门，炮弹八万多发，军马数千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活捉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和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八月二十四日中午，苏军派库兹尼卓夫上校乘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我军表示祝贺。交谈中，库兹尼卓夫说，他们上级有规定，部队不能越过外长城。二十五日，晋察冀军区首长通电嘉奖收复张家口的参战部队指战员。同日，被我们接管的张家口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八年之久的张家口，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后 事 之 师

一、我军收复张家口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张家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张家口地区既是我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通往东北的走廊，也是傅作义东进的必由之路。美蒋反动派对此觊觎已久。一九四四年春，李宗仁曾建议蒋介石“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一九四五年雅尔塔会议后，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派傅作义由五原东进建立所谓“绥察热防共隔绝地带”。我党中央高瞻远瞩，早已在这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党中央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分兵北进”和“首先攻占张家口”的正确决策，从而打破了蒋介石及傅作义的战略计划。攻克张家口以后，我军乘胜收复了周围十多座县城，为巩固扩大解放区和后来粉碎国民党向我解放区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家口是日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基地，他们在此屯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我军进城后，仅接收的各种军用物资仓库就有六十余处。这批物资不仅

装备了晋察冀的部队，还支援了其他解放区。

我军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攻克伪蒙疆政权“首府”，这一重大胜利对全国军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了我党我军的力量，同时也给了妄图独霸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头一棒。国民党军队统帅部得悉我军攻占张家口的消息时，非常恼火。他们很快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名义向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了“备忘录”，指责日军“应负其责”，并要求冈村宁次“转令张家口附近的日军迅速恢复该地原来状态，并负责维持该地区秩序，直至傅长官作义前来正式接收为止”。

二、我军取得这一重大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命运，这为我军收复张家口创造了客观条件。其次，冀察根据地军民经过近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我军曾在张家口周围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和一支经过战争锻炼的部队。日本投降时，平北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已发展到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支队。此外，各县都有三至五百人组成的县、区游击队。他们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具有同日军正面作战并能整营地消灭伪满洲军、拔除据点、解放县城的能力。这是我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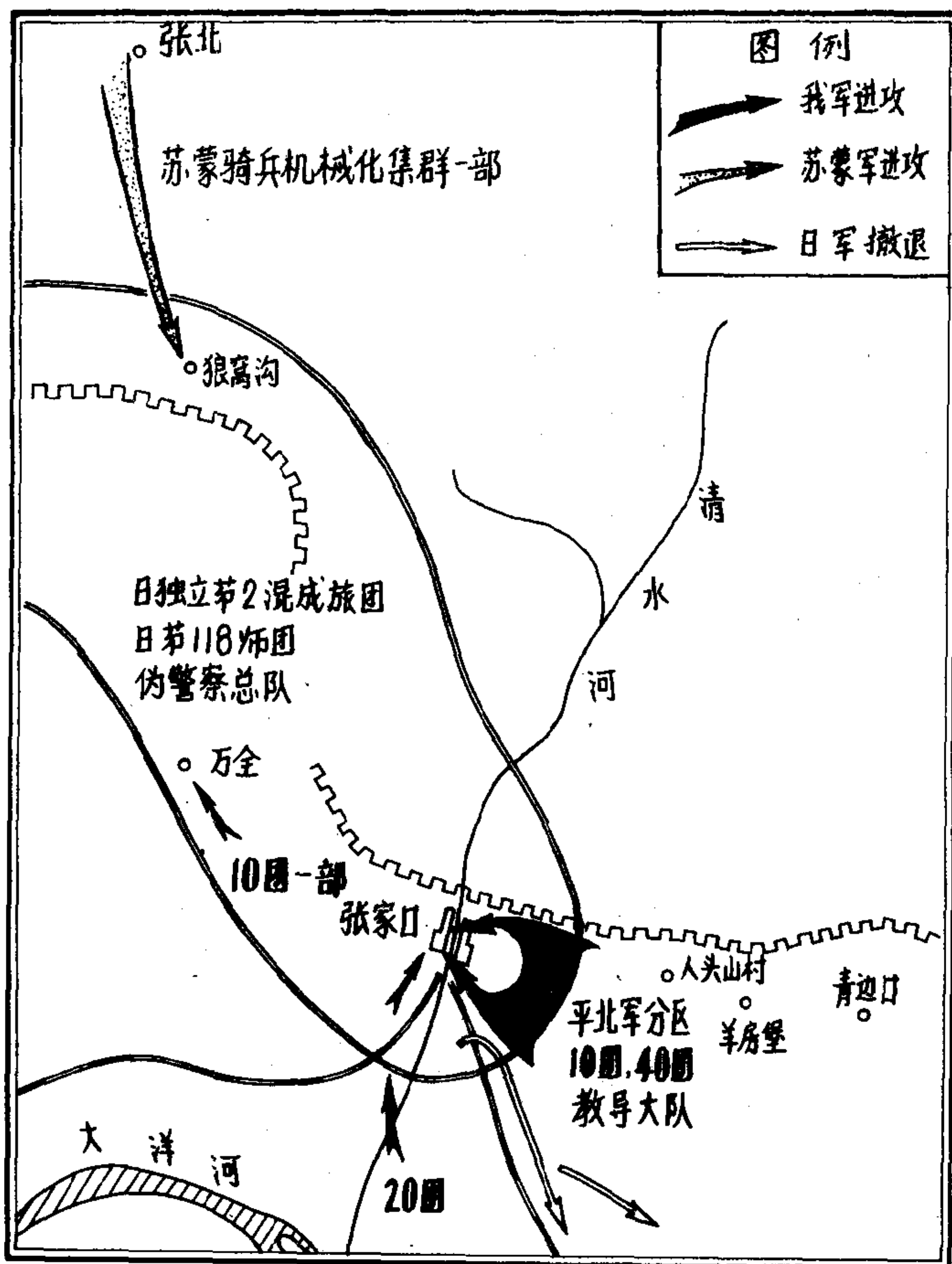
收复张家口的力量所在。第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起了加速日本投降的作用；其右翼苏蒙联军一部进攻狼窝沟，对我军收复张家口也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第四是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在收复张家口的战斗中，晋冀军区部队攻占了兴和，并活动于丰镇、集宁线；冀察军区主力向北平挺进；冀热辽军区部队向热河挺进，这些都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特别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风云变幻、敌我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及时准确地判断形势，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我军取得这一重大胜利的关键。当时，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正确部署，及时指示，我们就有可能坐失收复张家口的良机。

综上所述，可以说，张家口是在苏军能去而没有去，蒋军想去而去不了，日军想等而等不得，伪军想守而守不住的情况下，被我军用武力收复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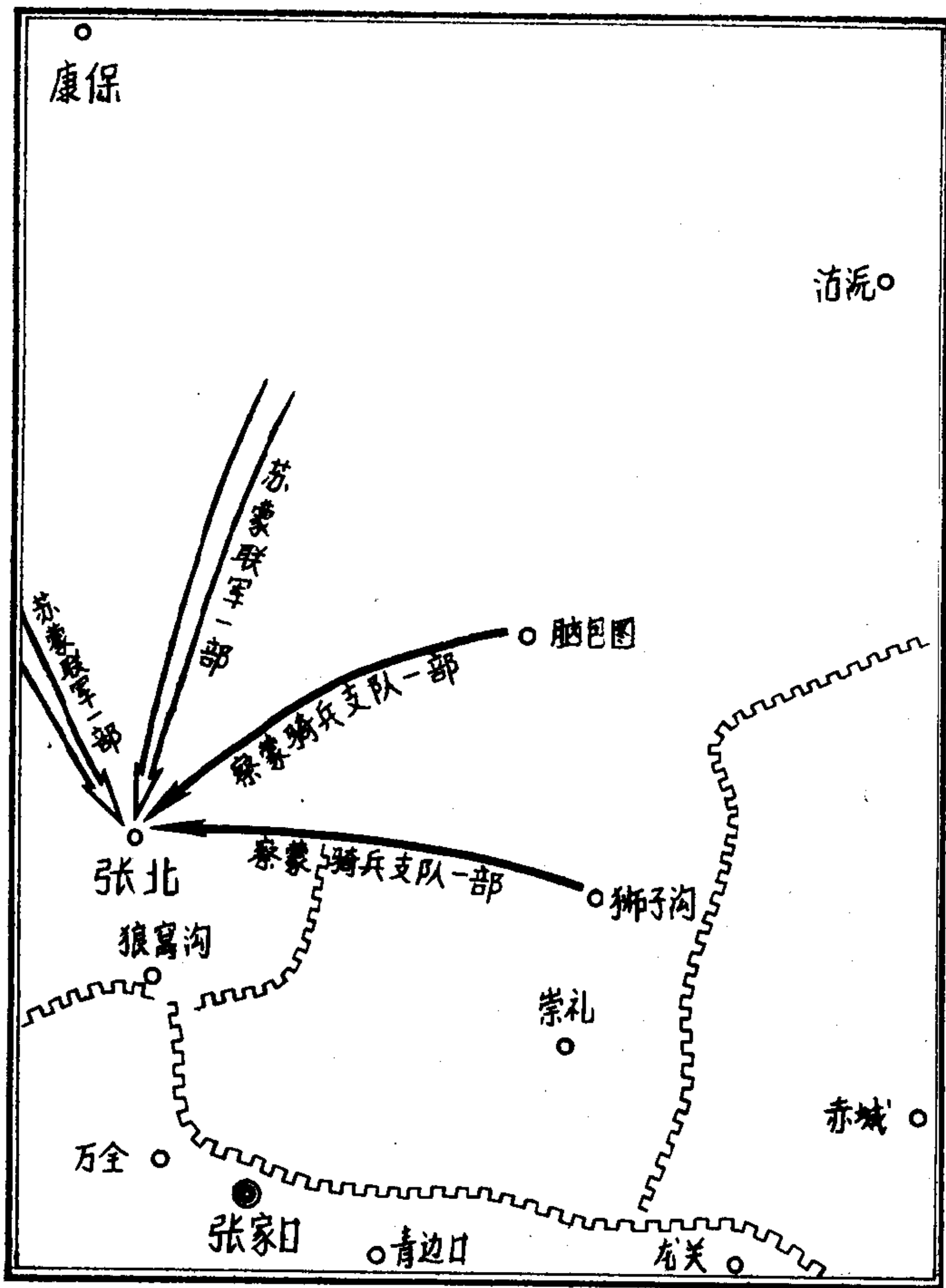
我军收复张家口之战已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

我军收复张家口之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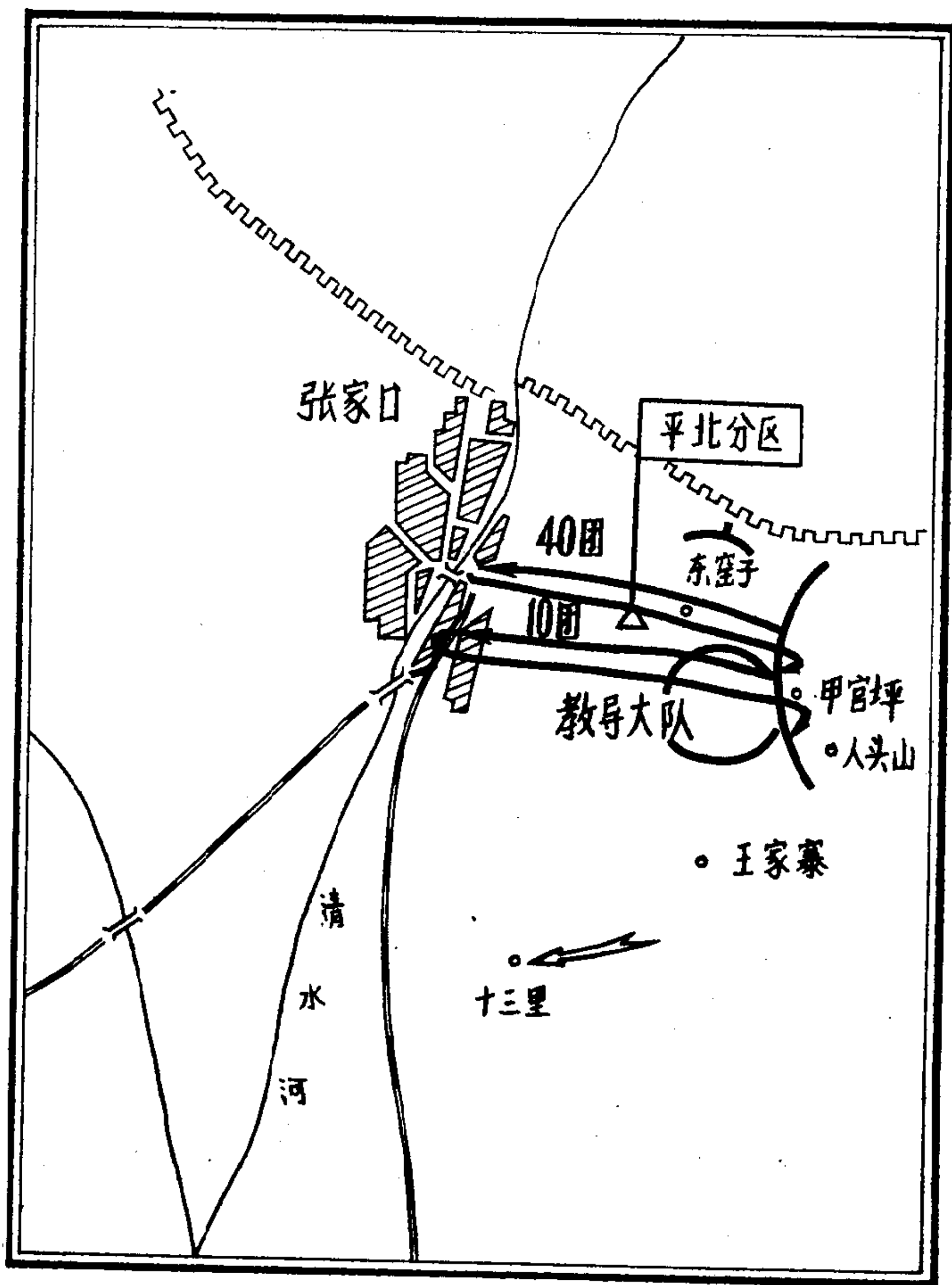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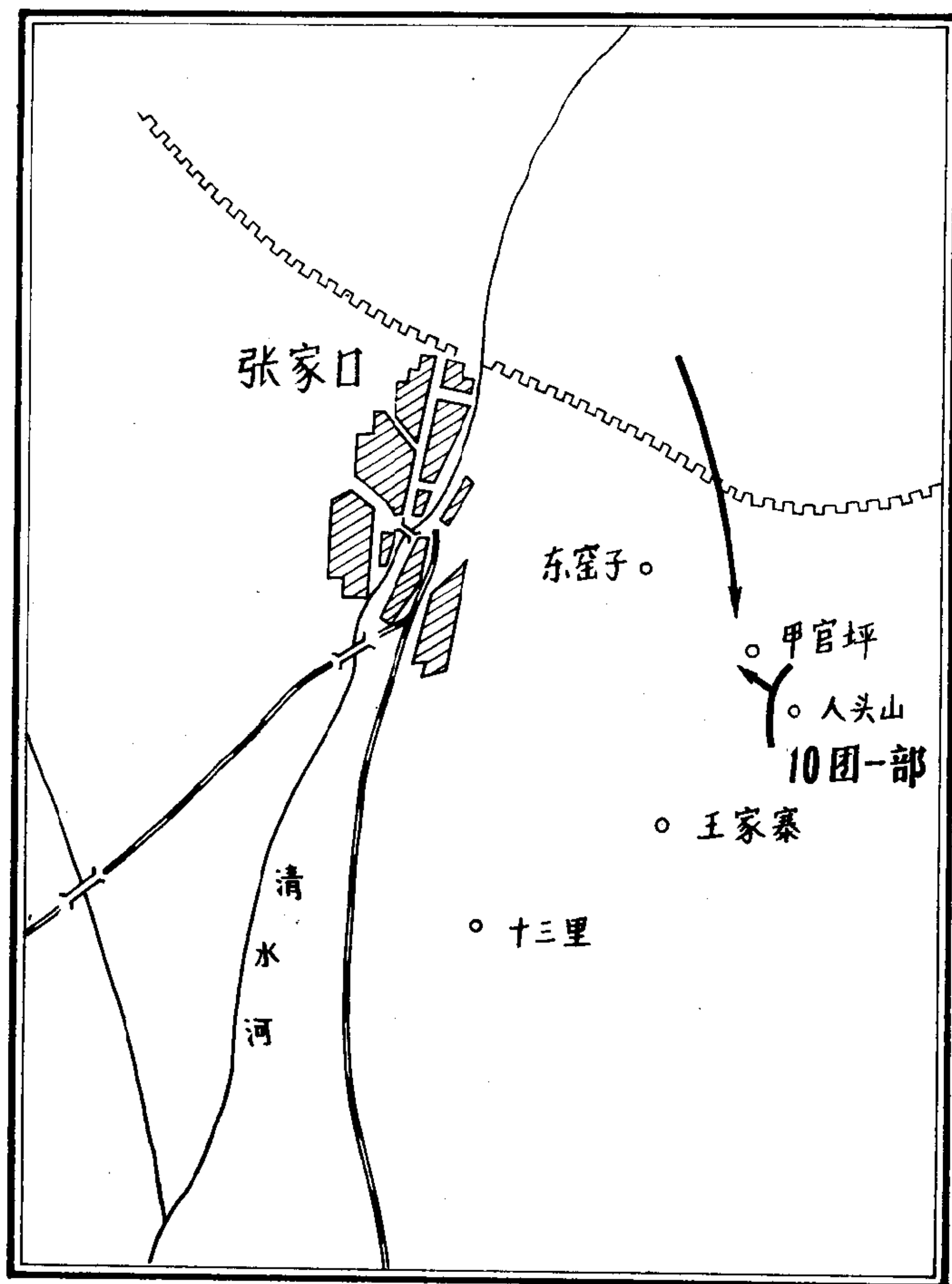
八月十五日察蒙骑兵支队与苏蒙联军会合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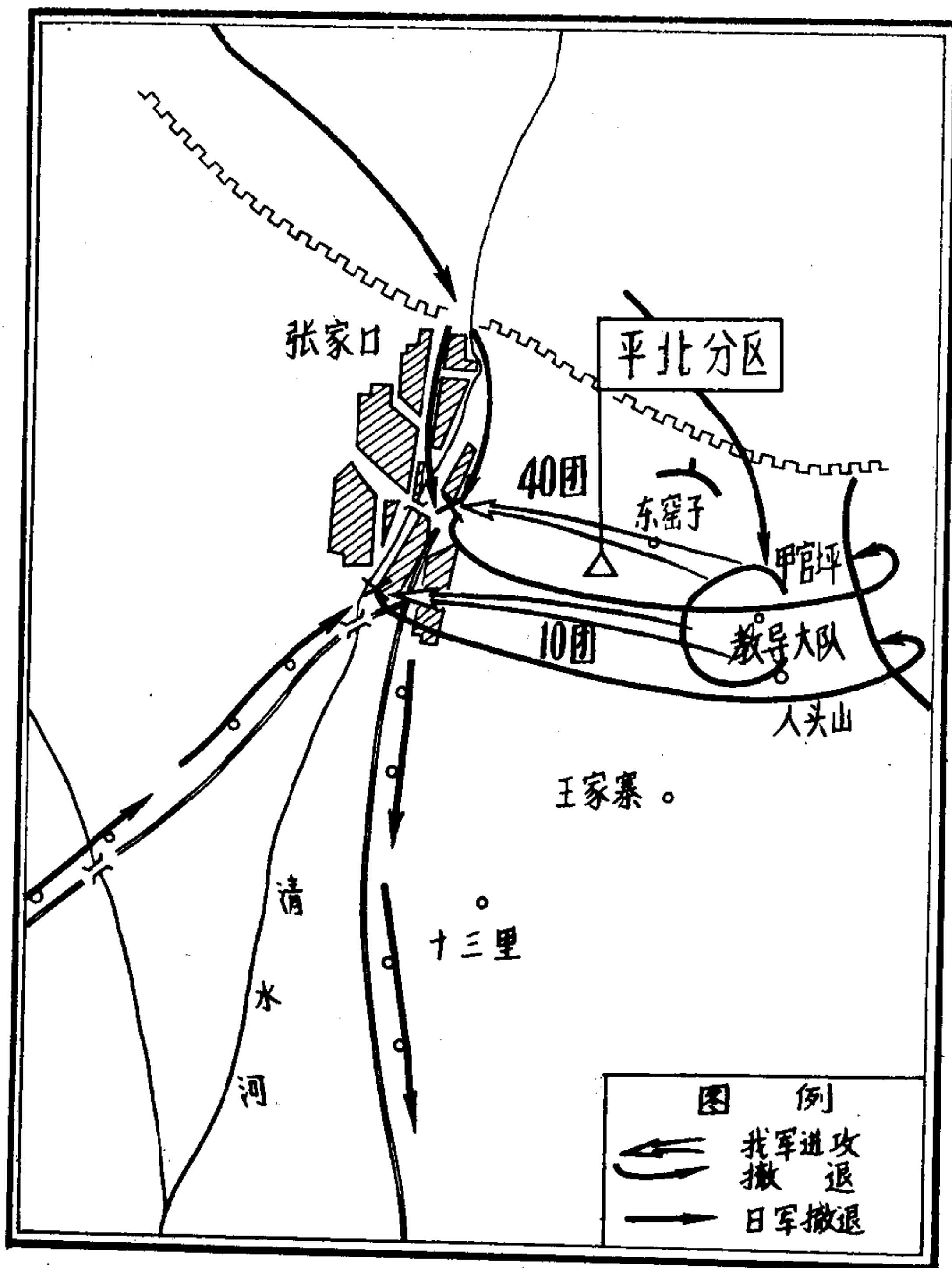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日战斗进展情况



八月二十一日战斗进展情况



八月二十二日战斗进展情况



延安整风运动大事记

贺 晋 清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从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但是,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整风学习,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到一九四三年十月,即通常所说的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大体上分为三大阶段:

(一) 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阶段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九四二年二月)

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党的历史上的几次严重错误中,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五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界限,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求得一致的认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正式开始以前，党中央用一年多时间，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党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出了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特别强调了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随即成立了领导全党干部进行学习的机构，为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普遍整风阶段（一九四二年二月——一九四三年十月）

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八日先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阶段转入普遍整风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党的各级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通过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全面的学习和检查，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矛盾。

（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一九四三年十月——一九四五年四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党干部思想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这次整风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从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在批判主观主义的基础上，指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准确地击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整风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反对主观主义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应该同时进行。毛泽东同志说：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

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为此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整风运动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散布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余毒的工具。毛泽东揭示了党八股的历史渊源，历数了党八股的罪状，阐明了党八股的危害，提出了克服党八股的方法。

这三项内容说明了延安整风运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全党按照这三项内容进行整顿，重点突出，方向明确。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践中还创造了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学习方法。这是进行思想革命的好方法。通过这样的学习、反省、总结，提高了党员和干部的革命自觉性，保证了整风任务的胜利完成。

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步学会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和解决

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从思想上建党找到了一个最好形式，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九三八年

九月二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开幕，十一月六日闭幕。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报告中号召，全党从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

二月十七日 为执行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洛甫为部长，罗迈为副部长，领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

五月三十日 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指出共产党员应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执行决议，做群众的模范，努力学习。这一著作后来被规定为整风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之一。

八月七日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全文于十二日讲完。这一著作后来也被规定为整风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之一。

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党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十月四日 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

党”的任务。

一九四〇年

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学习的课程应按照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进行安排。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地位上来。

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出“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

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中央一月三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作了补充规定。并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

一九四一年

三月十七日 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第

二个序言。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给党的干部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以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毛泽东在这篇序言里，对于调查研究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并进一步阐明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这篇序言也是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

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

七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已经成为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样，就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因此，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了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这一决定也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七月二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

党内斗争》的讲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条件，论证了党内斗争的实质，着重批判了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机械过火偏向。这一著作，是延安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八月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系统地周密地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这一决定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九月二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阐明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这一号召的伟大意义。

九月十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会议。这

次会议还肯定了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后，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个党的高级干部继续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

九月十六日 胡乔木发表《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指出：“一个新的战争正在开头——这个战争是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同时进行的，它的意义比那个战争也至少是不相上下。这是思想上两个基本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败将要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

九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甲）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成员。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乙）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到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为目的。（丙）延安及外地重要地

方，均建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

十月十一日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高级学习组成立。报社出版《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学习文件。学习组成立以后，为了领导党员和干部的学习，周恩来曾多次作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

十一月六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发表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他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这篇演说，第一次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版，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过去干部教育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

与教条主义的毛病。”为了彻底克服这些缺点，决定强调了干部教育中必须贯彻理论和实际、所学和所用一致的基本原则，使学生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和指导实践。”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决定规定了各项具体的措施。中央这一决定第一次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版，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十二月《六大以来》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书是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是整风运动准备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文件。

年底 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中央党校计划》，改进党校工作。中央党校根据中央的计划和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行了彻底改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课程重新编排，入校学员是地委以上和军队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和军队政治工作干部。教育内容贯彻理论和实践、所学所用一致的原则。

一九四二年

一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指示要求：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连长一级，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留守兵团政治部接到这一指示后，于四月六日向各兵团发出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因此，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今后还要把这个决议当作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或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与灵活地应用这个决议。

二月一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议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毛泽东在演说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为整风运动的宗旨。在毛泽东号召下，全党很快掀起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

二月八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要求全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最后残余加以彻底肃清，以便使党的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毛泽东在演说里，特别指出了党八股的罪恶，宣布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

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新决定》。决定对党校组织作了调整，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负责进行政治上的指导，由任弼时负责进行组织指导，由邓发、彭真等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日常工作，取消了原有的党校管理委员会。

三月八日 毛泽东为“三八”国际妇女节题词：“深入实际，不尚空谈”。

三月十三日 王实味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反党文章《野百合花》。

三月十四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里跳出来》。社论批判了某些共产党员孤立主义的错误，强调了应广泛地和党外人士合作。社论指出，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

三月十六日 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在全院进行工作大检查。会议决定成立检查委员会来领导和计划检查工作。二十日，研究院开始学风、党风、文风的大检查。

同日 罗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指出，要实行干部教育上的革命，主要的就是要肃清教条主义，而要肃清它，就首先要揭露它和批评它。否则，无论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真正彻底的转变是困难的。

三月十九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发扬民主作风》。社论批判了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指出，必须树立健全的作风，即虚怀若谷，善于同非党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和衷共济，倾听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共同磋商问题、共同决定问题的作风。

三月二十七日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新华社华北分社开展整风学习。

三月二十八日 行政学院副院长王浚波向该院全体学工人员传达整风问题，号召全体同志本着整风精神，检查全院工作。

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指出在整风中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三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和博古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党内外的负责人和作家开座谈会，座谈《解放日报》改版的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常常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他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四月二日 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在院《整风》壁报上著文，号召大家大胆发言，认真检讨。他给院党总支委员会写信，提出检查工作的方针是：“检查领

导，检查整个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却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批评不是打击，要有原则，要有事实，热骂可以，但不许冷嘲和暗箭伤人。”“少抓小问题，只抓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思想有无大的倾向，其余一切都应环绕在大问题的周围。”

四月三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要深入研究讨论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决定还指出，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这个决定发布以后，各单位根据决定的精神，对整风运动作了检查，促进了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整风运动进入整顿学风阶段。

四月四日 八路军三五九旅政治部召开部务会议，讨论进行整顿三风和业务学习的各项具体办法。

四月五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社论指出，进行整顿三风有两种

方法：一种是正确的方法；一种是不正确的方法，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方法。用正确的方法来整顿三风，三风必正，用不正确的方法整顿三风，不仅不能整顿三风，相反地，会做三股阴风的俘虏。还指出整顿三风是我们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致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的。

四月上旬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检查委员会，拟定研究整风文件的步骤。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习总委员会决定总的学习计划以后，检查委员会改组成为学习委员会。阅读文件采取总、分、合的方法，即先粗读两遍，了解全篇大意，然后逐段逐句精读，研究各段中心内容，最后研究全篇精神，反省自己，作出笔记。

四月六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自我批评从何着手》。社论指出，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为了在事实上行动上克服这些文件中所指出的缺点，应当根据这些文件精神进行自我批评，并实行有效的改正。

四月七日 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对中共中央整顿三风的文件进行初步讨论。讨论办法是先研究毛泽东的报告，再联系到个人进行检查，加以整理后进行

总结。

四月八日 延安大学整风检查委员会成立。检查委员会决定从四月二十日到六月三十日，为研究中央宣传部指定的学习文件的时间，确定了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的负责人。二十一日，召开全校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全校非党学员，也都热烈地参加了学习。

四月十日 延安《解放日报》出版《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第一辑。《特辑》共出版六期，至四月二十日停止。内容是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这些文件，以后都编入了《整风文献》一书中。

四月十一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内民主问题》。社论指出，整风必须在正确地发扬党内民主基础上进行。

同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对于执行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拟出了具体办法。拟按党和群众团体、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边区政府系统组织三个检查委员会。检查委员会不仅领导检查而且领导学习。

四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由康生、李富春领导，并有柯庆施、王首道、李六如、王鹤寿、李克农、方强、邓洁、汪金祥、曹

轶欧、曾固、徐以新、方仲如、冯文彬、傅连璋、王若飞、胡乔木、郑汶、陈伯达、蔡畅、王林、吴敏等二十一人参加。并推举康生、李富春、曾固、徐以新、曹轶欧五人为常委。十六日，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拟定具体学习计划，报中央书记处批准后公布。学习计划规定三个月完成。

四月十四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把“矢”拿稳把“的”认清》，指出只有正确的认识“矢”与“的”，才能在整风中走上正路。

同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分区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成立三个学习委员会，规定：

（一）党和民众团体系统学习委员会，由陈正人总负责，杨清任秘书，张邦英、李卓然、贾拓夫、杨清、高长久、高朗山、白茜等参加领导。（二）政府系统的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高自立、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领导。（三）留守处保安司令部系统的学习委员会由肖劲光总负责，莫文骅任秘书，王震、王世泰、莫文骅、曹季坤、吕振球等参加领导。

四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一）增加下列四个文件，作为在延安讨论整顿三风的材料：

《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四月十八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讨论整顿三风的具体化》。社论指出，真正领会中央所指定的文件的精神和实质，以中央文件为“矢”，以我们的实际工作为“的”，来研究哪一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样，才能使整风运动在各方面充实和具体化。

同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在八路军大礼堂联合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到会各机关干部两千余人。王稼祥、康生出席了会议。王稼祥对时局作了分析，指出，我们正处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大家应好好研究中央文件，改造工作作风，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

四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通过中直系统四个月研究整风文件的计划。计划规定从四月二十日起，阅读全部文件，为粗读阶段。五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为精读阶段。计划共分四大部分：

（一）整顿学风问题（反对主观主义）；（二）整顿党风问题（反对宗派主义）；（三）整顿文风问题（反对党八股）；（四）综合研究。九月二十一日到九月三十

日考试和总结学习经验。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处工作人员大会，动员整风学习。会上由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王首道报告，说明整风学习的目的，并向同志们提出要求：（一）要下最大的决心，专心学习，坚持到底。（二）在思想上下苦功夫，多用脑子，精研细读，深思熟虑。（三）要虚心学习，善于提出问题，勇于争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四）自觉地遵守学习纪律和学习制度等。

同日 陕甘宁边区各机关的干部，开始阅读中央宣传部所指定的整风文件。党、政、军三个学习委员会和机关的学习委员会也开始工作。二十一日，在延安参议会大礼堂举行边区干部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任弼时向到会的两千多干部作了报告。报告强调指出学好整风文件的重要性。会上，谢觉哉也作了发言，说明在学习中一定要有决心，有领导，有民主。特别表示欢迎非党同志参加学习。

四月二十一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始研究中央宣传部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所有党外艺术工作者也都自愿参加了学习。

四月二十二日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出版。本书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

义、反对党八股的号召之下编纂起来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们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为了说明本书编纂的动机及其精神，编辑委员会把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作为代序。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干部作《领导与检查》的报告。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王稼祥、陈云负责。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军委直属部门以内按军事、政治、后勤三个系统分别成立学习分委员会，领导整风学习和检查。

同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召集科长以上的部务会议，根据西北局关于研究中央宣传部指定的整风文件的指示，决定：全体工作人员分成高、中、低三级，高、中两级着重自己阅读和研究，低级采取上课教育的方式。为了使学习更深入，便于讨论问题，学习小组规定三人到五人，新老干部混合编组，以便互相学习，增强团结。

同日 军委后勤部学习委员会成立，由叶季壮、胡耀邦、邓飞等九人组成。上午，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后勤部学习委员会之下设供给部、经建部、卫

生部、工业局、后勤直属机关等五个学习委员会。

四月二十五日 一二九师政治部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全师整风大检查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师检查委员会，由邓小平、刘伯承、李达、蔡树藩、黄镇、朱光、张南生等九人组成，以邓小平为主任，朱光为副主任。各旅各军分区分别组织检查委员会，以七人至九人组成。委员会负责推动、领导、检查工作。

四月二十七日 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为了了解各单位的学习情况，总结学习经验和发现学习中的问题，决定组织巡视团，由西北局所属单位的同志七人组成，分别到各单位巡视，除谈话询问以外，还参加讨论会。

四月三十日 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召开会议。任弼时出席指导。

同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中央直属系统整风学习总委员会徐以新指导下，成立了整风学习分会，由郑汶、刘白羽、黑丁等人组成，并通过学习计划、检查制度和学习纪律。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党校对于研究整风文件的计划作出补充决定：第一步（第一周）精读和研究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第二步（第二周到第三周）正科和预科甲乙各班，把整风学习文件全部浏览一遍，

以概括了解文件的大意（预科丙班以下先读五个文件）。第三步（第四周到第十一周），把所有的文件分类逐件精读，逐件作笔记，深入地研究讨论，并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和工作。第四步（第十五周到第十六周）进行检查工作和自我检讨，并作出本期的学习总结。

同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发出关于研究讨论整风文件的通知。通知指出：（一）四月三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风报告的决定，一般也适用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因此，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应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决定，按照各地具体情形，规定具体阅读和讨论的计划。（二）华北敌后是处在战争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阅读和讨论的时间，应比延安长一些，讨论整风文件的时间为五个月，平原地区还可延长一个月到两个月。（三）研究和讨论整风文件，一定要注意下列要点：第一，不要妨碍工作，不应脱离实际工作去谈这些文件；第二，必须转变以往粗枝大叶，不认真阅读文件的态度，反对空喊整风而不去研究问题的现象，等等。

同日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为了响应中共中央所号召的整风运动，特通令全军各单位，召开各种干部会议，由负责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根据传达

进行讨论和检查，可以酌量停操、停课，减少工作，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检查的范围普遍包括学风、党风、文风。但是，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特别侧重反对排内性和排外性的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为了深入检查工作，还规定支部扩大民主生活，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并召开党外人士的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

同日 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顿三风的补充指示》。指示指出：全军在整顿三风运动中应进行深入的动员，掀起整顿三风与干部学习的热潮。必须精细阅读与深入讨论中宣部规定的二十二种文件。还指出，在整顿三风运动中，不应妨害工作，不应脱离实际工作，去空谈文件。各兵团政治机关，须将执行此指示的情形及总结材料，随时汇报。

五月二日 由毛泽东主持召集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开了第一次会，同月二十三日开了第三次会，毛泽东在这两次会上发表题为《引言》和《结论》的两次讲话。这两篇讲话，扫除了关于文艺问题上的许多错误和混乱，开辟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新的历史时期。

五月三日 军委直属政治部作出《军委直属队在整风期间党的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最近的三

个月内，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推动和保证研究整风文件当作中心的任务。

五月五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社论批判了对于整风工作和对于研究整风文件消极、忽视或抵制的各色各样的错误态度。强调指出：三风一定要整，整风文件一定要精读，否则党的思想行动不可能统一，革命事业不会获得胜利。

五月八日 三五九旅学习委员会成立。各团和独立营成立学习分会。

五月十三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朱德领导的军委秘书厅高级学习小组，学习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等文件时，联系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胡耀邦参加总政治部组织部整风学习小组两次座谈会以后说，要把二十二个文件真正领会贯通，需要三个条件：首先，对二十二个文件有透彻了解；其次，除学习好二十二个文件外，还需要有更丰富的理论知识；第三，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五月十四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彭真写的代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指出它们的

精神与实质就是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和贯通这些文件中的精神和实质的标准就是实践。代论对文件中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了透彻的说明。

五月十五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举行第一期七个文件的总讨论会。中心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争论很热烈。

五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军委系统学风学习开始。

五月二十三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反省自己》。社论指出：从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发布以后，一个月来的学习已经有了宝贵的收获，但是有许多同志在学习文件中反省自己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而反省自己正是掌握文件精神 and 实质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认真的反省，切实的实行，则二十二种文件就有变成教条的危险。

五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总委员会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总结第一个月的学习。

五月二十七日 中央研究院召开关于“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

同日 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和中央系统的学习在步骤上取得一致，把机关、团体的学习时间延长两个月，学校的学习时间延长一个月。

为了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除了原有的巡视团以外，又组织了办公室，由巡视员、编辑等十五人组成，逢飞为主任，陈正人、李卓然、杨清三人专责领导。

五月三十日 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检查整风学习。这时，学院的同志正在热烈辩论学校过去的方针，检查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毛泽东在给大家的讲话中提出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去服务两个根本问题，并且联系到学院同志讨论中的一些争执，作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解答。特别是在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同志中间有许多糊涂观念。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因而也就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毛泽东在讲话中把鲁迅艺术学院叫做“小鲁艺”，而把充满群众斗争生活的广大社会叫做“大鲁艺”。毛泽东鼓励大家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六月一日 延安大学学习委员会进行全校学习大检查。

六月二日 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领导全延安整风学习。中央

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有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王稼祥、陈云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同日 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各单位的学习委员和学习小组长的联席会议，总结第一期的学习。

六月四日 新四军军直属队成立整风检查总委员会，领导和推动整风学习。由曾山、赖传珠、彭康、薛暮桥、宋裕和邓逸凡、刘毓林、崔义田、张润初负责组成。曾山为主任，彭康为整风文件研究总指导员。在成立大会上，军长陈毅作报告，指出党中央整风运动在我党思想上、教育上革命的重要意义。还提出充分发扬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洗刷三风不正的余毒，以整风作为推动工作的武器。

六月八日 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整顿三风学习运动，从四月十日在延安进行以来，已收到很大成绩。根据延安的经验，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全党干部党员思想的改造和工作

的改进都是有极重大意义的。因此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

六月十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传唯物论》。社论说，党的整风运动，用一句话来说明它的精神和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

七月二日 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七月十日 中央学习总委员会发出第六号通知：
(一) 规定自本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为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和《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自二十日起，继续整风文件的学习。

(二) 各机关学风部分的学习总结，一律按原定日期推后十五天。

七月二十六日 中央研究院第一阶段学风学习进行完毕。为了巩固和发展已得成绩，该院以两星期时间进行笔记整理，并根据学风文件作自己的思想意识的检讨。同时进行党风学习的布置。

七月三十日 中央直属机关学习总委员会召开会议，总结学风学习，布置党风学习。会上，李富春代表常委会作怎样总结学风学习和开始党风学习的报

告。报告指出，中直机关约有二千二百人参加的学风学习，学习了三个月，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进行总结的目的：第一，是要看学习中是否真正懂得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是否还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存在？第二，是要看保障学习的组织方式是否适当，是否只重视形式而忘记了实际需要。八月一日至八月十日为学风总结的时间。党风学习从八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底止，包括学习测验和总结的时间在内。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系统自五月十八日开始的学风学习，共学习两个多月，今日学习结束，并总结完毕，开始党风学习。只有一两个单位全部总结尚未作出。

八月十一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李富春写的文章：《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文章指出，延安整风运动由整顿学风阶段进入整顿党风阶段。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系统学习总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始党风学习的决定》，并附有党风学习讨论题目。决定着着重强调加强思想领导，精简学习组织，更好地联系实际深入反省和开展批评，以及多读多想等问题。党风学习讨论题目：（一）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

（二）对工作态度问题。（三）干部关系问题。（四）纪

律与民主问题。（五）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问题。

（六）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问题。（七）自我批评问题。（八）平均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九）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问题。

八月十七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学与用的统一》。社论指出，整风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所以，学和用统一的精神，不但应表现在整风学习后整个工作的检查上面，而且还应贯彻于整风学习的全部过程。

八月二十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委员会规定，从今日起，开始学习党风文件。并拟定出《整顿党风文件研究计划》。

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二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各地收到后，首先应由各级党委、党团和军队领导机关讨论，在党校和军事学校中，在各级干部中进行郑重的传达和讨论，并列入整风文件加以学习。

九月十一日 《整风文献》一书由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整风文献》一书是整风运动中必

读的二十二个文件经过重新编译汇集而成。一九四九年六月进行增订，由二十二个文件增加为二十七个文件。

九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的学风学习结束，开始党风学习。

九月二十一日 绥德分区一级党风学习开始，原计划是十月底结束，后来经各学习分会的提议，延长到十一月底结束。

九月二十四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正确的学风正确的党风》。论述了学风、党风、文风三者的关系。

十月九日 刘少奇《论党内斗争》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编者起草按语指出：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十月十五日 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向各级政治机关发出指示。

十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进行了八十

八天。这次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全部历史经验，统一了对党的领导一元化的认识，纠正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的倾向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

十一月初旬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党风文件的学习，进入一个新的紧张热烈的高潮中，各部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普遍展开。

十一月四日 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

同日 鲁迅艺术学院党风学习第一段结束，开始讨论反对自由主义。

十一月十一日 习仲勋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发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演说，就陕甘宁党的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说明。

十一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于今日和二十三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讲解报告。报告一方面概括了边区党的历史教训，指出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当前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这些偏向虽不是路线问题，但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这个报告推动了西北高干会从检讨历史问题的阶段，进到检讨现时党内思想倾向的阶段。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学习运动告一段落，学风、党风、文风各部分的文件都已学习完毕，进入个人总结阶段。

十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秘书处全部整风文件学习完毕，开始进行总结。

十二月六日 中央宣传部党风学习结束。

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向各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通知说：（一）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二）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习委员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认真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指示，借以坚决的彻底的肃清党八股的余毒。

十二月底 毛泽东接见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和他们谈话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

一九四二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的《六大以前》出版。这部书选编了党的六大以前的历史材料。

一九四三年

一月七日 任弼时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发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讲演，说明了：（一）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二）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三）检讨历史的教训和党性问题。他尖锐提出边区在地方党政中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中反对军阀主义倾向和反对闹独立性与实现党的一元化的必要。他还指出，迅速转变领导作风的重要，并说明今后领导应从以下四个主要问题着手解决：（一）抓住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作风。（二）反对官僚主义，建立正确领导。（三）发扬民主，展开自我批评。（四）适应当前任务，改进组织工作。最后指出，如不改变领导作风，高干会的任务是不能真正完成的。演讲到九日结束。

一月九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学习委员会正式决定学习文风文件。这次学习重心放在检查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工作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否有“打官腔”的现象等。

一月十日 彭德怀在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整风学习委员会上发言。发言强调整顿三风学习的重

点，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反对唯心主义，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发言还指出，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革命，主要是改造干部的思想，尤其是改造高级干部的思想。敌后是处在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和延安不同，所以必须把整顿三风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一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通俗的话，全面阐明了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他的讲演使到会的干部对什么是领导及如何实现正确领导，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领会与认识。

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指示》。

二月二十二日 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上作结论。结论强调指出，整风是我党进行思想革命的斗争；整风对于改造我党及全体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提高工作效能与品质，加强与巩固全党的团结，加强全党与党外人士的团结，以及转变工作作风等，均有伟大的革命意义。总结还指出，改造思想方法的重点，

必须着重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和自作聪明。整风对象的重点应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一级，军队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整风运动必须注意与当前斗争的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总结对整风运动在不同地区的进度和时间也提出了要求，强调不在多，而在精，不在走马观花，而在追根究底贯彻始终。

二月 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于二、三月间，连续召开十几次党员干部会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自己亲身斗争经历，系统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三月十日 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刘少奇、陈云、周扬、凯丰、博古、李卓然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使即将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而召开的。

三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推选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并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会议还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

简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工作需要，中央机构必须重新加以调整。根据上述方针，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同时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任秘书。还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为副主席。

同日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计划规定了整风学习的总结办法：（一）按各系统各机关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方法，最迟六月底作出总结。（二）各机关搞好学习总结，订出一九四三年的工作计划等。

三月二十六日 中央太行分局召开分局、一二九师直属队和各分区政治工作人员整风动员大会。由李大章代表学习委员会作报告，他号召每个党员和干部必须从新认识整风的伟大意义，并指出今后整风重点在于整顿学风，改造思想方法等。学习组织：在分局总学习委员会下，全区共分七个分会。分局的分会中又分三个区会：（一）分局和司令部；（二）政府；

(三) 华北新华日报和文艺界等机关。

四月六日 中央直属机关的整风学习作出初步总结。

四月九日 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和民众团体系统的整风学习作出初步总结。

四月十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学习的指示》。

五月六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李卓然写的代论：《整风领导责任上的三个问题》。代论指出，为了完成一九四三年的整风任务，从领导责任上说，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立场去具体分析干部中到底存在些什么不正确的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在整风中，要以身作则开展自我批评。并要耐心地说服和教育一般同志，不断地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

六月一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整风运动的经验和党领导革命工作的长期经验，对于正确的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作了科学的说明。

六月 中央财政经济部作出整风学习总结。

八月二日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分

析了国际国内的局势和我党三年来伟大的进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八月八日 中央党校第二部举行开学典礼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党校学习的目的是要达到作干部的标准，如季米特洛夫所说的，要对无产阶级事业有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并号召全体同志认真整顿三风，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党坚固地团结起来。

十月十九日 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十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通知说：“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

十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两条路线》一书出版。这本书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的主要学习文件。《两条路线》收集了从党的成立到一九四三年二十二年内党的重要的历史文献一百三十七篇。

十一月十五日 新四军第五师召开直属部队机关学校活动分子大会，李先念在会上作了整风动员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和鄂豫皖抗日根据地的形势，说明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号召干部从思想上充分重视整风的学习。并强调整风重点首先放在团级和县党委以上的干部。会后，李先念亲自到抗大分校布置和推动整风学习。

一九四四年

三月三日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报告提出了研究党史的基本方法是：“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报告还详细地分析了“六大”的重要问题，包括有：（一）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二）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三）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四) 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五) 党的各项政策。

(六) “六大”本身及其影响。报告至四日结束。

四月十二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于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党史中的两条路线过程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结论；对于这次学习党的历史的方针和应有的态度作了详尽的说明。讲演还对党在抗日时期的历史作了基本总结。

四月十八、十九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解放日报》编者按语中指出，发表这一文章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

四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习总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李富春作关于高级干部组的学习问题的报告。

五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举行第一次大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五年底时期的历史问题。这次全会先后开了四次大会，会期长达将近一年。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举行最后一次大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五月 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由邓拓

编辑出版了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我们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部选集卷首的“编者的话”指出：“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我们“才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的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六月七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有功、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复辙。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放下包袱目的在此。

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指出郭沫若作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国共产党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

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一九四五年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在整风胜利的基础上，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并在总结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因而为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有关平江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

吴定邦 晓 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以来，各报刊就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但对平江起义的若干史实众说不一。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考证。不妥之处，请读者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一九二八年彭德怀率领一团跟随独立五师开赴平江的具体日期问题。这个问题有五种说法：

1. 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以下简称《回忆》，载《近代史研究》一九七九年一月号）中说：该年“四月中旬，独立五师奉命开赴平江接替阎仲儒旅防务”。

2. 李寿轩在《九都山到井冈山》（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中说：“五月中旬，师长突然召集了距离师部较近的一团团部及一营官兵训话，在训话间向大家透露，本师已奉命立即出发前往平江‘剿

匪’”。

3. 李光^①在《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原载《中国新军队》一九三六年出版，《湖南文史资料》一九七九年第一辑转载）中说：独立五师所部一、二、三团，于“一九二八年六月间由南县、华容、安乡开赴平江”。

4. 《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三月出版）中说：“该师（独立五师——引者注）第一、二、三团于六月十八、十九两日先后到达平江”。

5. 《彭德怀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中说：“一九二八年四月底、五月初（农历）全师先后到达平江……一团是随师部最后一天到平江的”。

以上五种不同说法，应以何者为准？其中第五种说法，经查证，农历四月三十日、五月初一，即公历六月十七、十八两日。又据当时敌湖南清乡督办署编印的《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卷二）“报告清剿经过情形”一节中说：“第五独立师第一训练处第一、二、三团于六月十八、十九等日先后开抵平江。”平江县

^① 李光即滕代远。

城启明师范校董凌容众的《日记》里，也有同样的记载：“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闻独立第五师……明日来换防，八军二、三师开拔”。由此可见，第四种说法是可信的，第五种所说四月底、五月初说法也证明了第四种说法是对的。

二、关于独立第五师第一、二、三团驻防地址问题。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

1. 李光在《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一文中说：独立第五师所属“第一团驻防城区；第二团驻防东乡；第三团驻防北乡”。

2. 《自述》中说：“一团的一、三营驻县城，二营驻城南四、五十里之思村；第二团驻城北五十里南江桥一线；第三团驻东乡长寿街、嘉义镇一线”。

3. 《湖南省志》中说：独立第五师“第一团驻于平江县城、三眼桥之线；第二团驻于梅仙^①附近一带；第三团驻于长寿街、献钟之线”。

上述三种说法，关于一团的驻地，基本一致；但二团、三团驻地的说法有分歧：李光说，二团驻在东乡；三团驻在北乡。《自述》、《湖南省志》说，二团驻在城北南江桥、梅仙一带，三团驻在城东长寿街、

^① 梅仙位于平江城北。

嘉义、献钟一带。我们认为《自述》和《湖南省志》的说法是准确的。第一，可以从黄公略营的驻地得到证实。黄公略是三团三营营长，他率部起义的地方是嘉义，位于平江城东乡，不在北乡；第二，这也可以从敌《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的记载中得到证实。报告书说：“第一团彭德怀所部驻平江县城及三眼桥之线；第二团张超所部驻于梅仙附近一带；第三团刘济人所部驻于长寿街、嘉义、献钟之线。”由此可见，独立五师各团驻防地址是：一团驻防在县城及城南；二团驻防在平江城北乡——梅仙、南江桥一线；三团驻防在平江城东乡——长寿街、嘉义、献钟一线。

三、关于滕代远到达平江的时间问题。这个问题，有四种说法：

1. 钟期光在《平江起义前后》（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一九七九年出版）中说：“大概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左右，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来了平江。”

2. 滕代远在《平江起义前后》中说：“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离开了安源市，出发后我找到了浏阳县委，浏阳县委派交通员送我，于第二天到平江，……七月中旬，我进了县城。”

3. 李寿轩在《朝着“革命的明灯”前进》（载《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中说：“七月十

六日，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同志来到平江。”

4. 彭德怀在《回忆》中说：“七月十八日晨……由长沙来密电……要逮捕黄石、黄纯一、贺国中三人。”当日晚，“我即刻召开了团党委紧急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恰于此时来到平江。”所说“恰于此时”，当然是说十八日，但亦不排除早于十八日。

以上几种说法，共同点都是说在七月，前两种说法没有指出具体日期，第三种说法指出在十六日，第四种说法是十八日。据滕代远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在井冈山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代远到平接头的第二天，就接到省委一个特别警戒信……，第五天（七月二十二日）即用闹饷的名义发动士兵，将平江县挨户清乡队的枪支缴得二百余支……”。又《红五军军委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向湘委的报告》（以下简称《向湘委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中说：一团从南县“开往平江，至七月十九日，据友人来信，谓南县共产党机关破获……，斯时××（德怀——引者注）巡防平南，即奔回平城，……先到电报局，长沙拍来密电枪决×××（黄公略——引者注）时，知事机泄漏，危险迫眉，恰湘委派×××（滕代远——引者注）同志才到两天，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士

兵借闹饷之名，实行暴动”。上述两个文件记载滕代远到达平江的时间完全一致，所以是可信的。因为它与前几种材料仅仅是当事人的事后回忆不同，前一个文件是起义后不过半年写的报告，后一个文件是起义后不过一年多时间写的报告，故不会失实。由此可见，滕代远到达平江的时间不是七月十六日，也不是十八日，而是七月十七日。

四、关于参加平江起义的部队中共党员人数问题。这个问题，有五种说法：

1. 李光在《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中说：

“第一团有共产党的支部，党员七人”：“彭德怀、李广、邓萍、李灿、王纯一、张云生、贺夷”。“此外还有四个党员与彭德怀有直接的关系：黄公略、贺国中；还有两个学生党员”。

2. 滕代远在《平江起义前后》中说，平江起义时，独立五师共有九名共产党员：彭德怀、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邓萍、李灿、张荣生、李光、贺夷。

3. 滕代远在给《湖南省委报告》中说：“自平江暴动的时候（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只有C P党员十二人（内计团长一人、营长一人、连长三人、副官一人、兵士三人、司书二人、马弁一人）。”

4. 彭德怀在《回忆》中说，平江起义时共有党

员八人：李灿、李光、邓萍、张荣生、彭德怀、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

5. 《自述》中说：有九个共产党员：“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张荣生、李灿、李力、李光、邓萍和我。”

以上五种说法，因李光即滕代远，故前三种说法是滕代远本人在不同时间里讲的；后两种说法是彭德怀分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七〇年讲的。那么究竟那种说法准确？首先应该肯定两份名单上都提到的八名党员，即彭德怀、李光、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张荣生、李灿、邓萍，是无可怀疑的。《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中提到的王纯一当为黄纯一之误，张云生当为张荣生之误，李广当为李光之误。这不仅可以从《回忆》、《自述》中得到印证，也为滕代远后来发表的《平江起义前后》所证实。其次，彭德怀提出的名单中有一个李力是滕代远提出的名单中所没有的。考虑到《自述》具体地回忆了李力（和李灿）是在张荣生、邓萍、李光、彭德怀之后，被介绍入党的，又多次谈到他在起义中的活动，故可以确定李力是党员。滕代远提的名单中有一个贺夷为彭德怀提的名单所没有。不仅彭德怀的回忆中没有谈到他，就是当时在连里的李寿轩、李聚奎、田长江等同志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也都没有提

到他。据此，参加平江起义的党员是九名，贺夷有待进一步考证。至于给《湖南省委报告》中说“C P党员十二人”，除上述九人和贺夷外，既无姓名，也没有可资考证的材料，所以不足为据。

五、关于发动平江起义由谁首先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

1. 滕代远在《平江起义前后》中说：“以彭德怀为我洗尘的名义来召开一次党的会议，……散会后，彭德怀同志个别对我说，他刚才接到省政府发来的一个密电，……情况非常紧急，怎么办？商量后，没收此电不交，并准备武装起义。”就是说起义是经过滕、彭“商量后”决定下来的。

2. 《自述》说，彭德怀于七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左右，收到长沙来的两份密电，要“立即逮捕公略、纯一、国中三人”。“邓萍问，‘怎么办？’我说：‘现在只有起义（当时叫暴动），不能有任何犹豫’”。邓萍和当时在场的张荣生即表示同意。就是说，彭德怀在接到紧急电报后，立即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以挽救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

以上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符合实际情况。首先，从彭德怀的思想发展过程来说，他有提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充分准备。段德昌^①在南县就曾向他

建议积蓄力量、搞武装起义。段说：“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一个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是要起重大作用的”。彭德怀入党后，为发动武装起义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他能在风云骤变，组织暴露，同志生命危在旦夕的紧迫关头，当机立断，做出决策，提出武装起义。再从他在起义部队中的地位和工作基础来说，由他提出起义的决策也是合情合理的。这在李光的《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中也得到证实。文章说：“借为滕同志洗尘”的会议上，“彭同志说明了电报的内容并提出具体的办法。于是一致举酒宣誓，坚决的在平江举行武装起义”。据此，平江起义是彭德怀首先提出的，后经一团党员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滕代远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六、关于平江起义是否得到了湖南省委指示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

1. 《湖南省志》中说：“滕代远进了平江县与邓萍接上了头，随后又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二人根据当时省委‘关于独立五师党的情况有所暴露，立即策动暴动，以争取主动的紧急指示’”，作出平江起义的

① 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

决定。

2. 《回忆》、《自述》中均说：七月十八日收到长沙来的密电，获知要逮捕黄公略等人，彭德怀遂于当日晚召开党员紧急会议，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举行起义。这就是说，决定举行平江武装起义，事前没有收到省委的指示。

这个问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平江起义前，彭德怀没有与地方党（包括湖南省委）取得联系。这时，如果省委有指示，只能通过滕代远，但是，滕代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根本没有说省委在平江起义前，有过什么指示，相反却说“自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滕代远奉令为边特书记赴平江找关系，……到红军在平江暴动后三日，才找到平江党的关系”。其间，“屡次写信给省委，……而渺无回音，……至八月二十日，回到平江接到省委的指示”。这份报告的乙项中还说：平江工作在这四个时期中（马日事变至平江起义）“以反动势力的隔断，平江县委虽几次派人找省委，总找不到关系借以报告平江的情形，和得到很好的指示”。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既然滕代远自七月二日至八月二十日前一直没有收到省委指示，而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平江起义自然不会得到省委指示；第二，既然反动势力相当猖獗，多次找省委都找不到，而要

取得省委指示当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平江起义前没有得到湖南省委指示。

七、关于红军第五军于何时成立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四种说法：

1. 李光在《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中说：平江“起义胜利的第一日，成立红军第五军。”

2. 李寿轩在《从九都山到井冈山》中说：平江“暴动的第二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了。”

3. 《自述》中说：“二十四日下午……，平江县委召集了群众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宣布……成立工农红军。”

4. 滕代远在《平江起义前后》中说：七月二十五日，平江起义的第四天，宣布成立第五军。

红五军成立时间的四种说法，以那天为准？第一天即二十二日，下午一时起义枪声打响，结束战斗已经是三、四点钟了，不可能立即开会宣布成立红五军；第二天即二十三日，起义部队忙于筹款、抓土豪劣绅，况且贺国中率随营学校于当日下午刚到平江，亦不可能立即开会正式宣布成立红五军；第三天即二十四日，起义部队各部已经会师，平江县委进城与起义部队接上了关系，所以这天能够在召开士兵联席会后，召开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第三天即二十四日宣布成

立红五军的说法，还可以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和《向湘委的报告》中得到证实。前一个报告说：起义“第三日……，开一联席会，决定全县的总暴动，……怎样武装工农，怎样扩大宣传及恢复党的组织，并决定成立红军第五军及以平江东乡之长寿街为根据地。”后一个报告说：一团起义取得胜利“至第三天正式宣布是红军，定名为‘红军第五军十三师’，……有组织的群众与平江的党，一律抵城，开了群众大会”。据此，红五军成立的时间，应为七月二十四日。

八、关于红五军所辖部队编制问题。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

1. 李光在《平江起义和红五军诞生》中说：“起义的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三十三师，辖第一、二、三团。”

2. 《湖南省志》中说：“平江起义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十三、十四两个师。”

3. 《自述》中说：“在士兵联席会议上，选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邓萍为参谋长。成立一、四、七三个团”。

据当年参加平江起义的老同志回忆，上述三种说法中，最后一说是准确的。李聚奎在《平江起义时期的彭德怀同志》中说：“原来的一团一、二、三营改编为

红五军的十三师，下辖一、四、七团，我们三营改为第七团”。再如田长江等同志的回忆，也都说红五军下辖一、四、七团。

九、关于红五军撤出平江城的时间问题。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

1. 《回忆》中说：“七月三十日敌人分五路约七个团向平江城进攻，……激战终日，……至黄昏后才安全撤出平江城。”

2. 《自述》中说：“七月二十九日，敌军进攻，……一、七团和军直属队于黄昏退出战斗。”

3. 李聚奎在《平江起义时期的彭德怀同志》中说：“我们在平江城住了一个星期，最后和敌人激战一天，主动放弃了平江城”。按此推算大概是二十八日撤出平江城的。

这个问题，敌《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说得很具体，“第五独立师第二训练处陈光中所部及第六师黄团均于二十九日与匪接触，……三十日攻至平城附近，适第三团刘济人所部一、二营亦于三十日将大桥之匪击溃后，跟踪追至平城附近，……即于是日克复平城”。在凌容众《日记》中也有记载：“三十日，辰刻炮声忽起，……知省政府派军至……似南城冲入，敌始不支向北城窜出”。这两份材料记载的时间完全一致，又与

《回忆》中的说法相同。据此，红五军撤出平江城的时间，应为七月三十日。

十、关于红五军在铜鼓幽居改编为几个纵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

1. 李寿轩在《朝着“革命的明灯”前进》中说：“……改编五个纵队，留一、三纵队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由吴溉之领导；二纵队在浏阳、万载一带由黄公略领导；四、五纵队随滕代远、彭德怀上井冈山。”

2. 李聚奎在《平江起义时期的彭德怀同志》中说，红军主力与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三个纵队由黄公略率领留在平浏地区；彭德怀和滕代远率两个纵队奔赴井冈山。

3. 《回忆》中说：“在铜鼓幽居”“召开三省边区县委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军所部同地方游击队混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军属特务大队，……，彭德怀和滕代远率五个大队上井冈山。《自述》说：“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召集……浏、平、修、铜、万五县代表及红军代表的联席会议”^①。“红五军和地方游击队混编后，主力保存十一个大队（连），三个纵队。……根

^① 此处说五县联席会，但《向湘委的报告》和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均说是平、浏、修、铜四县联席会。

据省委指示，我和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等同志率五个大队去井冈山与红四军联络”。

上述说法的主要分歧：前两种说法认为红五军与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后一种说法是三个纵队。经考证，应以后一说法为准，即混编为三个纵队，下辖大队，大队共有十一个。这个说法，在蒋长卿《关于平江红五军情形的报告》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报告说：

“县的联席会……决定红军与各县赤卫队合编，名称仍为红军第五军……，共编十一个大队”。但《回忆》、《自述》都未说明纵队与大队的关系，所以容易被误认为同级关系，从而以为留下三个纵队，带走五个大队上了井冈山。其实从《回忆》中可以看出彭、滕率五个大队上井冈山后，委二纵队长黄公略临时指挥各部，即指挥留下的包括二纵队在内的共六个大队，所以才说“临时指挥各部”。但是，前两说又为什么说幽居五县联席会议将红军主力与地方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呢？只要把下面两个情况搞清，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第一，“一九二九年一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突围井冈山，挺进赣南，于四月一日与红四军在瑞金会合，前委决定彭同志及王部改编为第四军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缺），……湘赣边界赤卫队为四军第六纵队，……此两纵队属于彭同志以四军副军长名义……”



2 021 3927 5

指挥”^①。这里说得很明白，这两个纵队，都是红四军的，并不属于红五军的建制。第二，一九二九年八月，彭德怀率红五军返回湘鄂赣，与坚持湘鄂赣游击战的第二纵队会合。九月召开湘鄂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为“适应新的情况和任务”便决定将“红五军编为五个纵队”，并划分了各纵队的游击区。这个问题，在王首道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给《湘委并转中央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中也能得到证实。报告说：“彭军是八月间回边境来的，共两个纵队，步枪约六百支，……与湘鄂赣边支队辖三个纵队合编，编成现五个纵队。”这就是说，红五军正式改编为五个纵队不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幽居五县联席会议时，而是一九二九年九月由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改编的。而前两说之所以说合编为五个纵队，是把一年后的改编与幽居的改编混淆了的缘故。

^① 朱德、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八辑

作者 =

页数 = 3 7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